★ 得海权者得天下 ★

谁拥有了海洋 谁就拥有了世界

大国海权

【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

熊显华◎编译

世界海上强国近二百年的发展历程

大国崛起的海上必经之路



江西人民出版社

罗马：起源于海洋文明的西方国家很早就重视海洋的意义，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几百年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乃至今天的美国在世界上的优势力量都是以海权为基础的。

美国：老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后，受马汉海权思想影响，致力发展海权。除舰队的扩建及积极夺取太平洋各战略岛屿外，且开凿并控制巴拿马运河及加勒比海之战略海上基地，一举奠定了美国成为全球海上霸主的地位。

英国：英国对马汉之海权思想推崇备至，英国政府一战前提出海军扩充计划时，马汉的理论成为英国军方最强力的辩护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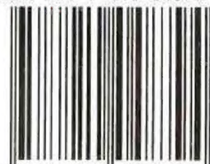
法国：法国很重视马汉对于法国海军政策的批评，并且称赞其思想具有真正的创造性。

德国：德皇威廉二世及海军部长铁毕兹（Von Tripitz）深受马汉影响，致力发展海军，但德国却忽略了马氏的一项重要训条："一个国家无法同时发展陆权与海权"，导致德国陆军反而受经费影响而减低其战力。

……

上架建议：社科/军事

ISBN 978-7-210-04879-4



定价：39.00元

史进程及当今世界格局的巨著

美、德、日及前苏联奉为制定国策的理论指导

大国海权

【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

熊显华◎编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译者的话

得海权者得天下

和平发展、天下大同，是人类的终极梦想，但就目前的国际大环境看，在敌对势力眼中，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国家形成危险和威胁。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没有和平与发展的空间。

自1840年以来，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用他们的坚船利炮不断破坏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近百年间，几乎所有的东西方列强都利用武力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也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一步步遭到肢解，中华民族

因为马汉对美国海洋战略的巨大贡献，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给予了马汉非常高的评价，称其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

另外，其他欧美海洋大国的海军和政府，对马汉的海洋战略也相当重视。

在英国：英国对马汉的海权思想推崇备至，英国政府一战前提出海军扩充计划时，马汉的理论成为英国军方最强力的辩护理由。

在法国：法国很重视马汉对于法国海军政策的批评，并称赞其思想具有真正的创造性。

在德国：德皇威廉二世及海军部长铁毕兹（Von Tripitz）深受马汉影响，致力于发展海军，并在二战前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有创新能力的海洋大国之一。

反观中国：甲午海战之后，中国近代水师全军覆没，巨额的战争赔款进一步加重了清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割地赔款，民心尽失，终至彻底垮台！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之后，再次艰难起步。

从 1911—1949 年的这段时期里，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军阀割据、内战外战不断的情况下，锲而不舍地努力，希望重新踏上强国之路。最明显的是 1927—1937 年这段时间。这期间虽曾发生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强行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政府，而民国政府则委曲求全，忍辱偷生，置东北大片河山沦陷于不顾，加速内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军队建设。经过 10 年的努力，中国似乎又看到了一丝振兴的希望。

但是，中国的崛起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1894 年的甲午海战使日本尝到了甜头，1931 年侵吞东三省则更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胃口，它不能容忍一个强邻出现在自己身边，于是仰仗着自己拥有的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日本人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被迫还击，焦土抗战，苦撑8年，最终虽然战胜，但却元气大伤，士兵与平民死亡高达2000万以上，财产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经过8年战火的摧残，本已积弱的中国更加一穷二白。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的侵略，特别是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大大延缓了中国人民的强国进程。

不允许中国发展，阻碍中国前进，一直是某些敌对势力始终不变的国策。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如此。回首历史，我们对此应该有更清醒、更深切的认识。国与国之间需要合作，但本质上还是竞争。也正因为如此，以马汉为首的美国海洋战略家才会提出“强权即公理”的强悍命题，并一次次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

通过对马汉海权思想的研究，我们还能从中找到南中国海的局面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真正原因，同时，也能够大致上判断出在钓鱼岛之争中日本政府公然撞我渔船、抓我渔民、公然挑衅的目的……

另外，近年来中国领海上各种冲突日渐频繁，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是否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若想和平，若想发展，中国是否也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而我们的国民，是否也需要普及一些海洋战略方面的常识？

基于此，我们根据海洋战略鼻祖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和《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海权三部曲，编译、整理出这本《大国海权》，敬请各方批评指正。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作者完全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阐述其海洋战略的，这种“强权即公理”的强悍战略，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比如，涉及中国的部分，就是完全从美国的国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海洋战略对于世界的深远影响

随着野蛮让位于文明，交通与通讯手段迅速地改善，道路被开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食物来源得以增长，战争行动将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容易。因此，在茫茫大洋之上，从单层甲板船小心翼翼地由一个港口向另一个港口蠕动到大帆船雄心勃勃地远征于世界各地，再从后者演进到我们当今时代的蒸汽舰船，这一系列演进扩展了海军行动的广度与速度，却并不一定会改变海权战略的指导原则。

1

海洋战略不仅事关军事和海防，而且与政治、经济、贸易、资源密切相关。而对军事历史的研究，可以达到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的目的。因此，这样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很大的程度上，海权的历史就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角逐、暴力冲突的一种客观的再现。由于海上商业对国家的财富以及实力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一些有卓识远见的国家早就将这富得流油的贸易形式看成他们的强国之策。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有竞争者出现，他们始则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后则在这些手段不能奏效时，直接诉诸暴力。

暴力自然是野蛮又可怕的，而暴力的动因则源自海上利益的冲突，这包括海域的瓜分不均以及背后蕴藏的巨大财富。因为对财富和利益的争夺而导致战争在所难免，因此，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残酷的军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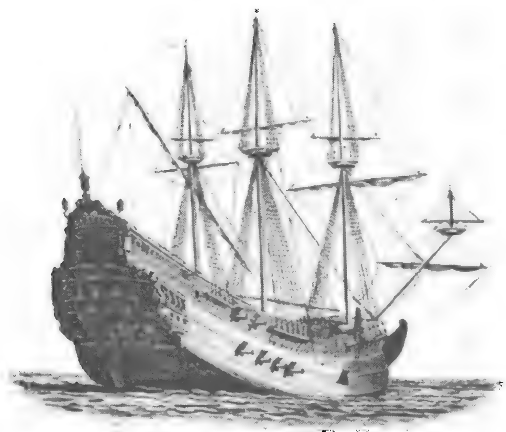
军事家们都认为，对以往历史的研究对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拿破仑就在众多的沙场决战

中指出：有必要为那些经典战役作出分析（像亚历山大、汉尼拔及恺撒的战役)。当然，对他们而言，火药当时还不为所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研究。这是因为，尽管许多战争的具体情况，随着武器的进步以及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在战争史上却有着某种永恒的参考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完全可以被提升到原则性的高度的。同样的道理，尽管过去半个世纪的科学进步对海军武器装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但通过对海上决战原则的阐释，重温昔日海上战记的历史研究仍将是具有指导与启发意义的。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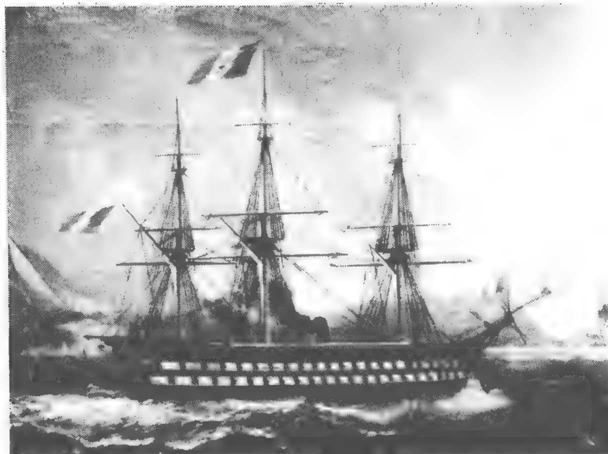
蒸汽时代的海军在海洋战略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但对那个时代的海军的探讨，却让人感到尴尬。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的实验性知识，另一方面实践经验却一无所有。这样一来，有关未来海上战争的理论几乎完全属于主观臆断。

比方说，蒸汽舰队和通过划桨驱动的单层



单层甲板船

中世纪的一种巨型舰，通常是大且吃水浅，是一种以帆和桨推进的单层甲板船，可用作商船或战舰。



蒸汽舰船

一种主要以煤为燃料，靠蒸汽推动航行的舰船，但也可配备帆予以辅助。这种船比单层甲板大帆船更先进，曾在中世纪海战中发挥出极大的作用，能在大型水面实行远洋作战。

因此，大帆船与蒸汽舰所共同具有的这些能力，从战术上考虑，至少与单层甲板大帆船那在静风中或逆风时前进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经过发展，比如给大帆船装备远程大炮，使之具有相对强大的穿透力。如果再装备有大口径短炮，就算射程短，却仍有强大的轰击力。所以，这也是现代蒸汽舰都装备远程大炮群和鱼雷组的原因。

只是后者仅在有限的距离内有效，通过撞击毁伤对手，而装备大炮的目的就在于穿透对方。不过，即便如此，也不是说随便发射就能伤害到敌方。要知道，敌方不是傻子，任由你宰割。这里面就需要有海军司令官和舰长们的战斗部署，以及战术的运用。否则，就算你装备再精良，也不一定能取得战斗的胜利，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案例又不是没有。

当大帆船和蒸汽舰用于直接与一艘敌舰交火时，前者通过强行靠近而拖拽其行，后者则通过撞击而使其葬身鱼腹。然而，对这两者而言，这都是很难完成的任务。解决办法就是，敌舰必须被带至攻击行动区域的某个单点，只有在那里，抛射性武器才能从一个广阔区域内的许多点上找到用武之地。

由于受风向的影响，两条大帆船或多支舰队的相对位置布局就必须融入战略战术的运用。也就是说，指挥官很重要。这或许可说是那个时代水手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过也有人说，当蒸汽舰出现后，受风向的影响这个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蒸汽舰的机动性超过大帆船的不知多少倍。但如果我们对背风与气候状况的明显特征进行一番仔细考虑后，就会发现这种认识是一个错误。

这是因为，在某一海况中舰船的相对位置是能够赋予作战任何一方随心所欲地发动进攻或者逃避战斗的力量的。换句话说，在选择进攻方式时，就具有了一种进攻型的优势。当然，这种优势也有某些弊端伴随其后。比如，引入行列之中的非规律性，暴露在纵向射击的炮火之下，牺牲部分或全部可用于进攻的炮击机会。记住上述的这一切都会在接近敌人时发生。

因此，当战舰或整个舰队，一旦处于背风位置，就不可能发起进攻。如果不希望退却，那么其行动只可能局限于防御地位，并且按照敌人的条件迎接挑战。当然，通过保持战斗队形不受冲击的相对缓解，以及通过在敌人一度不能还击时进行持续不断的轰击，这一劣势是能够得以补偿的。

在历史上，甚至在各个时期的进攻和防御作战行动中，上述这些有利和不利的特征都有其对应事例和类比事件。进攻方为了接近并摧毁敌人，承担了某种风险和劣势。防御方，只要其仍旧保持原状，拒绝承受前进的风险，保持一个小心翼翼、组织良好的阵位，就能使自己充分利用进攻者留给自己的可乘之机。

英国人常为此津津乐道。因为，他们的稳健政策就是要进攻并摧毁敌军。而法国人则对于背风位置乐此不疲。因为，通过此术，他们就能够在敌人接近时使之瘫痪，由此避免决定性的遭遇战，保存他们的战舰。

这也可能是法国人基本上将海上战事服务于其他军事考虑，对海军军

费缩手缩脚的原因之一。因此，他们通过采取防御性态势，并将其努力局限于打退进攻的方式。由于这一原因，只要敌人雷声大雨点小，背风相对位置就能得以巧妙地利用。于是，当罗德尼表现出要充分利用风向的优势的意图时，有点坐立不安的对手德吉尚立刻改变了战术。

在他们相互交锋的头一回合，这位法国人利用了背风位置。但是，在意识到了罗德尼的意图后，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以获取风向的优势。让人奇怪的是，这并不是用于攻进，而是高挂免战牌。对此，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采取进攻或避而不战的力量，不再取决于风势，而是取决于具有更大速度的一方。对一支舰队而言，不仅取决于单艘舰只的速度，也取决于它们行动的战术整体性。因此，具有最高速度的舰船将拥有气候便利。

通过上面的诸多描述，目的只想证明，不是像许多人所想像的那样，在大帆船和单层甲板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只是一个苍白无力的空想。它们两者都有近似于现代舰船之特点。当然两者也都有重大差异之处，这就使得引用它们的经验或行动模式作足以训练的战术先例成为不可能。

然而，或许这最初就是错误的，或由于物换星移，条件变化而失去效用。任何事都应立足于事物的本质之中，并且随着条件的变化，无论对方应用如何千姿百态，这依然将成为实施行动以获取胜利必须加以遵循的标准。

战争也有着诸如此类的原则，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就能加以揭示。历史能够显现战争的成功与失败，这是不变的道理。

4

随着野蛮让位于文明，交通与通讯手段迅速地改善，道路被开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食物来源得以增长，战争行动将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容易。因此，在茫茫大洋之上，从单层甲板船小心翼翼地由一个港口向另一个港口蠕动到大帆船雄心勃勃地远征于世界各地，再从后者演进到我们当今时代的蒸汽舰船，这一系列演进扩展了海军行动的广度与速度，却并不一定要改变对它们加以指导的原则。

正是在海上战略领域，历史教义所具有的价值丝毫未曾贬低。当对立的舰队在基于战略考虑之点相互冲突时，关于战术问题，倒不是那么明显的正确。毕竟，人类不懈的进步引起了武器装备的持续革新。

也正因如此，也必然迎来一场战争方式的持续变革。这主要体现在处理与掌握战场上的部队与战舰方面。由此使得许多的与海上事物相关联的人物倾向于认为，从先前的经验体会之中再也无利可图，在上面花时间纯属浪费。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是一种有关战术的单方面的和狭隘的看法。

昔日鏖战成败，取决于对战争法则的遵循与否。仔细研读成功或失败原委的海军将领不仅能够发现并逐渐消化这些法则，还能在实战中受到启发，受益匪浅。此外，他们还将注意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装备更新之后，武器的改进大多由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战术的更新却必须克服整整一个保守阶层的惰性。然而，这又是一个伟大的罪恶。

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只有通过仔细地研究新型战舰或武器装备的

力量与局限，才能将战略战术规范化，但这并不代表着照本宣科，而是细致入微地认识到每每出现的变化。唯有如此，这种罪恶才能得以根治。

历史表明，指望军人们不辞辛苦地进行这种工作，完全是徒劳的，只有让他们接受沉痛的教训，才能让他们牢记战略战术的重要性。关于这点，我们或许现在就能接受来自一名法国战术家莫罗古斯的训诫。他曾指出："海军的战术是基于其主因，即武器装备可能发生变化的条件之上的，而这相应地必将引起战舰的建造、运用它们的方式以及最终控制与运用整个舰队的变革。"他的进一步阐述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即"它并非一门奠基于绝对不变原则基础之上的科学"。更准确地说，即其法则的运用会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替而变化。这些法则在战略上的应用无疑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来看这样一些例子。

1788 年尼罗河之战，不仅是英国对于法国舰队的一场压倒性胜利，而且也对摧毁拿破仑在埃及的法兰西军队之间的交通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其战斗本身而言，英军统帅纳尔逊做出了伟大战术思想的精彩绝伦的示范。如果事实如此，这个战役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衔接好战役之初与战役发展过程的艺术。

其实，这种特定的战术衔接取决于今日已不复存在的一个条件，即一支抛锚停泊处于背风的舰队无力前去救助被摧毁前的处于上风位置的战舰。然而，作为衔接基础的法则，却没有过时，即选择敌军队列之中最不太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击。像杰维斯海军上将在圣·文森特角一役，就是遵循了同样的法则。

当时，他用十五艘战舰战胜了对方二十七艘战舰。尽管在这一事例中，敌军并没有抛锚停泊，而是处于行进间。而当时的背景是，埃及企业生存

的关键取决于与法国的联系能够畅通无阻。由于尼罗河大捷摧毁了这样一支海上力量，而这正是交通线得以保障的唯一指望，这样，最终的失败就成了定局。明眼人一看便知，不仅发动这场打击遵循了摧毁敌人交通线的法则，而且时至今日，同样的法则依旧有效，在单层甲板船的时代与大帆船或蒸汽舰的岁月里并无二样。

尽管如此，仍然有人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战略法则的重要性。比如，1805 年击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特拉法加，失败的并不是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被打倒了。也并不是纳尔逊获胜了，而是英格兰被拯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拿破仑的衔接未能奏效，而纳尔逊的直觉与机敏始终能使英国舰队对敌人穷追不舍，危险时刻又能及时戛然而止。

特拉法加海战的战术，尽管细节仍有待争论，然而，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仍然符合战争的基本法则。何况，在战况准备的时效性上，在执行活动与能量上，战争前几个月，在这位英国领导人方面的思想与洞察力上的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



特拉法加海战

特拉法加海战是帆船海战史上以少胜多的一场歼灭战，也是 19 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纳尔逊在这场海战中敢于突破陈旧的战斗序列理论，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使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一败涂地。

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法国与西班牙在 1779 年成了抗击英国的盟友。联合舰队曾三次

5

历史既提醒进行战略研究，又通过其传递的事实阐述战争法则。这是一条真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这样两个事例。

在两场处于东方与地中海的西方强国的大角逐中，相互对立的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颁多。一个已知世界的帝国在其中一场角斗里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难道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者是由于某种固有的条件使之再度复发？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倒是值得花时间去找出原因。因为，如果再度崛起一个如同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海洋强国，战略问题还将相同。就目前而言，海洋强权的中心压倒性地位于西方，主要是英国和法国。

然而，问题是如果出现了控制黑海盆地，占有出入地中海通道的机会，并被实现的话，那影响海洋霸权的现有战略条件就将全被改变。当然，这或许是一个交涉，但现在，西方如果联合起来反对东方，那英国与法国将立即不受阻挡地开往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地区。正如他们在 1854 年并如英国独自在 1878 年所做的那样，一旦出现所提示的变化，东方将一如既往，在半途势必与西方迎头相撞。

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中，让人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上霸权所具有的影响和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海洋的控制，无论如何有效，都不意味着敌军战舰不可能单枪匹马或成群成队地偷偷溜出港口，不可能穿越多少显得有些繁忙的海上通道，对漫长的海岸线上不受保护之地区进行骚扰性攻击，或闯入戒备森严的港湾。与之相反，历史已经显示，

开赴西班牙。他们的部分战舰还搭载着一支执政官的大军。这就使得他们的航程并没有带来严重损失，罗马陆军随后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以北地区，成功地站稳了脚跟。同时，另一支分舰队与由另一名执政官统率的大军被派往了西西里。这两支罗马大军兵合一处总计有 220 艘战舰。所到之处，它们分别遭遇并击溃了一支迦太基舰队，其轻易程度可以从叙述战事的轻描淡写之中推导而出，显示了罗马舰队实际具有的优势。

第二年后，战争呈现出下列态势：由北部进入意大利的汉尼拔，在经历了一连串的胜利后，向南挺进至罗马城附近，并由此在南部意大利难以自拔，不得不以战养战，这种局势使得民怨载道。一旦与罗马在那里确立起的强有力的政治与军事控制体系相互冲突，这就尤其危险。因此，从一开始，他特别需要在他自己与某一可靠的基地之间建立起补给与增援渠道，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就是“交通线”。

此时，有三个友善地区可以分别或全部成为此种基地，这三个地区分别是迦太基本土、马其顿和西班牙。前二者只能通过海路建立起交通线。然而，在西班牙，却可以寻求到最坚定的支持。即：通过陆路与海路都可以与之取得沟通，除非敌军阻断了通道，而海路则更快捷和简易。

在战争的前期，罗马凭借其海上霸权，绝对控制了在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盆地，即第勒尼安海与撒丁里亚海。从埃布罗河至台伯河沿岸地区对它十分友善。继坎尼战役后，即战争的第四年，叙拉古抛弃了与罗马的联盟，反抗潮流席卷西西里，随之而来的是马其顿与汉尼拔也订立了攻守同盟。这些巨变扩大了罗马舰队必要行动的空间，削弱了其力量。那么，罗马采取了何种应急措施，又是如何影响这场战争的呢？

6

有迹象表明，罗马并没有放弃对于第勒尼海的控制，因为其分舰队要不经袭扰地从意大利驶往西班牙。在西班牙沿岸，罗马也完全掌握着主动权。直到一名年轻一点的执政官认为已是适于保存舰队的时候了。于是，在亚德里亚海，一支分舰队与一处海军基地设立在意大利的布林迪西，以遏制马其顿。并且任务完成得非常之好，以至于没有一名希腊方阵士兵踏上意大利本土。“作战舰队的缺乏”，毛姆森说，“使得菲利普举步维艰。”我要说的是，在这里，海权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在西西里，斗争集中在叙拉古。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在那里迎头相撞，但后者却明显地占有优势。因为，尽管迦太基人时常成功地向城市输入了补养，他们还是避免与罗马舰队交火。而后者有马萨勒、巴勒莫和墨西拿在握，在该岛的北部沿岸可谓根深蒂固。对迦太基人而言，南部通道畅通无阻，他们因此就可以支持反叛力量了。

综合这些事实，就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罗马的海上霸权得以控制了从西班牙的泰拉弋那到西西里岛西端的马萨勒，再从那里到亚德里亚海的布林迪西一线以北的海域，这已为历史的进程所证实。这种控制不受冲击地持续于战争的全部过程。这并不排除或大或小的海上袭击，正如前文已讲到过的那些情形一样。然而，它确实遏制住了持续而又安全的海上交通线，而那又是为汉尼拔所急需的。

另一方面，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场战争的前十年，罗马舰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展开持续性军事行动的程度，

拥有的海上优势而平安无事。他们在泰拉弋那设立了一处海军基地，与哈兹德鲁拔在西班牙东南港口喀它基那的基地分庭抗礼，并随后大举攻入这块迦太基人的领地。西班牙之战由年少的西庇阿指挥，看起来真像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七年多来风云变幻，难解难分。最后，哈兹德鲁拔给予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迦太基人几乎成功地将增援汉尼拔的预备力量突进到比利牛斯山脉。

遗憾的是，这一意图暂时受挫。就在迦太基人准备卷土重来前夕，卡普阿的失陷使得罗马人得以腾出12000名久经沙场的将士，在克劳迪阿斯·尼禄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西班牙。尼禄才华横溢，能力非凡，在第二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争中，后来正是由于他，最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才得以进行。这是任何罗马将军都无可比拟的。这支通过海路及时赶来的增援大军，再次巩固了对于哈兹德鲁拔出征道路本来业已摇摇欲坠的控制。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方式不失为最是快捷与简便，并使得罗马海军逼近了迦太基人。

过了两年，后来作为“阿非利加执政官”而一举成名的西庇阿接过了在西班牙的统率权。西庇阿通过陆军和海军的联合进攻，占领了喀它基那。随后，他又迈出了最不同寻常的一步，即解散其舰队，



西庇阿

西庇阿又译斯奇皮欧。古罗马名门贵族，这个家族是古罗马历史上煊赫的世家，代出名将，老西庇阿是罗马执政官，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中指挥西班牙战场，在战争中阵亡。

将水手们全部调拨进陆军。西庇阿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关闭比利牛斯山通道而扮演遏制哈兹德鲁拔的角色，他还长驱直入挺进南部西班牙，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进行了一场艰苦但却不是决定意义的战斗。在这之后，哈兹德鲁拔从他身边悄悄地溜走了，火速北进，在其最西端，穿越了比利牛斯山，逼入意大利。在那里，汉尼拔的境遇每况愈下，其大军的自然减员丝毫无法补救。

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年，在沿途几乎没有遭受多少损失的情况下，哈兹德鲁拔从北部开进了意大利。如果他们能够平安地与当时所向无敌的汉尼拔统率的大军会合的话，那么他所率部队本来是可以决定性地扭转战局的，因为罗马本身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连接其殖民地与盟国的坚固纽带已到最后关头，有些甚至已经元气耗尽。

然而，这两人的军事状况也极其险恶。一个位于梅陶罗河畔，另一个在阿普利亚，两者相距仍有 200 英里之遥，并分别被一个优势敌国缠住不得脱身，而罗马大军却处于他们被分而治之的对手之间。

这一险恶战局，除了哈兹德鲁拔的姗姗来迟的因素之外，则是由于罗马控制了海洋。这在整个战争期间钳制住了两位迦太基兄弟通过高卢地区取径进行相互支援的可能。就在哈兹德鲁拔通过陆路进行其漫长而又危险的兜圈迂回之术时，西庇阿通过海路已从西班牙派遣出 11000 名士兵增援堵截他的军队。

结果，由于不得不穿越大片敌占区，从哈兹德鲁拔派往汉尼拔处的信使们纷纷落入克劳迪阿斯·尼禄之手。正在统率南部罗马军团的尼禄因此得知了哈兹德鲁拔打算要行走的路线。尼禄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趁汉尼拔不备，派出几千精锐之师，十万火急地与北部大军会师。两军兵合一处，两名执政官便以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对哈兹德鲁拔发起了进攻，全歼了其军

第二章

海权战略六要素

总体来讲，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有：

1. 地理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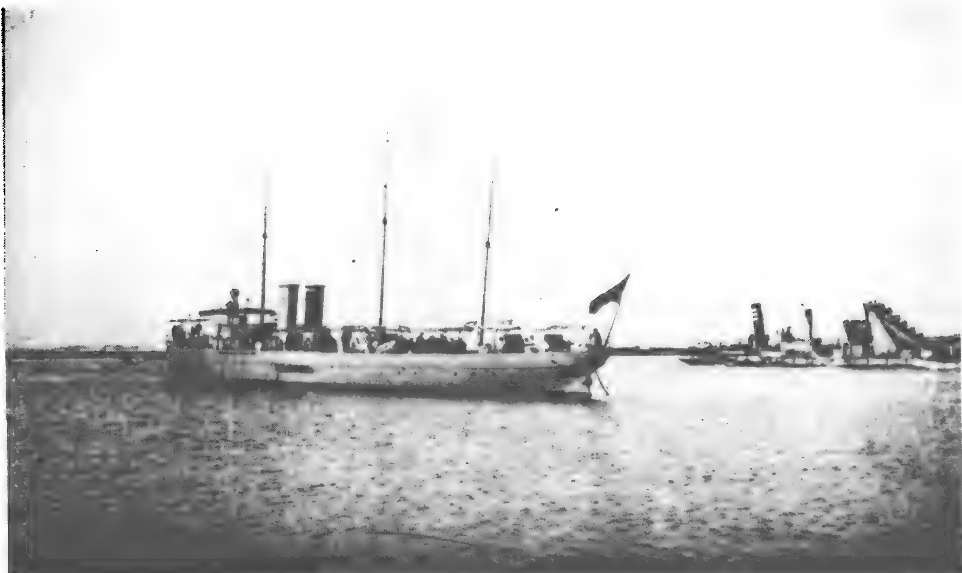
2. 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

3. 领土范围；

4. 人口数量；

5. 民众特征；

6. 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1886 年西班牙海军驱逐舰

西班牙曾是世界海上强国，尤其海军有“世界无敌”的光荣历史。但自从 16 世纪“无敌舰队”被英国打垮后其海军便一蹶不振，这成了西班牙海军永远的痛。为重振海军，西班牙经过长时间的积淀与发展，掀起了建造新型舰队的高潮。此图为西班牙 19 世纪时期建造的一艘驱逐舰。

这种牺牲是一种明智之举，其利仍大于弊。随着其殖民体系的膨胀，其海军舰队也在不断崛起，而其商业航运与财富甚至还增长得更快。这一点，也证明了其战略的高瞻性。

而且，在美国革命战争，以及在法兰西共和国与帝国的战争中，一位法国作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英国舰队迅猛崛起，并且四周财富堆积如山，然而，它却一如既往地感到了所有贫困的尴尬。”

换句话说，英国的力量足以维持其芸芸众生的温饱，而同等广阔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由于其海上劣势，却饱经屈辱与伤害。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仅有助于集中其军事力量，而且还能为展开针

对其潜在对手的敌对军事行动提供进一步的中心位置与良好基地等战略优势。英国的状况就每每与此相符。一方面，它面对着荷兰与北部强国；另一方面，它面对的是法国与大西洋。当受到法国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上强国组成的联盟的威胁时，在多佛海峡与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布列斯特不远处游弋的舰队，都能迅速去占据纵深基地，并因此能够迅速地投入其合成部队，反击伺机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任何一个敌人。同样，在两边之中的任何一边，上苍都赐给了它更好的港口与更为适合安全靠近的海岸。这在以前，还是在穿越英吉利海峡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然而，当蒸汽船与其港口的改进却因此缓解了这一法国曾一度遭受过的劣势。

那么，英国是怎样解决这一难题的呢？在大帆船盛极一时的岁月里，英国舰队进攻布列斯特，将其基地设立于托贝与普利茅斯。简而言之，计划是这样的：在盛刮东风或较为温和的天气状况下，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坚守其阵地并无多少困难。但是在西风中，当情况十分恶劣时，他们便折回英国港口，他们明白，直至风向转变之前，法国舰队是不可能出来活动的，这样他们也正好由大风将自己送回其要塞之中。

在地理上接近敌人或攻击目标的优势，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战争形态中更为明显了。法国人将此称之为“游击行动”。在这一战争行动中，由于完全针对通常并不设防的和平商船，因而只需轻型武装的船只。这类船只，并无多少力量进行自卫，因而对避难场所或近在眼前的支撑点有所依赖。这要么在由本国战斗舰只实行控制的某段海域，要么在友好港口，都能找得到。后者能够给予最强有力的支持，因为他们永远处在同一位置，而靠近它们对于受攻击的商船队比实施攻击的敌人更为熟悉方便。法兰西临近英格兰，因此能够极大地便利于其直接针对后者的游击行动。

由于在北海、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都据有港口，巡洋舰从临近英国贸

驱逐舰是一种多用途的军舰，是19世纪90年代至今海军重要的舰种之一，是以导弹、鱼雷、舰炮等为主要武器，具有多种作战能力的中型军舰。它是海军舰队中突击力较强的舰种之一，用于攻击潜艇和水面舰船，舰队防空，以及护航，侦察巡逻警戒，布雷，袭击岸上目标等，是现代海军舰艇中，用途最广泛、数量最多的舰艇。



易枢纽之地就能出发，进退有据。然而，这些港口相互间的距离，对于正规的合成军事行动而言并不那么有利。尽管如此，对非常规的、辅助性的行动而言，却有其优势，因为其本质就在于集中力量。

而对于破袭商业而言，分散力量却是规律。商业破袭舰船分散开来，他们就能发现与捕获更多的猎物，这些不争的事实从彪悍的法国海盗的历史中就能得很好的诠释。他们的基地与行动场所很大程度上处于英吉利海峡与北海，要么就在遥远的殖民地区。在那里，诸如法属西印度群岛之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之类的岛屿都能提供相同的临近庇护所。补充煤炭的必要性使得今天的巡洋舰甚至比旧式军舰更加依赖于其港口。

如果上苍这样设置一个国家，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本身。与此同时，它还控制着世界航运的一条咽喉要道。这样一来，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就会十分高。拥有这样得天独厚条件的当属英国。连荷兰、瑞典、俄罗斯、丹麦的商贸，以及那些溯流而上直入德国腹地的交易，都不得不

穿越近在家门口的英吉利海峡。

西班牙的地理位置十分近似于英国的位置。在大西洋与地中海，一边是加地斯，另一边是喀它基那。通向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的贸易，过去一直就在其眼皮底下穿过，而环绕好望角的商业活动距离其家门也并不遥远。然而，西班牙直布罗陀的丧失不仅剥夺了其对于海峡的控制大权，也对其两部分舰队进行十分便利的会合构成了一道障碍。

今天，只要我们看一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只要不涉及其他影响其海上权力的条件，就似乎可以发现，意大利具有广大的海岸与天然良港，它正处在一个可以对通往地中海东岸国家及岛屿贸易航道与苏伊士地峡产生决定性影响力的位置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并且只要意大利目前能够控制住那些一向就是意大利的岛屿，将来就更会如此。

然而，由于马耳他在英国人手里，科西嘉在法国人手中，其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又这样被抵消了。从种族血缘关系与地理位置看，这两个岛屿对于意大利而言乃是囊中之物，其合法性正如直布罗陀对于西班牙一样。如果亚得里亚海是一条繁忙的商业航道的话，意大利的位置本来是可以更具影响力的。它的地理完美程度上的这些缺憾，再加上有损于海上权力全面而又平稳成长的其他原因，使得意大利是否能在有朝一日跨入海洋强国的前列，更加令人感到疑虑重重。

具体环境使得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比其同等大小的任何其他水域更加重大的角色。从商业与军事观点来看都是如此。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努力试图控制它，并且这种斗争还将继续下去。

因此，对于树立在海洋中的统治地位所依赖的条件的研究，对于其海岸不同地点的相对军事价值的研究，都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现在来看美国。美利坚合众国相对于一条中美洲运河的地理位置。如

果该运河得以完成，并且完全满足了其建造者的愿望的话，那加勒比海将会从一个终点站、一块局部交往之地，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巨大航运枢纽。沿着这条路径，巨大的商贸利益将会延伸，将其他强国，比如欧洲国家的利益带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岸。而这一点是他们以前从未做到过的。

如果上述的运河得以完成。美国再要像从前那样，独自傲立于国际政局以外，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了。因为，美国相对于该航路的地理位置将会类似于英国之于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国家之于苏伊士航线。在这里，对它的控制，毫无疑问，肯定是依地理位置而定。当然，这必须以美国国家实力的中心作为永久的基础。

不过，由于其海湾沿岸的特征是缺乏从敌人那里获得安全并便利于维修一流战舰的港口，一旦发生为了争夺加勒比海统治地位的冲突，从密西西比河南部通道纵深到新奥尔良的邻近，从密西西比河河谷对于疏通水道的好处着眼，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的主要努力应该集中在运河的河谷，以此确保在那里能得到其永久的军事基地。

但是，保护进入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却有其特别的困难。尽管唯一的两处相互竞争的港口，基维斯特与彭萨克拉，过于缺乏深水，并且相对于这个国家的资源而言，其所处位置还要大打折扣。然而，为了完全取得该优势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一切好处，这些缺陷必须予以克服。而且，其相隔地峡的距离，尽管相对较短，却仍然可观。

为此，美国将不得不在加勒比海地区获取适宜于进行紧急的或次要的战争行动基地的地点，凭借它们的自然优势，易于防守性，以及接近于这个战略问题的中心，从而使得美国舰队同任何对手一样，始终临近于现场。

随着进出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得以充分的保护，掌握了此类的要塞，并且在它们与本土基地之间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简言之，已进行了恰当

的军事准备，拥有了所有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么，从其地理位置与实力出发，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就将十分肯定地接踵而至。

2. 形态构成

一个国家的海岸就是它的一道边界。这道边界越是能够方便地提供通向外部地区的途径（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中是指海港），一个民族就越是倾向于借此与世界的其他部分进行交流。

在一个假定的国家中，如果只是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却完全没有一处港口，这种国家就不可能拥有自身的海洋贸易、海洋运输以及海军。在实际生活中，当比利时还是一个西班牙与奥地利的省份之时，其情况就是这样。1648 年，荷兰人在一场获胜的战争后，作为一项和平条件，勒令须耳德河关闭海上贸易，从而封闭了安特卫普港，并把比利时的海上贸易转手给了荷兰。西属尼德兰从此不再成其为海上强国。

宽大与水深的良港是力量与财富的一个来源。如果还有可供航运河道的出海口的话，那就更是如此了。这会便利于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集中于此地。然而，由于其地理位置十分易于接近，如果不加以适当防卫的话，在战争中，这将成为薄弱环节。1667 年，荷兰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了泰晤士河，就在伦敦的眼皮底下，摧毁了相当部分的英国海军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说英格兰是为大海所吸引的话，那荷兰就是被赶向大海的。没有大海的存在，英国或许会一蹶不振，而荷兰则会败亡。在其荣光辉煌登峰造极的时代，它还是欧洲政坛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当时，一位本国

名声显赫的实权人物就估计到，荷兰的土地不太可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因此，该国的制造业为数众多且十分重要。然而，比起对航运业的兴趣，它们出现增长要迟缓得多。土地的贫瘠与海岸无险可守的本质驱使荷兰人首先从事了渔业。随后，加工保存鱼类方式的发现给予他们除了进行国内消费以外还能用以出口的物质，并由此奠定了他们财富的根基。

所以，在荷兰人成为商人之时，正是意大利诸共和国处在土耳其霸权的压力下，以及由于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其国势正开始衰落之际。结果，他们成为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以及庞大的意大利贸易的继承人。

荷兰人还进一步得益于他们的地理位置。作为波罗的海诸国、法国、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及德国各大河流口岸之间的居中者，他们很快就几乎揽尽了所有欧洲的中转生意。尽管，波罗的海沿岸国的海军仓储、西班牙与其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的贸易，法国的葡萄酒以及沿岸贸易并不比200年以前更多。然而，这些都是用荷兰船队加以运输的。更为有趣的是，连大部分英国的转口贸易甚至在当时都是用荷兰船完成的。



荷兰地理示意图

荷兰（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全称是荷兰王国，是位于欧洲西北部的一个国家，国土总面积为41864平方公里，濒临北海，与德国、比利时接壤。该国以海堤、风车和宽容的社会风气而闻名。首都设在阿姆斯特丹，中央政府在海牙。

荷兰人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取得如此之多的利益。其原因主要是其民众的贫困状况，他们被迫投向大海，

地带，联结不同港口的道路蜿蜒其上。

对意大利而言，只有对海洋的绝对控制才能完全确保这类交通线的安全。这是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一支来自可见视野以外的敌军在什么地点可能展开攻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要在中央部分驻扎一支足够分量的海上力量，就能在被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失之前，攻击那支逼近其基地与交通线的舰队。

再看美国。在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上，其底端就是基维斯特。尽管半岛地势平缓且人烟稀少，然而，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其呈现的状况类似于意大利。这种相似性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墨西哥湾成了一场海战的主要战场，由陆地通往半岛底端的交通线就显得很重要了，并且这条交通线将十分容易遭受到攻击。

当海洋不仅成为边界，或者四面环海，而且还将一个国家隔开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么对于它的控制绝对是必需的。因为，这样一种自然状况要么产生和增强海上霸权，要么就使得国家变得软弱无力，这就是目前意大利王国的状况。

因此，还在其年轻并且依然存在着财政窘困时，就应该建立起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海军。一旦拥有一支决定性地优于其敌手的海军，意大利就能比起其本土来，更好地将其霸权树立在各岛屿之上。如果不重要，一旦半岛交通线变得不稳定，必将被他国包围，其形势相当危险。

为了能更详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这样的例子。

分隔不列颠诸岛的爱尔兰海，与其说是一种实际分割，还不如说类似于一个港湾。但是历史已经显现出了从中对联合王国的威胁。在路易十四时代，当法国海军与联合的英、荷海军不相上下之时，在爱尔兰却存在着

最为严重的纠纷，当时这个岛国几乎完全处于土著与法国人的控制之下。

尽管如此，爱尔兰海与其说是法国人的一个优势，还不如说是对英国人的一个威胁，一个在他们交通线上的薄弱环节。然而，法国人并没有冒险将他们的战列舰开进到这片狭窄的海域，而试图强行登陆的远征队也只是把目标指向在南部与西部的英国海港。

在最为至关重要的时刻，大法兰西舰队被派往了英格兰南部沿海。在那里，大法兰西舰队决定性地击溃了同盟军。与此同时，25 艘护卫舰驶往圣乔治海峡，攻击英国的交通线。在奋起反抗的人民之中，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军岌岌可危，只是由于博因河一战及詹姆斯二世的逃往法国才得以幸免于难。

同一世纪的西班牙，当其各部分尚无法由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力量联结为一体时，他们为这种分隔所导致的劣势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时，西班牙仍握有的只是它昔日显赫一时的残余，比如尼德兰（今日的比利时）、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意大利土地。

然而，让人感叹的是，没想到西班牙的海上实力一落千丈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当时一位博学多才、头脑清醒的荷兰人宣称：“在西班牙，所有的海岸都航行着荷兰船只，自 1648 年和约以来，他们的船只和海员如此稀少，以至于他们开始公开租用我们的船只驶往西印度群岛，而在那里，他们先前总是小心翼翼地将所有外国人赶出来的。”

在半个世纪以前，萨利，这位亨利四世的重臣，就曾形象地把西班牙刻画为“作为一个腿与胳膊强健有力，然而心脏却无限衰弱与疲软的国家之一”。自从其诞生之日起，西班牙海军就不仅遭受到灾难，而且还被一扫而光。这样的后果是，不但使国家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且更是江河日下。一言以蔽之，其后果是，航运业损失殆尽，制造业也随之而消亡。

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除去阿拉斯加，美国并没有外部的占据之地，也就是说没有 1 英寸土地不能从陆地上到达。从特征上看，其轮廓到达了并没有呈现出多少特别薄弱之处的地步，边界地区所有的重要地段都能迅速到达。

更让人羡慕的是，若从水路通过，其成本将很低廉，若从铁路通过，则快速敏捷。就连防御最为薄弱的太平洋地区，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也将由此得到减少。可以说，与目前的需求相比较，美国国内的资源可谓无穷无尽。

这正如一位法国军官所说，美国可以无限期地在“我们的小角落里”傲然独尊，只要通过地峡，一条新兴的商业驿道将侵入这个小角落，或许美国就应该猛然警醒，面对那些挤掉了美国在所有民众、海洋之中共同分享与生俱来的权利与份额的人。

3. 领土范围

就海上霸权的形成而言，这里所说的领土范围并非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平方英里的总数，而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海岸线的长度及其港口的特征。关于这些，据称，在地理与自然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依据人口多少而定，海岸线长度就成了强大或弱小的症结。在这一点上，国家就像是一座城堡，警备部队必须被派驻于城郭之上。

关于这一点，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还能找到最新的相似事例。如果南方人能有一支能够作为一个海上强国且与其他资源相称的海军，那么，其海岸的巨大规模与众多的港湾是能够成为庞大力量的基本因素的。这样一来，合众国的民众和那时的政府应该对于封锁南方整个海岸的有效性而自我庆

幸。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一项十分了不起的功绩。但这只是假设而已，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由于合众国的舰船是沿着海岸稀疏地分布着，因此它们相互之间无法支援。这些舰船单独或一小组地坚守各自的阵位，面对着的却是广阔的内陆水路交通网，这一网络对于敌军的秘密集结大有助益。在水上交通第一线的背后就是漫长的港湾，四处散布着固若金汤的堡垒，依赖它们。敌军舰船永远都可以为了逃避追杀或寻求保护而退居其中。如果有一支南方海军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或者合众国方舰船零零落落的劣势，后者本来也是不太可能如同它们当时那样配置的，并且还将可能集结以进行相互支援，从而为南方商业打开许多小的但却有益的途径。

然而，从其范围广与港湾多的角度看，正如南方海岸本来可以成为一种力量的来源那样，由于策略与军队构成，这些特征却成了众多伤害的根源。

开启密西西比河的伟大故事就是对正在整个南方持续不断展开的行动的最具感染力的说明。在海疆的每一个缺口处，战舰正在长驱直入，昔时满载财富，支撑这个反叛国家贸易的河流，如今已开始反戈一击，坐视它们的敌人直逼其心脏地带。根据更为乐观的估计，在那些经过最为精疲力竭的战争，本来还可以使得一个国家保存下去的地区，却在四处弥漫着失望、不安全感与无能为力。海上力量从来没有比在这样一场竞争中扮演过更大或更具决定性的角色。

这场竞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在北美大陆呈现出的景观是一个伟大国家而不是几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尽管对于昔时应得的荣耀可以感到正当的自豪，对于由于海上的压倒性优势而产生的结局的辉煌应予以承认。然而，了解事实真相的美国人应该对国人那种过分自信加以提醒：南方不

仅没有海国，不仅不是一个海洋性的群体，而且其民众也没有被恰如其分地派驻到本应必须加以防范的濒海地带。

4. 人口数量

在思考完毕一个国家的自然状况后，紧随而来的应该是对于作为影响海洋权力成长的人口特征的一番考查。由于其与领土范围的关系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居住于其中的民众数量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仅仅只是平方英里的数目，而是必须加以考虑与海上权力相关的海岸范围与特征。

因此，就人口而言，这并非仅仅是指纯粹的总数，而是指从事于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或者至少能够迅速为航海业所使用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数量。这些都必须加以计算。

例如，在法国革命以前和直至紧随法国革命而来的波澜壮阔的战争结束之际，法国的人口都比英国要多得多。然而就海洋权力而言，无论是和平贸易还是军事效能，法国都要比英国大为逊色。就军事效率一事看，事实就更为明显。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初的军事准备方面，法国通常占有优势。然而，它却不能维持住。

因此，在 1778 年，当战争爆发时，通过其海上动员，法国能够迅速控制住 50 艘战舰。而英国则正好相反，由于其海上力量所充分依赖的舰队遍及全球，要想在本土集结 40 艘战舰都困难重重。然而，在 1782 年，它已有 120 艘战舰投入或准备投入战争，而法国则从来没有超过 71 艘。

直到 1840 年，当两个国家再度于地中海东部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位当时十分杰出的法国军官，说道：“在我们当时所能集结到的



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是 1789 年 7 月 14 日在巴士底监狱爆发的一场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起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

21 艘战舰队伍之后，就不再具有预备队了，没有别的舰船可以在 6 个月以内投入现役。”

他还说：“我们的海上动员已由于我们的所作所为精疲力竭到这种地步，在各个方面所建立的永久征召制度却不能征集到足够的后备力量，为那些已经巡游了三年多时间的人提供休整的机会。”

诸如此类的鲜明对照，正好显示出了所谓的永久实力或预备力量中的差异性。因为，除了船员以外，一支漂浮在外的庞大船队还必须雇佣一大批从事各种手工劳作的人员。他们的手艺有利于制造与修缮海洋装备，或随后的或多或少的与海洋有关及具有各种技巧要求的其他行业。从一开始，这类同质性行业就毫无疑问具备了对于海洋的倾向性。

这里有一件有关一位英国杰出的航海家爱德华·皮洛爵士显示出对于这一问题奇特洞察力的轶事。

当 1793 年战争爆发时，一向征招不齐的海员务必得以补充。皮洛急于出海迎战，然而除了使用陆上人员以外，别无他法可以补充其人员编制的缺额。他命令手下军官去招募柯尼希矿工，并且让他们很快适应了海上生

活的需要。战事的结局最终证明了他的明智。

此外，皮洛还十分走运，在一场战斗中，捕获了整个战争中的第一艘护卫舰。尤其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尽管他的矿工士兵投入现役才只有几个星期，而他的对手却呆了一年多，尽管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却几乎旗鼓相当。

或许可以认为，诸如此类的预备力量如今已失去了其一度拥有的那种重要性。因为现代战舰与武器装备的制造耗时甚长，现代国家意在发展武装部队的全面实力，打算在战争之初，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其敌人做出同等的努力之前，即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

使用一个为众所周知的术语，那就是没有时间再让国家结构的全面抵抗一露身手了。打击将会降临到组织起来的海军舰队头上，如果舰队失败了，那么，国家结构其余部分的稳定性统统都将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这一点是正确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过去只是在程度上不如现在，假定两支舰队迎头相撞，它们在实际当中代表着它们两个国家全部现役的实力。与过去相比，眼下就被歼一方想要为着那场失败再度复活其海军的希望就要渺茫得多，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其程度与这个国家对于海上霸权的依赖度相适应。

如果当时英国舰队正如同盟军舰队那样，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实力，那么，特拉法加一役本来对英国造成的打击要比对法国致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拉法加之对于英国正如奥斯特里茨之对于奥地利，吉纳之对于普鲁士。一个帝国本将由于其武装力量的歼灭或溃散而被迫屈膝，据称，这正是拿破仑向往的目标。

所以，对于过去这类罕见的战争灾难的思考足以证明，不重视基于适应一定种类的军事生活的居民数量之上的预备役力量是有欠考虑的。

目前，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与钢铁时代，它保持

住在风帆与木材的日子里所拥有的那种优势。法国与英国是拥有最大规模作战海军的两大强国。

迄今为止，两者之中究竟谁更加强大有力，尚有众多争议。实际上，它们或许可以被看成在海战的物质力量方面棋逢对手。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假定人员或战备方面的差异，能够导致一场战斗或一次战役决定性的力量失去平衡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预备性力量将要开始作出解答。

首先是有组织的储备力量。

其次是海洋性人口的储备、机械技巧的储备、财富的储备。

英国在机械工艺上的领导地位使其拥有充足的机械工程人员的预备力量。他们能够使自己轻而易举地熟练掌握现代化重型铁甲下的工具。而当其工商业倍感战争重负之时，多余的海员与技师又将投身于武装航运之中去。

至此，有关建立或不建立预备力量的价值的问题现在可归结为：

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否已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即：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中，一方将会仅仅在一场战役中告负而决定整个战争胜负天平的指向？海上大战并没有为此作出回答。

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德意志对于法兰西的压倒性胜利，看起来都是一名强者对于一个弱小得多的国家的胜利，而无论这种弱小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官方的无能。如果土耳其还拥有国家的储备力量可以征用，那么，类似于普莱文之围的那种军机延误又将会如何影响战争的胜负呢？其结果可想而知。

5. 国民性格

如果海上权力真正建立在和平与广泛的商业基础上，那么，对于商业追求的倾向性就肯定是在此一时或彼一时称雄海洋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历史几乎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除了罗马人以外，并不存在与此相反的明显事例。

所有的人都不会对追逐金钱无动于衷。然而，寻找收益的方式却会对居住于一国之内民众的历史与商业运气造成显著的影响。

如果历史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与他们一脉相承的民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式，不仅给其国民性格抹上了污点，而且对于商业的健康发展也是致命的。

因此，在美洲大陆的大肆搜寻，虽对于欧洲国家的商贸与海洋发展产生了一种动力，但其效果并不在新兴的工业领域内，甚至还不是对于探索与冒险的一种健康向上的刺激，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金块与银锭。

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情、强烈的民族情感，当这些品质融入西班牙的地理与所处优越的港口的长处时，事实是它成了占据广大而又富饶的新世界的急先锋。

在发现了美洲大陆后 100 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一直是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本来是可以指望它在众多海洋强国中力拔头筹的。然而结果却恰好相反，自从加入神圣同盟在 1571 年勒颁多一战之后，尽管它还投入过许多次的战争，但再没有任何有重大意义的海上胜利在西班牙历史的卷面上光彩夺目了。其商业的一蹶不振足以能够解释在其战舰甲板之上所显示

出的那种痛苦，以及荒唐可笑的笨拙无能。

毫无疑问，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由于西班牙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发展所进行的钳制与摧残。然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是可以突破或塑造其政府的性格的。几乎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众倾向于商业，那么政府的行为本来也是因循此道的，广大的殖民地也是远离着那种专制主义的中心的，而阻碍着古老的西班牙脱胎换骨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

事实是，数以千计的劳工与上流社会的人离开了西班牙。他们所从事的海外扩张活动，给予国内带来的别无他物，只有香料或其他少量商品，以至于一小支船队就能够满足其运载所需。更何况西班牙本土只能生产羊毛、水果与铁器，其制造业也空白一片。

西班牙的工业饱经沧桑，其人口稳中有降。在如此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西班牙及其殖民地都得依赖于荷兰人，以至于其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工业产品不足以与之抗衡。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因此荷兰商人腰缠万贯地奔波于世界大多数地方购买商品，肯定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了滚滚财源，并以此支付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就这样，他们曾梦寐以求的财富的象征很快就悄然离去。

因此，从军事观点上看，由于其航运的一蹶不振，西班牙是多么的虚弱不堪，它的为数不多的财富运载于几条船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穿梭于几条航线之上，要为敌人所捕获，可谓轻而易举。其结果已可想而知，这就是战争的中坚力量陷入了瘫痪。

比起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来，英国人与荷兰人并非不想发财致富。然而，他们更为明智与果敢，并且敬业，同时更具有忍耐力。正是凭借于此，他们追求财富不是通过刀剑，而是通过劳作。

因此，他们选择了通向财富最为漫长而非最为快捷的道路。然而这两个

民族——基本上是同一种族，还具有其他品质，虽不如刚才所说的特征那样重要，却能与其周边环境融为一体。这有助于他们在大洋之上有所成就。

就其根性而言，他们都是生意人、交易者、制造商与谈判家。因此，在其本土与海外，无论是定居于文明国家的港口，或者是东方国家的口岸，还是他们自己开拓的殖民地，他们都在到处努力榨取陆地上的各种资源，竭尽所能地开发与增加这些财富。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制造商而显赫荣贵，在海外，凡所控制之处，土地更加富足，产品成倍增长，本土与殖民定居点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换需要呼唤着更多的船队。

因此，他们的航运业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而持续看涨。

就这样，在许多方方面面，他们逼近了海上霸权。由于其他政府的干预，这一顺其自然的趋势与增长确实时常被加以扭转与严重的扼制。这些政府对于其本国民众只能依赖于人为的支持才能占有的繁荣嫉恨不已，而在政府行为的名义下，这种支持将会被视为是在刻意创造海上霸权。

对于建立海权而言，在进行贸易的倾向中就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要性，恐怕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那么，来自于大海的风险是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的。

（译者注：随着对石油、煤炭、钢铁等资源的需求的增加，21 世纪亚洲的发展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与抉择。）

然而，这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环境，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给深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

在法兰西，那种甚至为法国人自己也承认是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与此如出一辙。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有的想法，对于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何况腰缠万贯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对贵族的显赫那可是朝思暮盼。正是因为他们对这种荣誉的渴盼，使得他们抛弃了利润丰厚的事业。

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这使得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离开去。

在柯尔伯特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他的著述虽然不多，但其影响却相当广泛，尤其是《论法的精神》这部集大成的著作，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看法。

对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的最后影响。

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谕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

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一个国家伟大的根基在于金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力，就会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为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里，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对国家对于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样，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

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能感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他们最低程度地遭到本土的肆意干预时，他们的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话。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力并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远见卓识或谨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

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自我发展的种子时，来自于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结局。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不存在着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更加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

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监督，仔细地采纳量入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让殖民事业得到成长，那么，英格兰的这种系统性才干并不

能必定胜过法兰西。

然而，正是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宗主国国民的性格特征才是殖民地发展之道，而这却不是宗主国政府所关心在乎的事情。

现在，这一真理更趋明显，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态度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无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要其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就成了一头注定要被榨取的奶牛。当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顾。然而，主要还是作为一块地产，并因其作出的回报而被看重。对于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成了立法的绝对目标。在其管理机构当中，有价值的职位都提供给了来自于宗主国的占据者。正如同海洋，殖民地被视为十分适合于那些在宗主国国内无法管理或毫无益处之闲散人员的一块风水宝地。然而，只要其仍然还是一块殖民地，军事管制就会是宗主国政府适当而又必然的统治上的特征。

现在我们不妨试问一下，如果其他条件是有利的话，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成长为一个海上强国？

如果立法上的绊脚石得以铲除，生意上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趋于饱和，这个海上强国将会渐渐显出庐山真面目。对美国而言，他们对商业的直觉，追求获利的大胆的事业心，以及对于导致获利的蛛丝马迹的敏锐嗅觉，可以说已经万事俱备了。将来，如果存在有何种领域呼唤着殖民化，无可置疑的是，美国人将以其与生俱来的自我管理与独立发展的才干，径直奔向它们。

依照近代的看法，这一无法原谅的粗暴举措并不是与那时的国家精神完全格格不入的。主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格兰不惜一切代价宣称自己对于海洋的主宰目的的最初表述外，那种侮辱居然是由其一位最为胆怯的君主，对一名直接代表着法兰西最勇敢最骑士的统治者的使节发出的。所谓国旗这一空泛的荣誉感，除了作为一个政府目的外在表现以外，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宣誓。但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却一直得以坚持不懈，正如同在国王们统治之下一样。

在荷兰人1654年灾难性的战争后，克伦威尔绝对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暴君。他时时刻刻地敏锐意识到有关英格兰的名望与力量方面的所有事物，并且决定在增进这些名望与力量的空洞礼节上大步向前。

英国海军当时几乎还没有掌握海上的霸权，然而，正是在克伦威尔的高压统治之下，这支海军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波罗的海、地中海、北非这些地方，西印度群岛的英格兰舰队需要用英国的权力获得补偿。正是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之下，对牙买加的占领便揭开了通过坚船利炮的方式扩张其帝国的历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英格兰的贸易与航运业的增长保持了强劲有力的势头。

为了继续保持这样的好形势，著名的克伦威尔的《航海法》宣布，所有运往英格兰或其殖民地的进口物品必须使用属于英格兰本国的船舶、或属于所携带产品种植或生产国的船舶加以运输。这一法令的颁发主要是针对荷兰这个当时欧洲的公共运输国。然而，这一法令却因此在整个商业世界受到了普遍的憎恨。尽管如此，这一法令，在那些民族冲突与国家敌对的岁月里，确实给英格兰带来了好处，以至于在君主政体下，这样的法令能够得以长期延续。

到了纳尔逊时期，他延续了克伦威尔的做法。在他轰轰烈烈的事业尚



克伦威尔画像　塞缪尔·库珀绘

克伦威尔是英国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生于亨廷登，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的雪梨苏塞克斯学院，信奉清教思想。在1642—1648年的两次内战中，先后统率铁骑军和新模范军，战胜了王党的军队。1649年，在城市平民和自耕农压力下，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宣布成立共和国。1653年，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自任护国主。

未开创之前，就已通过在西印度群岛针对美洲商船实施同样的法令。这无疑显示出了他要为英格兰的航运业谋求福利的热情。克伦威尔死后，查尔斯二世登上了其父的王位。这位国王尽管惯于欺骗英格兰民众，却仍然对于英格兰的荣耀以及政府海洋政策传统忠心耿耿。这是源自他意在使自己独立于议会与民众。

在查尔斯二世与路易十四叛国性的勾搭里，他曾写信给路易道："对一个完美的联盟而言，这里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法兰西目前正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商业，并力图成为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海洋强国。这是引起我们疑虑重重的一个原因，而我们只能依赖于我们的商业与我们的海军力量才会占据一席之地。由于这一原因是如此之重大，以至于法兰西朝着那个方向所采取的每一行动步骤都将加深这个国家之间的猜忌。"

后来，在两个王国对荷兰共和国发动臭名昭著的进攻的过程中，在论及谁来统率法兰西与英格兰联合舰队时，曾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查尔斯在这一点上毫不妥协。他说："控制海洋，这是英格兰的传统。"

同时查尔斯还直率地对法国使节说道："如果他作出让步的话，他的臣民将不会听命于他。"

此外，在计划对于联合省的分割中，查尔斯为英格兰还争得了进行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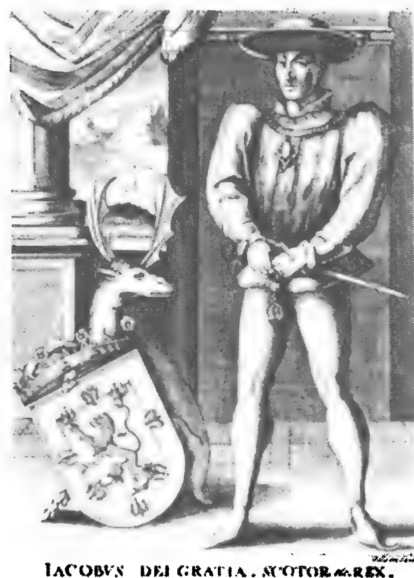
上劫掠的阵地，这些地点控制着须耳德河与缪士河的河口。在查尔斯统治下的英格兰海军曾一度继承了由克伦威尔铁腕统治下所创造的精神与纪律。

尽管后来英格兰海军士气普遍低落，这种状况成了其邪恶统治的主要特征。在这个时期，一个叫蒙克的人，曾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即：遣送走了其舰队的四分之一。

然而，在1666年时，蒙克却发现自己掌管着一支拥有极大优势的荷兰军队。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犹豫地就发起了进攻，并且一连三天战果辉煌，尽管也遭到了一些损失。

其实，这样一种行为并不是战争，而是一心一意地图谋英国的海上地位，并以此指导其行动。对于英格兰民众以及政府而言，这早就是他们的共识与追求，但这却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许多风风雨雨之后才确立了最终胜利的神秘符咒。在这里，做一点补充说明。查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本身就是一个有海员背景的人，他曾指挥过两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

当威廉三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时，英格兰政府便与荷兰政府携起手来，继续合谋专心致志地对付路易十四，并一直延续到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和约，确立了对法国的海上优势。这一过程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



IACOBVS DEI GRATIA . SCOTOR REX.

詹姆斯二世

詹姆斯二世，1633年10月1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圣詹姆斯宫，1701年9月16日逝世。从1685年到1688年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他是最后一位天主教的英国国王。在光荣革命中他被剥夺王位。

至此，英格兰政府愈发稳定，目标明确，继续推进其海洋统治的范围，促进其海洋霸权的成长。作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在海上，它痛击了法兰西。作为一个狡猾的朋友，至少许多人相信这一点，它耗尽了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可以说，英格兰是占尽了便宜。

当时，英荷两国的条约规定，关于海上力量，荷兰应有八分之三的规模，而英格兰却占八分之五，接近于荷兰的两倍。这样一个条款，再加上另外一条，即：使荷兰维持一支102000人的陆军。相比之下，英格兰只有40000人，这实际上就等于将陆地战争扔给了一个国家，将海上战争扔给了另外一个国家。英格兰的算盘打得是如此的精妙，让人不得不佩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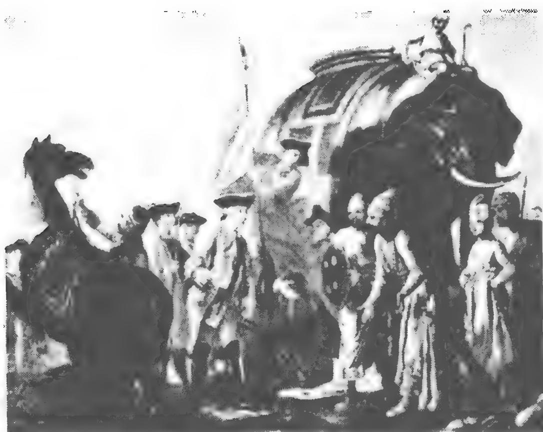
另外，通过乌得勒支和约，荷兰获得了土地赔偿。英格兰除了在法兰西、西班牙以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以外，还获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等至关重要的海上据点，以及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

从此，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从地平线上消逝了，荷兰的海军也因此而江河日下，而立足于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的英格兰政府因此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变英格兰王国为不列颠帝国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25年的时间里，和平造就了两个海洋强国，这是英格兰与法兰西国内执掌大权的重臣们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大陆政治风云变幻，到处滋生小规模的战争与转瞬即逝的条约，聪明的英格兰的眼光则坚定地汇集在了维持其海上霸权之上。

在波罗的海，英格兰的舰队遏制住了彼得大帝对于瑞典的不良企图，保持住了那片海域的势力均衡。正是从波罗的海，英格兰不仅获取了一笔巨大的贸易利差，而且也得到了其海军仓储的主要来源，要知道，沙皇正是力图要把波罗的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的。

至于丹麦，则力图建立一个得到外国资金资助的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与荷兰不仅禁止本国臣民参与其中，还对丹麦进行威胁恐吓，因此阻止了一项在他们看来必将与他们的海上利益背道而驰的事情。



东印度公司扩张

在欧洲历史上，一共有过多个被简称为东印度公司的企业，他们是英国、法国、荷兰等继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扩张后，17 世纪新兴的殖民国家为了处理在殖民地地区的一些事务而成立的机构。

在尼德兰，通过乌得勒支和约就已转让给了奥地利。在皇帝的恩准之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这一步骤意味着要通过须耳德出海口，从而恢复为他们所失去的贸易。当然，这样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上强权英格兰与荷兰的反对，并在数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扼杀掉了这一公司。

同时，在地中海，乌得勒支和约也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扰，而皇帝在当时欧洲政治的格局中，正是英格兰的一位天然盟友。在英格兰的拔刀相助之下，皇帝已经据有了那不勒斯，还宣称要用西西里岛去交换撒丁岛，但遭西班牙拒绝。不过，其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塞尔伯诺尼的掌握之下刚开始复苏，遗憾的是，在 1718 年的被帕萨诺海角之外的英格兰舰队击垮并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在英格兰的意旨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最终完成了摧毁西班牙的码头、船厂的使命。

此时，英格兰除了亲手握有直布罗陀与马翁港之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也在其盟友掌握之下。在西属美洲，英国所享有的通商权，当然这是趁

西班牙困难时强取豪夺而来的。当气急败坏的西班牙政府走上极端，改而进行镇压之时，主张和平和主张诉诸战争的两位英格兰大臣或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或为了此事对英格兰的名誉所带来的影响，提出要据理力争。英格兰的政策意在稳健地拓宽与加强自己对海洋控制的根基。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却对此视而不见。这无疑是为虎作伥。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上述事情呢？在欧洲政治家的眼中，这里正在稳定地并清晰可见地成长起第三种压倒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注定要被自私自利、侵略性地加以使用，尽管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比起任何先于它而存在的力量来说，这种使用还会更为成功。这就是海上霸权。

由于这种力量所导致的一举一动比起兵刃的碰撞要安静得多，因此，我们并不是那么经常地注意到，尽管在表面上正在足够清晰地崭露头角。

乌得勒支和约

1713年在乌得勒支签署的一系列旨在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和约，一方是路易十四和腓力五世，另一方是英国的安妮女王、联省和萨伏依公国。根据和约规定，各国承认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腓力五世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的欧洲属地被瓜分——萨伏依获得西西里和部分米兰公国的土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获得西属尼德兰、那不勒斯王国、撒丁尼亚和米兰公国的剩余部分。此外，西班牙割让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给英国，并给予英国奴隶专营权（西属拉美奴隶专营权三十年）。



几乎无法否认的是，在为海上霸权这一主题所贯彻下的一个时期内，英格兰建立起对海洋的控制地位，无疑是军事战略中的主要成分之一。

这一影响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就被预见到了。在此后12年的时间里，法兰西为统治者受个人危机所驱使，与英格兰携手并肩对付西班牙。

当1739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时，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已不止等同于西班牙与法兰西联合舰队。在接踵而至的近20几年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这种数量上的差距拉大了。

在战争中，英格兰最初只是凭直觉，后来意识到抓住此机遇极可能确立自己无与伦比的海上霸权，于是政府便主动引导。确实，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殖民帝国，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支撑。在严格的欧洲事务中，海上强权绝对是在当时能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的。

关于这一点，也就是说英格兰政府对于战争所奉行的政策，可由皮特的一篇演说辞来加以清晰地阐释。这是因为，皮特是那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代表。

这个叫皮特的人，对其政敌已缔结的1763年和约大加讨伐，他宣称："法兰西作为我们一个海洋与商业强国的大敌，你们却给予法兰西，使其海军获得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然而，英格兰的收获终究十分丰厚，其对印度的统治得到了保证，密西西比以东的北美地区都落入了它的掌心。从1815年以来，英格兰政府已经将非常多的东西递交到了平民百姓的手中。

由此可见，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在谋求海上权力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其民众的精神并完全意识到其真实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坚定，方向明确，最为光彩夺目的成功就会接踵而至。当民众的意志，或者他们最佳的自然的代表的

意志在此过程中占据某种较大份额时，这样一个政府肯定是最为稳定的。

然而，有得必有失。诸如此类的自由政府时常也会暴露出某种不足。专制国家运用其辨别力与持续性，能够频繁地造就庞大的海上贸易与一支威风凛凛的海军，比起自由民族通过缓慢的进度所能达到的程度来，具有更大的直接性。后者情况的困难在于某一特定君主死亡之后，能够依其体制的稳定性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

第三章

英、法海战的战略布局

——1778年英国与波旁王朝大海战

大不列颠与波旁王朝在1778年的战争，与美国独立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是一场纯粹意义上的海战。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角逐的场所，绝大部分远离欧洲，唯有直布罗陀只是唯一的例外。这是因为，直布罗陀位于一个地势崎岖，且又是一个难于接近的极端之地。在这场战争中，法兰西与西班牙两国完全将自己与中立国分割开来。因此，它们之间的厮杀角逐从未将那些与其利益无关的其他各方卷入其中。

下面，我将对这场颇具历史意义的海战进行分析。

1

1778年战争的主要参战国，一方面是大不列颠，另一方面是控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大王国的波旁家族。

然而，与这场战争有关的美国人目标则十分简单。就是将自己从英国人的手中摆脱解放出来。

而荷兰，虽然避免了来自陆地上的进攻，却在同盟国海军的帮助下，除了尽可能地去免除外部损失以外，并没有表露出多少试图有所作为的愿望。

因此，这两个小角色的目标可说只是中止战争。而主要参战者从其连续性看，其目标却是希望状况有所改变。

大不列颠的战争目标也十分简单，那就是阻止美洲殖民地分离出去的威胁。

当曾经心甘情愿的臣服者离自己而去之时，就必须维持暴力控制了，于是大不列颠拿起了刀剑来对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阻止这些海外领地的分离。

谁叫大不列颠如此厉害呢？以至于法兰西与西班牙以那些美洲大陆上反殖民事业的积极赞助者身份出现，都没有改变英格兰的目标。不过改不改变都无所谓了，这场战争无可避免。

由于法、西等国加入到其敌人的行列，英国人不仅丧失美洲大陆殖民地的危险性大大地增加了，同时也遭受到了丢失其他有价值领地的威胁。

简言之，英格兰就其战争目标而言，是严格意义上的防御性的。它担心丢失的东西太多，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指望看住自己手中拥有的东西。然而，通过驱使荷兰卷入战争，使其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因为，在没有增加其对手力量的情况下，好几处至关重要但却疏于防备的军事与商业根据地为其军队敞开了大门。

法兰西与西班牙的观点和目标更为复杂，传统的敌意和为尚不久远的过去报仇雪恨的愿望无疑占有很大的分量。这正如在法兰西也存在沙龙与哲学家对于殖民地民众争取自由斗争的同情一样。

然而，尽管情感上的考虑对于国家的行为影响甚大，但只有在满足它们的有形手段足可称量与计算之时，法兰西才能指望其北美领地能够失而复得。

因此，法兰西的主要目标是获取英属西印度群岛与落入英格兰之手的印度控制权，以及在适当的时间内确保美利坚合众国获得独立。这里面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让英格兰衰落，使法兰西壮大。

事实上，这场应该更趋声势浩大的角逐，可被说成是成为了赋予法兰西以生命力的动机所在。也就是说，在海上与政治上压倒英格兰。

而西班牙呢？西班牙所追逐的目标就是确保西班牙国旗在梅诺卡岛、直布罗陀或牙买加上空迎风飘扬。

这就是两国所追寻的目标，它们的介入改变了美国革命战争的整个格

乱，其力量应被分散。

作为那个时代里法国最为明智的政治家，托各特就认为，美洲殖民地不能获取独立则更符合法兰西的利益。如果起义由于弹尽粮绝而被弹压下去，他们派出的力量就丢给了英格兰。如果由于对某些控制性地点的军事占领而削弱，但又没有精疲力竭，进行不间断镇压的必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将是一个持续的弱势。尽管这一主张并没有在法兰西政府的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却包含着有效地塑造了那场战争政策的真理性成分。

如果对于合众国的好处成为了主要目标，北美大陆就会成为天然的军事行动的场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地点就会成为主要进攻目标。然而，作为法兰西的首选目标，它并不是要造福于美国，而是打击英国。健全的军事上的判断就注定了这场大陆上的角逐应该轰轰烈烈。这是一个为法兰西唾手可得的且令大不列颠精疲力竭地钳制。因此，13个殖民地的土地不应该是法兰西的主要目标，更不用说西班牙了。

由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业价值使得其成为了法兰西颇具诱惑力的目标。法兰西人以一种奇特的敏捷性，很快使自己适应了那一地区的社会状况。其中，他们的殖民地产已经十分广阔，除了它仍然握有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两块最佳之地以及瓜德罗普和马丁尼克以外，法兰西当时还占据了斯塔卢西来和海地的西半部。

此外，法国可能还指望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再增添英属安的列斯群岛，使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帝国热带附属之地能够完满无缺。尽管由于西班牙的敏感，法兰西被阻挡于牙买加之外，为这个结盟的且弱小的国家夺回那个宝岛还是可能的。然而，作为所占据之地，从而作为目标，无论多么尽如人意，对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军事占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对于海洋的控制。

因此，法兰西政府严禁其海军指挥官占据这些可加以占据之地，他们

使得留守部队成为了囚犯，摧毁了各种防御设施，然后便撤退离去。在罗伊堡的极佳军港中、在马丁尼克、在开普弗朗西斯、在坚固设防的盟军港口哈瓦那，一支足够规模的舰队都能找到优良、安全及供应充足的基地。而斯塔卢西亚早期的严重损失必须归结为法兰西舰队的管辖无方与英格兰海军统帅的职业能力。

在西印度群岛，交战各方因此发现各自在陆地上大致相等地得到了必要的支撑之地的援助。然而，仅仅对于其他地点的占领并不会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取决于舰队的数量与质量。为了安全地进一步扩大占领，获得海上的优势就成为了第一需要。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局部性的，而是涵盖着战争的整个领域，否则，占领就是不稳定的。而所需的增援部队，其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所要求的开支超越了目标的价值。

因此，西印度群岛局势的关键存在于舰队方面，它们成为了这场军事活动的真实目标。由于西印度群岛各港口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军事用途，它们在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充作了中介性基地。当陆军进入冬季作战期，舰队均退回至这些港口，情况就更是如此了。除了英格兰人攻占斯塔卢西亚以及1782年夭折流产的进攻牙买加计划以外，在西印度群岛的陆地上并没有出现过理智健全的战略性行动，直至要么通过战斗，要么通过令人振奋的集中兵力，取得了海上优势之前，并没有严肃认真地试图进攻一个军港，如巴巴多斯，或在可能的情况下，进攻罗伊堡。必须加以重申的是，局势的关键就在于舰队。

3

关于海上力量，一支武装舰队，对于美洲大陆的那场战争的影响也在华盛顿和亨利·克林顿爵士的看法中提及过。就其自身作为一个战场而言，在沙弗伦战役的条目下，尽管东印度群岛的情形已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讨论过，在这里仅需重复提及的是，在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优势的海上力量对于海洋的控制地位。占领亭可马里，尽管对于并无其他基地的法兰西海上编队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却如同占据斯塔卢西亚一样，是一场意外收获。本应只有在击败对手或敌军舰队临时缺阵时，才会得以成事，而法军正好捡了个便宜。

在北美与印度，较为合理的军事政策表明，作为真正进攻目标的敌军舰队也依赖于与本土的来往联络。这里仍然要提及欧洲，因为它与这场范围广阔的战争的关系要重要得多。可以十分明确指出的是，在欧洲，其政治上的让步成为战争对象的唯一两个地点就是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由于西班牙的一再催促，前者完全成为了同盟国的主要进攻目标，而对于两者的占据则十分明显地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

在某一场海战中，正如在所有其他的海战中一样，从一开始就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

一处位于边界的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是海滨地区，军事行动正是从那里得以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是海军舰队，其规模与素质应与所发起的军事行动相称。正如目前所举证的事例，如果那场战争扩大到了这个星球十分遥远的地区，那么，在每个这样的遥远之地都需要有能适用于航运的安全

港口，以作为局部战争中次要或临时性的基地。

在这些辅助性港口与主要的或本土基地之间，必须存在十分稳定的交通线，而它则取决于对中间相隔海域的军事控制。这种控制权的操作必须要由海军来加以执行，要么通过清除大海之上四面八方的敌军舰船，从而使得本国船舶得以十分安全地穿行。

要么通过武力伴随（护航）每一梯队为支援遥远的军事行动而必需的供给船只，对这种控制权进一步加以强化。

前一种方法旨在努力疏散国家力量，后一种则在护航处于一定重大关头之地，集中兵力于那一海域。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通过对于沿途适当分布却又为数不至过多的优质良港的军事占领，例如好望角、毛里求斯，无疑会进一步巩固交通线。诸如此类的据点总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就更是如此了。因为，比起以前的补给与供应，今天油料补充更加频繁。海内外据点的配合，以及它们之间来往沟通的状况，可被视为一般军事形势的战略性特征。依据这种特征，以及敌军舰队的相对实力，就能够确定军事行动的本质。何况，对于海洋的控制已被坚持视为决定性因素，敌军舰队被指定为真正的进攻目标。现在，可将先前的考虑应用到战争的整个领域，看一看同样的结论会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它，如果是这样，还可以看一看每一方的军事行动的本质又本应该是什么。

在欧洲，大不列颠的本土基地位于英吉利海峡，有两个主要的军需中心，普利茅斯与普茨茅斯。同盟国的基地则位处大西洋之滨，主要军港包括布列斯特、费罗与加地斯。在它们的身后，还有位于地中海的塔兰与卡塔赫那造船厂。在另一边，与之相对的则是英格兰位于梅诺卡岛上的基地马翁港，只是后者可以完全不加考虑。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它被局限

于一个防御者的地位，而英格兰舰队尚不能抽调出任何一支特遣部队前来地中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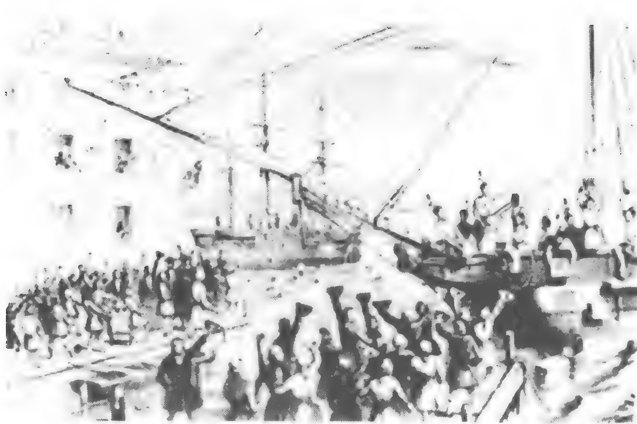
反过来，由于其地理位置，如果能被利用作为一支与其使命相称的舰队的基地的话，直布罗陀就能够有效地监视来往于海峡的特遣部队或增援力量。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未得以实现。

之后，英格兰的欧洲舰队被牢牢地绑在了英吉利海峡，即从事本土防御，并不定期地光临洛基，护送对于其守备部队坚守下去来说至关重要的补给品。马翁港与直布罗陀相比，所起作用仍然是有所差异的。

直至战争后期以前，这个地方也没有引起同盟国的注意，因此，在历经六个月的围困之后，就陷落了。

在北美，战争伊始，纽约、纳拉甘西特湾以及波士顿即成为了局部性基地。当时，纽约、纳拉甘西特湾尚为英格兰人所窃据。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应是北美大陆上最重要的兵站。它们易守难攻，且补给方便。

在此之前，波士顿就已落入了美国人之手，因此可供盟军使用。从这场战争实际发展的方向看，通过1779年将英格兰人颇具活动能量的军事行动分流到南方各州，波士顿便脱离了军事行动的主战场，并且从其地理位置上看，它在军



波士顿倾茶事件

波士顿倾茶事件，又称波士顿茶党事件，是一场由麻萨诸塞波士顿居民对抗英国国会的政治示威。它是美国革命的关键点之一，也是美国建国的主要国家神话之一。

事上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然而，如果通过占据哈得逊与尚普兰湖一线孤立新英格兰，向东一线集中军事力量的计划得以采纳，就会发现这三个港口本来都对时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纽约以南、特拉华、切萨匹克湾无疑为成就一番海上事业提供了颇具诱惑力的战场。

另外，出入口的宽度，缺乏保护濒临海边的海军基地和易于防守的阵地，以及由于试图占据众多的地区而导致的地面部队的分散，加上在那一年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内水土不服，使它们在最初的战役规划中无法担当起主要的角色。因而，没有必要将它们归类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之中。

在美洲大陆的南端，英格兰人被一种虚无的幻想所迷惑，指望能够获得那里的民众的支持。英格兰人的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仅仅是出自于那里的人民正遭受到压迫。然而，上天似乎有些垂爱英格兰人，这个看起来十分荒诞的计划居然实现了。其成败的赌注就压在了这样一次起义上了。查尔斯顿是这次战争的又一区域性基地，首先英格兰远征军在乔治亚登陆，18个月后，于1780年5月落入到英军手中。

在这场战争中，西印度群岛的主要区域性基地对英格兰人而言，有斯塔卢西亚，及在某种较小程度上还包括安提瓜。另外，顺风而下1000英里就是牙买加的主岛，在金斯顿拥有一座能力十分巨大的船厂。盟军依照这个主次轻重的顺序，首先占领了马丁尼克的罗伊堡以及哈瓦那，然后才是瓜德罗普与开普弗朗西斯。

在那个时候，战略形势的一个控制性特征就是信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海流。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占据有利的上风，甚至对于单艘舰船而言都是一项漫长而又艰难的使命。对于规模庞大的舰队来说则要更为困难得多。

可以理解的是，舰队只是出于自愿，或在确信敌军正在驶向同一方向

时才会驶向这些西部岛屿。正如在得知法兰西舰队已驶向开普弗郎西斯时，在圣茨战役之后，罗德尼才开赴牙买加。风势状况使得向风或朝东向的岛屿既成为了海战的区域性基地，又成为了在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自然交通线上的关节之点。

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两大战场之间，在大陆与小安的列斯群岛之间，其中横置着一块广大的中央地区，除非交战一方拥有较大的海上优势，或者除非在一处侧翼占据了决定性优势，否则，更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很难得以安全地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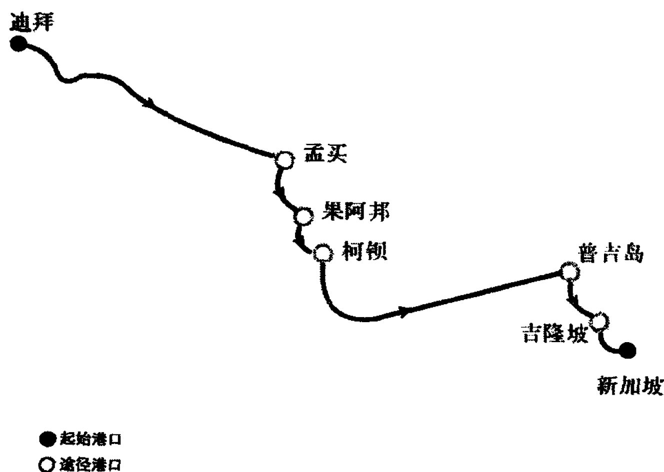
1762年，当英格兰占据了所有的向风群岛时，在海上确立起了无可争辩的优势，并无所顾忌地进攻并占领了哈瓦那。然而，从1779年到1782年，法兰西在美洲的海上力量与法兰西对于向风群岛的占据实际上使自己能够与英格兰分庭抗礼。这就使得在哈瓦那的西班牙人能随心所欲地在所提及的中央地区实现进攻彭萨卡纳与巴哈马的意图。

因此，诸如马丁尼克与斯塔卢西亚这样的据点对于目前战争来说，是具有比牙买加、哈瓦那及其他背向岛屿更大的战略优势的。当然，控制后者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好处，因为，由此西向而行将会比返航时迅速得多，而大陆角逐的关键之点实际上从一点出发并不比从其他之点出发更远。此外，被称之为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都同样具有这种优势。

至于巴巴多斯小岛向风而对时，其特别的优势只适合于进攻性行动。对防守而言，是十分困难的，一支大型舰队就能接近它，这支舰队甚至于能从罗伊堡这样一个近在眼前的港口出发。因此，这样一个奇怪的情形就出现了，原本打算最终在圣基特之前停顿下来的远征舰队本来是准备开赴巴巴多斯的，结果，却由于信风的暴虐而未能如愿以偿。在当时的条件下，巴巴多斯作为通向牙买加、佛罗里达，甚至于北美的交通线上的沿途避难

港，尤其适合于成为英格兰参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与军需库。而逆风 100 英里开外的斯塔卢西亚则被军队把守，作为舰队的前哨站卡，应该密切地注视的是罗伊堡的敌军。

我们再来看印度。在印度，这块半岛的政治状况明确地表明了东部沿岸的科罗曼德尔可成为战场。另外，亭可马里位于毗连之岛锡兰之上，尽管其状况不是太好，然而却提供了良好的、易于防守的港口，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其他所有的锚地都在海岸线上，这主要源自那里具有更为开阔的停泊之处。故而，从这一形势出发，在这一地区的信风与季风也具有战略价值。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秋分至春分时节，这股风有规律地从东北方向吹刮而来，有时还十分猛烈，掀起滔天巨浪拍打着岸边，使得登陆十分困难。



由迪拜通往新加坡的海上贸易途经孟买港

孟买港位于印度西海岸外的孟买岛上，西濒阿拉伯海，是印度最大的港口。它是南亚大陆桥的桥头堡，东起加尔各答，西至孟买，全长 2000 公里，是印度海陆空的交通枢纽。

然而，到了夏季，情况就不同了。盛行的风向来自西南向，使得海面相对柔和，天气也较往常为好。与之相比，9 至 10 月份的“季风更替”则通常伴有肆虐的飓风。从这时直至东北季风的平息，进行活跃的军事行动，甚至于停留在海岸边

都是不明智的。于是，在这一季节应退至哪一港口的问题就变得十分迫切了。亭可马里就是唯一的这样一处港口，在较佳的季节里，它能面对主战场和风向，也正是因为如此，进一步提升了其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

在这里，补充一点，英格兰人在印度西海岸的孟买港距离由于过于遥远，因此，并不能被视为一处区域性战争基地，正如同法兰西的毛里求斯与波旁岛一样，孟买应归类于位处与宗主国相连的交通线上的港口之列。

以上就是交战国各方在国内外的主要支撑之地或基地。必须表明的是，一般而言，它们都资源匮乏，而这却是构成其战略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海陆军的储存与装备，以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供海上使用的补给物资，都不得不从本土运抵它们那里。

但是，波士顿或许是这样一种断言的例外，其四周群居着富有而又友善的人群。哈瓦那也是如此，那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海军弹药库，造船业十分兴隆。只是它们都距离主要战场十分遥远，依靠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美国向邻国勒索资源过于迫切，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一无所获，而东、西印度群岛的遥远港口又完全依赖于本土供应。

因此，交通线的战略问题又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拦截一大队供应舰船是一场仅次于消灭一支战舰的军事行动，在许多备受关注的目标中，动用主力或通过逃避敌人搜捕的方式保护补给舰船，需要政府与海军指挥官调遣手头可用的战舰与特遣编队的高超技巧。

比如，坎彭菲尔德的游刃有余与北大西洋的德·吉尚的管理无方，再加上一股股狂风袭来，使得德·克雷斯在西印度群岛处境十分艰难。在印度洋的沙弗伦由于在大西洋的小股运输船队被拦腰切断，也遭遇到了同样的打击，只是后者曾让一度通过其巡弋舰船捕获英格兰补给舰船的成功而抵消了这种损失，并使其对手大伤脑筋。

因此，只有海军才能确保或威胁这些至关重要的生命线。

4

从欧洲到美洲的距离并没有使得中间供给港口成为绝对的必要。如果由于某种无法预见的原因出现了困难局面，那么，即要么就返回欧洲，要么就驶向西印度群岛某一友好港口。除此之外，无路可走。

这种情况有别于绕过好望角历经漫漫长路驶向印度。像比克顿于 2 月随同一支护航舰队离开英格兰，于 9 月抵达孟买时，就被认为战绩颇佳。而顽强的沙弗伦于 3 月起航出发，花费了相同的时间抵达了毛里求斯，再从那里开赴马得拉斯又花去了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不中途停顿以补充淡水、新鲜的给养品，以及通常被称为港口千篇一律事情的整修船舶，甚至当舰船储备品提供了必要物质材料时，几乎是无法进行这样一场时间跨度的航程的。

一条上等的交通补给线需要好几处港口，这些港口必须分布合理、防御充实、补给丰足。正如同英格兰目前所据有的、为昔日历次战争所收获的一些主要商业干线。在 1778 年战争中，没有任何交战方在这条线路上拥有这类港口，直至在荷兰的同意下，好望角置于了法兰西的控制之中并得到沙弗伦恰如其分的巩固。

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沿途的毛里求斯与在线路另一端的亭可马里，盟国与法兰西之间的交通线得到了相当合理的保护。英格兰虽然据有圣海伦，但为了补给和整修其驶向印度洋的特遣编队与在大西洋的护航队扩展到马德拉岛与维德角岛以及巴西港口，不得不依赖于葡萄牙的善意中立。对于

防御，这种中立的确是一种脆弱的依靠，正如在约翰斯顿与沙弗伦之间于维德角的那次遭遇战所显示的那样。

但是，由于具有几处可供停靠的场所，且敌人无法知道究竟会使用何处港口，这种隐秘性本身就会带来不小的安全。如果那位海军指挥官能够正确地派调其手中的部队的话，就像约翰斯顿在普拉亚港那样。

因此，港口的组合与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就构成了整个局势的主要战略构架。在进行讨论之前，有必要说明这样一种情况。这就是，获取信息的困难。

陆军穿越或多或少为固定居民所居住的疆域，在身后留下了征途的踏痕。但舰队就不一样，舰队都是乘风破浪，横行于大洋之上的，这就使得游荡者四处逃散。只是他们并非原地不动，当后面的海水纷纷回拢，甲板上偶尔一瞥的信号旗或许能够显示这些舰队的行动，然而却无从知晓它们的航程。此乃其一。其二，追逐者发出声响的风帆或许对于被追逐者一无所知，而被追逐者肯定是要先于追逐者的航程。但问题是，这并不意味着你能知道被追逐者的航线情况。

好在近来，对于海洋风向与水流的仔细研究已揭示了某些具有一定优势的路线，小心谨慎的水手会习惯性地加以追踪，并对其活动做出某种推测。但是，直到1778年，也尚未收集到精确的数据。更何况，即使他们拥有这些数据，由于许多可能原因中的一个，谁又能预测得万无一失呢？就算真的能预测出来，那这条最为快捷的路径也被经常加以放弃。这又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避开追捕或埋伏。

因此，在这样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中，优势在于追逐的一方。监视敌国的出海口，在进入那块寂静的不毛之地以前停止追逐，其巨大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样一种监视不再可能，下一步的最佳

对策就是径直奔向敌人的目的地，在那里恭候其大驾光临，而不是试图去探寻或许根本就不会加以采纳的路线。

然而，这也暗示了其意图所在，可能并不会总有收获。在捕杀约翰斯顿时，沙弗伦的行动在战略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在进攻普拉亚港时也是如此。关于这一点，罗德尼在 1780 年和 1782 年两次拦截通往马丁尼克的护航队的失败已显示出，尽管已经得知敌对方即将来临，甚至是知道对方的抵达地点，进行埋伏仍然是困难重重。这恐怕也是海战与陆战最大的区别之一吧！

5

任何一次海上远征，只有两个地点是固定的，这就是出发点与终点。后者或许并不为敌人所知。然而，直至起航时间，在港口某一力量的出现，不久即将行动的意图或许都能被设想为外界所知。对于交战的主动方而言，这已是阻止这一举措的紧要关头，对于防御一方来说，这更是特别与普遍地具有肯定性了。

因为，在其众多易于遭受攻击的地点，是无从知道究竟会在何处遭受威胁的，而进攻方却对自己的目标心中有数。假如远征船队不在两个或更多的港口之间被分散开来，就会保持更足的战斗力，因此，对于防御一方而言，阻止敌方舰队的集中是一件特别必要性的事情。

从其名称上看，防御一方可以被假定为不那么强大。因此，这更需要利用将敌军分而治之的策略。1782 年在斯塔卢西亚的罗德尼，他密切监视着位于马丁尼克的法兰西特遣舰队，以防止它们与在开普弗朗西斯的西班

牙人会合，这便是一个具有恰当的战略位置的事例。如果岛屿位置能使他置于法兰西人与他们的目的地之间，而不是在他们的后方，事情就再也没有比这设想得更好的了。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在那种情况下，他已尽可能地将事情做得最好了。

由于作为弱者，防御方不可能试图封锁住驻扎着敌军各个分支的所有港口，同时又不至于在每一支敌军面前都身处劣势而使自己的目的归于失败，这将有悖于战争的根本原则。如果它能正确地决定不那样做，而是在一两个地点集中一支优势力量，决定究竟在何处进行警戒，何处可以加以忽略就变得有必要了，并且这一问题应贯穿于整个战争政策的全过程。

1778 年英格兰肯定接受了防御方的角色。当时，面对着法兰西与西班牙参战的极大可能性，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次于同盟国海军，但是，在被称之为局势的战略特征、本土基地与海外辅助性基地中，总体上的优势仍在它的一边。英格兰的地理位置，如果其本身不是更强有力的话，对于战略效果来说，至少在地理上位置更佳。

然而，我们还要注意到战争的另一个要义，即足以承担起展开攻势的有组织的军队或舰队方面。在这方面，必须要做到于游刃有余地调动一支处于劣势的力量。具体步骤是，首先奔向大海，巧妙地摆开阵势，以更大的运动敏捷性抢在敌人的组合之前。然后是作为进攻目标，袭扰他们的交通线，集中优势兵力与敌军之主要分支对决，从而粉碎敌人的意图。

纵观整个战局，十分清楚的是，除在美洲大陆以外，任何一处维持战争都依赖于欧洲的宗主国和与它们相连的畅通无阻的交通线。如果英格兰人毫无顾忌地得以用其压倒性的海上力量绞杀他们的商业与工业的话，那么，美国人的最终溃败不是由于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由于粮尽弹绝也就是可能的了。

因此，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欧洲，以及欧洲相互敌对的造船厂。如果英格兰不能挑起一场大陆战争来对付法兰西，那么，它的一个希望就在于找到并击垮敌人的海军。再也没有比在其本土港口更有把握地发现这支海军了。在拿破仑战争中，这一点指导着它的政策，当时它的海军士气的优势已经确立起来，它敢于以劣势的力量去应对海洋与平静地摆放在港内为数更多且装备精良的战舰所共同构成的危险。由于能够从容面对双重危险，它也获得了双重优势，将敌军置于眼皮底下，让港内舒适的生活消磨敌人的斗志。而它自己的军官与海员却被艰难的游航磨炼得能够十分迅捷地响应每一征战的号召。

维尔纳夫海军上将重复着那位皇帝的话语声称道："我们没有理由害怕看见英国的特遣舰队，他们的 74 艘船在甲板上还没有 500 人呢！一两年的游弋已使得他们精疲力竭了。"

但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写道："塔兰特遣舰队在港湾中看起来威风凛凛，舰员们衣装整齐，训练有素。然而，当风暴来临时，所有的情况都变了，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风暴的锻炼。"



维尔纳夫海军上将

维尔纳夫(Silvestre de Villeneuve，1763—1806)，法国贵族出身，15 岁加入了海军。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支持革命，因此升迁很快。1796 年，维尔纳夫晋升为海军少将。在特拉法加战役中，维尔纳夫指挥的法西联合舰队惨败后投降，后被送到英国，1806 年 4 月获释，同年 4 月 22 日在巴黎死亡。

纳尔逊说："皇帝，现在才发现，如果皇帝们得知真相的话，他的舰队在一个晚上所遭受的损失比我们一年所遭受的损失还多。这些高贵的绅士们无从适应于狂风暴雨，而我们却在未损失一桅一坞的情况下英勇地与之搏斗了24个月。"

然而，必须加以承认的是，对于人员与舰船的损耗十分巨大，许多英国军官在这种消耗当中找到了反对将他们的舰队置于敌人岸外海中的证词。

"我们所经受的每一次打击，"科林伍德写道，"都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感，上次巡航使五艘大型战舰失去了战斗力，最近又增添了两艘。它们当中的数艘肯定被架上了船坞。"他又写道，"我几乎无从知道，这一持续不断的巡航在我看来已超过了人类天性的力量，科尔德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并垮了下来。我还被告知，格兰夫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除了人员与船只的过度损耗外，还必须承认，没有一种封锁能够有把握地遏制住敌军舰队的退路。维尔纳夫就从塔兰得以脱身，密西斯也从罗什福尔得以幸免。

"现在我在这里监视着罗什福尔港内的法国舰队，"科林伍德写道，"然而，却感到要阻止他们升锚起航并不那么切实可行。然而，如果他们从我身边溜走的话，我应倍感耻辱……唯一能防止他们起航逃避的事情，就是他们在不知道我们究竟精确地位居何处的情况下，不期然来到了我们中间。"

尽管如此，当时过分紧张窘迫的状况终于熬过去了。英格兰舰队围住了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岸，损失得到了补充，舰船得到修缮。对布列斯特的严密监视粉碎了那位皇帝兵合一处的梦幻。尽管困难层出不穷，纳尔逊的警惕之心却尾随着塔兰舰队，从其出发的那一刻起，横越大西洋，最后回到欧洲海滨。这还是在他们进行打击很久以前，在战略被撇在一边而战

术完成了特拉法加大业之前。

然而，正是一步接一步，一点捱一点，这群疲惫不堪但却纪律严明的海员，浑身锈迹斑斑、弹痕累累但却指挥有方的战舰，阻挡住了他们那群不学无术的对手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在敌军每一弹药补给中心面前都部署了部队，由小型战船组成的链条将它们联为一体。他们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遏制住敌军的偷袭。然而，他们却能有效地阻止住所有敌军待遣舰队的大规模集中。

6

实际上，1805 年的战舰本质上与 1780 年的战舰并无二致。尽管，毫无疑问，存在着进步与提高，然而，这种变化只是量度方面的，而不是种类方面的。不仅如此，而且 20 年前的英格兰舰队在霍克及其同僚的率领下，他们敢于闯入比斯开湾的冬季。

“在霍克的通信来往中，”他的传记作家说道，“并没有一丝痕迹表明他本人曾经怀疑过，称雄海洋，经受住冬季的风暴，以及他应不久就能真正地大干一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他的职责。”

如果认为比起霍克与纳尔逊的时代来，法兰西海军的状况要好一些，其军官的人格与训练素质有所提高，那是必须加以承认的事实。尽管如此，海军统帅部不可能长期不知道这类军官的数量仍然匮乏，以致严重地影响到海军的质量，海员的缺口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必要用陆军士兵来填补这一编制。至于西班牙海军的人事状况，没有理由相信它会比十五年之前更好。当时纳尔逊在谈及西班牙向法兰西让渡某些战舰时就曾说过：“我

想当然地认为，不会由西班牙人来操纵，因为那将是再度失去它们的最快捷的途径。”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相对于较弱一方而言，摧毁敌军舰船的最可靠方式就是在港口中对它们进行严密监视，一旦它们得以起航出发，就冲上去开战。这样做所遭受到的唯一有力的反对就是在欧洲。当时，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岸之外气候的暴虐，尤其是在冬季的漫漫长夜之中，这不仅带来了迫在眉睫的灾难，就连坚固、管理有方的战舰也几乎无法经受住，而且还造成了各种资源无计可施的持续紧张，因此需要大量储备舰船，以备替换那些遣派的舰船以供整修，或者替换舰船之上的水手。

如果执行封锁使命的舰队能够在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寻找到一块方便的停锚之地，正如同纳尔逊在 1804 年与 1805 年监视塔兰舰队时动用了撒丁岛的马达莱那湾一样。1800 年，詹姆斯·索玛尔兹爵士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海滨且离布列斯顿仅有 5 英里之遥的杜瓦纳内湾，以便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停泊封锁舰队中的近岸舰船。

从这一观点来看，普利茅斯与纽比的地理位置并不能被认为十分令人满意，并没有如同马达莱那湾一样位于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而是如同斯塔卢西亚那样，位处路线的后方。尽管如此，霍克证明，战舰的四处游弋与管理有序能够克服这些不利条件，这也如同罗德尼后来在他那处暴风雨并不那么肆虐的基地所显示出的那样。

确实，在特定时期，情况又并非如此。然而，当一般性地论及战舰的分配时，这种断言就是正确的。在欧洲，正好相反，在所提及政策的必然后果中，不列颠舰队通常都大大低劣于在法兰西与西班牙港口中的舰只。

因此，英格兰人若想以此发动攻势，只能极其小心谨慎，并且由于走运而与敌舰零星遭遇，除非获得的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胜利，否则由于交

的巩固。例如，直布罗陀就十分符合这些条件，因为它实际上固若金汤，所储存的补给品能够维持非常长的时间。

如果这种推断正确的话，那么英格兰在美洲大陆的处置举措就大错特错了。由于据有加拿大，以及哈里法克斯、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再加上哈得逊一线也在他们掌握之中，孤立一大片起义者的土地，或许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也应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本应被置于让当时的法兰西舰队无从下手的状态，因此得以确保守备部队的安全，防范来自于海上的进攻，并且使得英格兰海军的任务降至最低程度。一旦敌军摆脱了置列于某一欧洲军需中心之前的英格兰舰队的监视，堂而皇之地在北美大陆沿岸抛头露面，后者就会在那些港湾中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处。

相反，这两处港湾就会被置于虚弱不堪的境地，在一个类似于纳尔逊或弗洛格特这类的人物面前就会失陷。而在纽约的陆军两度被加以分割，首先开赴切萨匹克，随后又奔向乔治亚，而这两支各自为战的军队中的任何一支都没有强大到足以应付摆在前面的挑战。

在两种情况中，当英格兰陆军不分兵行事就无从在中间地带杀出一条血路时，对于海洋的控制就是旨在置敌军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夹缝地位。由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沟通完全取决于海军，因此，随着这条交通线的延伸，海军肩负的使命也相应增加了。

保护港口与漫长的交通线的必要性共同促使英格兰在北美的特遣舰队不断加以扩大，从而自然地削弱了位居欧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区的海军实力。因此，英格兰远征北美南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当德斯坦于 1779 年出现在北美海岸时，不得不迅速丢弃了纳拉甘西特湾，因为克林顿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既保护它，又守卫着纽约。

8

在西印度群岛，摆在英格兰政府面前的问题并不是要弹压揭竿而起的领地，而是要永保对于一些狭小但却物质丰富的岛屿的使用权。不仅如此，还要占据这些岛屿本身，使它们的贸易尽可能的不致遭受敌军的劫掠。

无须重复的是，这相应地要求既要对付敌军舰队，又要对付单枪匹马的巡弋敌舰（或者说商业破袭舰）。由于没有任何一种警戒状态可以阻止它们全部偷偷进入港口，因此，在西印度群岛水域必须有英格兰的护卫舰与较轻型的舰船加以巡逻。

然而，如果可能的话，比起在某一地点由一支英格兰舰队进行遏制来，完全彻底地将法兰西舰队赶走肯定会更好。由于英格兰局限于防御状态，因此当处于劣势时，总是易于损兵折将。实际上它逐渐被加以削弱，在突然袭击时，它的大部分岛屿也逐一丧失，并且在不同时期，在某一港口的轰击下，它的舰队往往会沉默不语。而其敌人，当他发现自己身处劣势之时，就会等候着增援部队的到达，他知道等待期间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一尴尬场面并不只限于西印度群岛。该群岛毗邻于美洲大陆，使其永远可能在防御方弄清其意图之前，进攻方得以集中两个方向的舰队，虽然这种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于人所共知的气候与季节状况。出于这原因，1780 年与 1781 年的事件显示出了英格兰最能干的海军将领所感受到的复杂性，尽管他们的战术运用存在着弊端，但却反映出了他们内心的迷茫。当对大英帝国的繁荣所依赖的贸易的极其关切平添了几分这种困惑之时，对于防御一方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必须承认的是，不列颠海军将领在西印度

群岛的使命既不轻松也不简单。

在欧洲，由于缺乏如同在西半球那样的大型特遣舰队，这也可以归结成为丢失梅诺卡的主要原因，英格兰自身与直布罗陀的安危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同盟国的 66 艘战列舰与英格兰东拼西凑弄来的 35 艘战列舰迎头相撞，并且将它们全部赶进港口之时，对于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终于落到了法国人手中。拿破仑认为，这将使法国成为英格兰的主人。一连 30 天，组成法兰西特遣舰队的 30 艘战舰巡弋于比斯开湾，等待着行动迟缓的西班牙人的姗姗到来。然而，他们并没有受到英格兰舰队的骚扰。

直布罗陀不止一次地面临着饥荒的阴影，缘由即在于与英格兰的交通线中断了。对于它的救助终获成功并不是因为英格兰政府所适时派遣的舰队的如何强大，而是由于英格兰军官高超的指挥艺术和西班牙人的无能。在最终的大拯救行动中，英格兰舰队仅仅只是以 34 艘面对同盟舰队的 49 艘。

在当时英格兰所历经的艰难险阻中，哪一条出路才是允许敌军自由进出其港口的，这让英格兰很是困惑。

“请让我告知勋爵阁下，”纳尔逊写道，“塔兰港从来就未曾为我封锁过，恰恰相反，敌人获得放马出海的充分机会。因为正是在那里，我们才能指望实现我们国家的希望与意图。”

“如果他们打算出来的话，”他又说道，“不会有什么事情使法兰西舰队龟缩于塔兰或布列斯特。”

尽管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夸张。然而，试图将他们锁闭于港湾之中的任何举措都将一无所获，这一点却是正确的。纳尔逊之所以抵近他们的港口，恰当地布置数量充足的警戒舰船，就在于打算知道他们何时得以起航，去了哪个方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便“尾随他们到地球另一面”。

“我趋于相信，”他在另一场合写道，“法兰西的费罗尔特遣舰队将会



纳尔逊

纳尔逊，1758 年 9 月 29 日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伯纳姆索埔镇。英国海军上将，被誉为英国皇家海军之魂。12 岁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被“敬畏”号上的狙击手击中，之后死在了“胜利”号上。

开赴地中海，如果它在塔兰与其他法国舰队合兵一处，他们将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但是，我可不愿意找不到他们，皮洛（指挥着费罗尔外海的英国舰队）将会紧追不舍的。”

在那次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由于气象的恶劣，封锁舰队的暂时退场，或其指挥官的判断失误，使得法兰西舰队的各分支得以脱逃的事情简直司空见惯。然而，警报很快就能得以发出，众多游弋的护卫舰只中的一些总能发现他们的踪迹，并尾随其后以探明他们可能要走的目的地，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从一支舰队到另一支舰队，信息得以传递，结果不久一支势均力敌的特遣舰队便能尾随他们之后了。

按照法兰西政府传统上对于法兰西海军的使用方式，由于他们的远征并不是为了与敌军舰队决一高低，而是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随之而来的愤怒的滋扰与狂热的追逐都无助于不受干扰和按部就班地执行政府所制定的计划，甚至由一支分舰队去做。而对于大规模的会合而言，由于取决于将各港口的分舰队统一起来，他们就是绝对致命的了。

至此，1798 年战役，尽管在尼罗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当远征

舰队开拔之时，由于在塔兰前面并无任何力量，由于纳尔逊得到的护卫舰只并不充足。因此，仍可被引征为一个几乎要导致失败的事例。1808 年，冈托姆在地中海九个星期的游弋也显示出了甚至在狭窄的水域控制住一支被允许出海，且并没有遭到一支强大力量监视的舰队的困难程度。

9

商业破袭战作为战争中一种主要的可以依赖的手段，针对于一个如同大不列颠这样的商业性国家时具有特别的效果。那一时代的法兰西军官在很大程度上都持有这种观点，现在在美国更是得到广泛认同。

“在我看来，对付英格兰的最可靠方式，”一位颇有名望的军官拉蒙特·皮魁特写道，“就是在商业上对他们进行打击。”

通过认真地袭击其商业往来，对一个国家所带来的骚扰与苦恼为众人所承认。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海战中最具重要性的辅助性行动，并且直至战争本身终结以前，还不可能对之加以抛弃。

然而，作为一项主要的、根本性的措施，认为其自身就足以致敌人于死地，这恐怕也只是一种幻想。当这种幻想呈现为一种蛊惑人心的廉价表象时，它就更具有一种危险性。当所要反对的国家具有一个强有力的海上大国的两个先决条件（遍及全球、健康向上的商业以及一支实力强劲的海军）时，这就尤其具有误导作用。

在一个国家的收入来源及工业可以被浓缩进一些珍宝船的地方，一次攻击就可能割断其战争的筋脉。然而，当其财富分散于数以千计的来往穿梭的船只，当这种制度的根系扩散广泛且深远，并能深深地扎下根来，在

并不会危及生命根本的情况下，它能承受住许多次的残酷打击，并丧失掉众多枝繁叶茂的大枝的，唯有以军事控制海洋的方式，通过对于战略性商业中心的漫长控制，这样一种攻击才会是致命性的。

因此，毫无疑问，从一支强大的海军手中夺取这种控制权只能通过兵戎相见，并且战而胜之。200 年来，英格兰一直是世界上的主要商业国家，相比其他国家，它的财富在战争时期正如同在和平时期那样，更多地寄希望于海洋之中。而在所有的国家中，它一度最不愿意承认商业具有豁免资格以及中立国的权利。这并不被视为一种权利上的事情，而是一种政策，历史证明这种拒绝是有道理的。如果它还全力以赴地维持其海军，毫无疑问，未来将重复历史的教训。

大不列颠与结盟的王朝之间的预备性和约，旨在结束这一次波澜壮阔的战争，并于 1783 年 1 月 20 日在凡尔赛签署。

这个协议带来了可观的成果，在欧洲交战国之间，除了多巴哥以外，英格兰从法兰西收回了所丢失的所有西印度群岛，但放弃了斯塔卢西亚。法兰西在印度的据点得到了恢复，而亭可马里由于为敌人所占有，英格兰不可能争辩要将其归还给荷兰，然而它拒绝让渡内格帕顿。

对于西班牙，英格兰交出了佛罗里达与梅诺卡。如果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持对于后者的占据的话，那将是英格兰的一次严重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下一次战争中，它再度落入了大不列颠之手。此外，条约还对西非海岸贸易据点进行了某些无关紧要的重新分配。

尽管就它们本身而言都无足轻重，然而仍有必要对这些安排作出一番评论。在任何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它们的持久性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片尚未由战争确定其归属的海域中的帝国。

于是，最终和约于 1783 年 9 月 3 日在凡尔赛得以签署。

第四章

东方和西方海洋权益的碰撞

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国家观念不强，军人这个职业也名声欠佳，从军被认为只会教人好勇斗狠。日本在50年之前也还处于封闭之中，所以日本无法分享欧洲的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其他东方国家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水平就更用不着多说了。

在上述背景下，西方国家尽管相互间一直争斗不断，但对于远东国家则采取了同样的行为方式，其结果就是西方在整体上成为了主宰东方的力量，就如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继在欧洲执牛耳，而德国今天又在欧洲大陆占据压倒性优势一样。

上述情形是多个世纪的演变结果，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逆转，不过日本也确实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所能取得的成就。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国土的狭小及长期与外隔绝使日本人凝聚成了一个小而紧凑的集团。

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按照《马关条约》，清朝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1896年俄国与李鸿章签订秘密《中俄密约》，取得通过满洲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权利。1903年，横贯北满的东清铁路和纵贯整个满洲的东清铁路南满支线全部完工，铁路枢纽哈尔滨成为旅顺之外俄国在满洲的第二个重要据点。从此俄国在满洲取得极大的优势，独占在内满洲的殖民利益，引发日本强烈不满，以至战争。



进行集中。从而控制了不仅就个体而言缺乏有组织的力量、而且整体上也不能联为一体的东方国家。就相互间联系的松散程度而言，大多数东印度人比欧洲封建主义鼎盛时代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采邑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在中国，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国家观念淡薄，军人这个职业也名声欠佳，从军被认为只会教人好勇斗狠。日本在50年之前也还处于封闭之中，所以日本无法分享欧洲的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其他东方国家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水平就更用不着多说了。

在上述背景下，西方国家尽管相互间一直争斗不断，但对于远东国家则采取了同样的行为方式，其结果就是西方在整体上成为了主宰东方的力量，就如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继在欧洲执牛耳，而德国今天又在欧洲大陆占据压倒性优势一样。

上述情形是多个世纪的演变结果，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逆转，不过日本也确实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所能取得的成就。当然，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国土的狭小及长期与外隔绝使日本人凝为了一个小而紧凑的集团。

在长时间的独处中，日本人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关于这一点，这在几年前的战争中已得到充分的显示。这种气质连同日本人口的少而集中、日本人的尚武传统以及源于幕府体制的地方对中央权威的遵从使日本相对容易调动全身的能量。

另外，英明的领导者和适当的时机对一国的成功必不可少，而日本在这方面也是幸运儿。历史上，好端端的机会因领袖才能的缺乏而付之东流的例子屡见不鲜，如今的日本却是两者兼而有之。

尽管东方的变革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毫无疑问的是，如今某种认识正日益有力地促使拥有人类一大半人口的东方国家发生变化。就目前看来，这种认识更多是源于对西方的控制或干涉的不安，而不是源于自觉的、冷静的进行内部更新的精神。不过，也正是这种精神能让一个国家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当然，这种多少有欠积极的情形在日本身上显现得并不突

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幕府是古时日本一种权力曾一度凌驾于天皇之上的中央政府机构。其最高权力者为征夷大将军，亦称幕府将军。日本的军事强人以成为征夷大将军为志向，开设幕府，为军人的最高指挥机构，并且掌握政权，只在形式上取得天皇授权。



方国家的胜利所震撼。对于西方的物质优势而言，中国也有着长期的认识，不过这常常是在经受了严酷的实际体验之后。比方说，在日俄两国缔结了朴次茅斯和约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看来似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日本这个和中国近在咫尺且又有着亲缘关系的国家。如果在学习和运用西方成果方面，中国人也能具备日本人所显示出的聪明才智，他们或许能更容易、更自然地习得西方传授的本领。

此外，中日之间距离很近、旅行费用不高也具有意义，中国人因此曾大批前往日本留学，不过目前这股浪潮已大为衰退。实际上，无论中日两国在抵御西方的控制方面有多少共同语言，地理上的过于靠近和国民性格的极大差异将使这两个国家难以进行政治合作，更不用说结成联盟了。地理上的邻近是一个公认的国际摩擦的根源。满洲就不仅是中国、日本和俄国的连接点，更是三方的利益交错、碰撞之地。有理由相信，即使这三个国家之间能保持和平状态，它们相互间的政治对立和防范心理仍会继续存在。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满洲对于远东将具有 17 和 18 世纪的比利时对于西欧所具有的重要性。

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抑武力的倾向。但，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主要源于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

因此，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掘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虽然中国的庞大无疑使这个目标不会很快地实现，但变化的和缓对中国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尽管中国的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国政府也依然保有统治权威。对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言，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以及旨在使势力范围得以建立或承认的尝试并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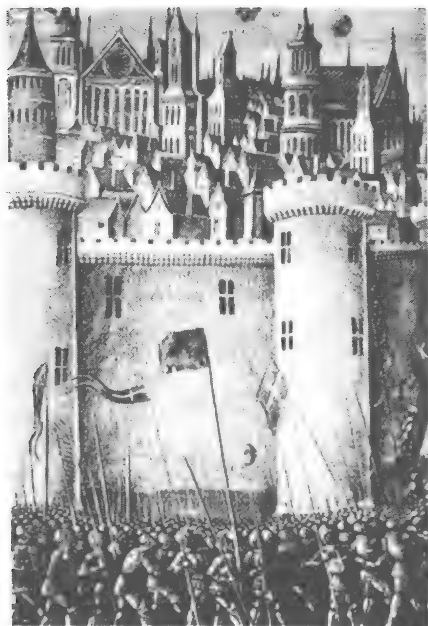
但是，别忘了，中国人在种族上也是同一的，虽然他们相互间有着地

3

无论东方各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要经过多长的时间，要显示出怎样的特点，东方各国必然会像欧洲和北美各国那样经历一个过程。这就是必须将自己从没有多少内部凝聚力的集团转变为民族国家。不过，幅员和人口使印度和中国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很快地渡过这个阶段。

而且，印度和中国的政治遗产也不会让它们像在 1783 年至 1789 年间成功地完成了立宪过程的北美 13 块殖民地那样轻松自如地实现政治变革。但在另一方面，从西方引入的交通联络手段却有助于强化国家权力。

也就是说，在东方国家进行自身整合的同时，它们与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关系还会得以延续与发展。就如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国家一直维系着与我们今天所称的近东地区的联系一样。阿拉伯人向法国南部的推进、十字军的东征、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扩张就



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是 1096 年到 1291 年发生的六次宗教性军事行动的总称，是由西欧基督教国家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的战争。由于罗马天主教圣城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徒手中，因此，十字军东征大多数是针对伊斯兰教国家的，主要的目的是从伊斯兰教手中夺回耶路撒冷。东征期间，教会授予每一个战士十字架，组成的军队称为十字军。十字军东征使西欧接触到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种接触，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

如果欧洲如从前一样还有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海军强国，这种情形比当前现实更能直接地影响到日本和美国这两个欧洲之外的海军强国的利益范围。当日本于 1902 年和英国初次结盟之时，后者还握有海军上的绝对优势。因为，英国海军既可以有力地照应到远东，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在其他地区的优越地位。当这两强标准切实得到了贯彻时，即便日本缺乏战列舰力量也不足虑。可让人意外的是，英国后来还是采取了干涉做法，这对于日本下一次对俄国的战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说，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一旦实施会具有深刻的精神及物质的影响。对敌人施以令其措手不及的进攻就产生类似的结果。比如，在 1895 年，法国、德国和俄国迫使日本把包括旅顺港在内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了中国。虽然英国反对这个行动，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归还的地盘又被中国租借给了俄国，但由于当时准备尚不充分，未能下定决心，何况形势也难以逆转，而日本又没有战列舰力量。因此，到了 1904 年，英日同盟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这是英国采取的一项积极步骤。

此时，日本已有了一支战列舰舰队，英国海军仍是首屈一指，而无论德国还是法国都不积极支持俄国。德国的实际政策就是如此，法国则是力不从心。在日俄战争中，如事实所表明的，日本在它自己的北海区域作战，英国则替它在欧洲一端照应一二。这个情形体现了不同国家海军之间的分工。尽管英国海军当时并无战斗任务，但它的行动却明显是军事性的，起到了威慑作用。比如，在 1898 年，对于干涉美西战争的建议，英国表示它不仅不支持，而且还要反对。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英国海军在那时同样是一支威慑力量。

上述情况也说明拥有并运用武装力量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人们可以而且实际上常常在不引发战事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力量。只要运

用得得心应手，便能够和平地达到目的。尽管如此，手无寸铁也根本不能保障和平。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个贴切的例子所在。在当今时代，在一般的意义上，没有哪个参战方比南北战争中的双方还要对战争缺乏事先准备，这场战争之所以成为了自滑铁卢之战以来历时最长的战争，就是因为双方准备的缺乏使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是半斤对八两。不过这个局面最终还要消失，北方有着资源上的优势，而南方从军事观点看只能将实现分离寄托于其对手的缺乏耐心上。

5

如前文所说，作为欧洲大陆强国的法国可给英国以海军支持。这种安排的一个缺点是，它一旦成为现实，就是一种战争行为，且会导致陆上战事。但问题是，当前还没有哪个大陆国家能单独和德国交手于陆上。这不是说法国陆军不堪一击，何况法国自 1870 年以来一直精心构筑边境防御工事。实际上，法国针对进攻和防御采取的措施使法国的武装力量虽然确实仍逊于德国，但依然可为法国提供相当的安全。这即可促使法国的对手三思而行，不敢贸然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彻底撕破脸皮。

那法国和德国之间此时到底有何分歧，或者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政治立场？法国人认为是德国在 1905 年迫使法国政府解除了其外交部长的职务，而法国之所以受此羞辱就是因为当时法国根本没有做好军事准备，一年之后，面对着同样令自己难以忍受的要求，法国采取了抵制态度，绝不退让。这时，德国也只好降低其调门，这源自当时法国所作的相当的军事准备令其不可小视。

由于档案保密制度，我们不可能完全如实地了解当今的国际事件，但上述情形就是欧洲局势给人的一般印象，而且人们还相信德国将继续推行盛气凌人的外交，只要它一直保持现有的军事优势。这个优势连同其他政治需要使奥地利注定要将自己和德国拴在一起，它们组成的陆上同盟在目前是强大无比的。和英日同盟中的情形一样，在德奥同盟中，奥地利的作用不是必不可少。不过，只要知道它在关键时刻必然会有所动作，那也就够了。

上述态势对协约国自然不利，除非战争的代价让德国有所顾忌且不敢一意孤行。所以，协约国应该增加自身实力，不过目前它们尚远无力量既抵御德国的侵略性海军行动，同时还要在陆上和后者周旋。

强大到足以使敌手不敢轻举妄动是一回事，能够在冲突发生时战而胜之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在和平时期，没有哪个欧洲海军国家能给英国在地中海的现有地位以支持，英国只能自食其力。一旦奥地利有财力将自己朝思暮想的重型舰队化为现实，英国会更觉吃力了。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英国海军在世界政治中的举足轻重作用，同时也表明了目前只有两个海军国家由于和德国不在陆地上接壤，有能力以海军力量帮助英国，就是日本和美国。放眼未来，这两个国家需要考虑英国的海洋霸权落到德国手中是否符合它们的利益。这种变化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就今天的情形而言，除了在开放海域，美日两国和德国之间不可能有实际接触。而英国则在每个角落都有其海洋边界，在任何它不具有海军优势的地区都易受攻击，比如对澳大利亚和其他英国的东方地盘而言。这一点，连美国都可以通过对易受陆上攻击的加拿大施以影响来制约英国。

6

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英国的衰落将德国海军推上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和强大的德国陆军相配合，那么德国海军完全有能力实施远洋行动。英国在自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至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一段长的时间内，能够这样做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其原因不在于英国海军的强大本身，而在于岛国地位使强大的英国海军在本土及海外都可以有效发挥作用。

今天，英国的财政困难、俄国的组织涣散和法国的为人口众多所累都使德国的未来行动能力无形中趋于增强。尽管和德国相比，英国更为富足，但长期养尊处优的英国人不如德国人有经济上的忍耐力。而且，个人自由传统也使英国人或美国人不愿紧紧地受束于组织及对个人行动的规范，而正是这些使德国立于强国家之列。

今日的德英竞争不仅是欧洲政治、也是世界政治的紧张根源。这不是说不存在其他棘手的问题，相反其他问题也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突然地引发大火。这好比有火必有柴，隐于英德对抗背后的是双方间的利益分歧和猜忌，它们所基于的就是维系着两个民族的福祉的工业和商业。

英德之间激烈的工业和海上竞争不是自克伦威尔时代及其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就有。当时英国是从荷兰那儿夺得了后者凭借曾经无敌的海军而长期把持的商业霸主地位。尽管当今的现实广为人知，可是很少有局外人能清楚地认识到德国扩张的幅度以及使其颇具意义的从过去至将来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很多人能认识更遥远的过去，并考虑是怎样的强烈情感伴随德国人不断地取得工业和商业成就。

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既理解上述情感，同时也不忘记在世界政治中德国的进展正使人们有所不安。就此而言，英国和法国、俄国，后两者在不久之前和英国还处于传统的对立之中，然而，逐渐结成协约国集团是情理之中的事。一位德国首相将此谴责为旨在包围和孤立德国，不过三个国家采取上述行动大概确是为了维持欧洲及世界的均势，回应德国的四面出击以加强自己在海洋及商业方面的地位的明显企图。

人们不应一成不变地认为这类想法根本不是冒犯他国的合理理由，但认为不应对其保持警惕并进行制衡又另当别论了。历史已表明，任何勃勃雄心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侵略性的因素，只有以强力应之才能不使其超出限度之外，才能使平衡得到保障。而均势的维持正一直为欧洲政治家迫切关注。

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不自觉地但又不可避免地日益和欧洲融为一体，因而欧洲的事情也应为美国人所关注。当美国和西班牙进行战争时，在欧洲，门罗主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兼而有之，而德国据一般报道应属于后者，美德两国在菲律宾问题上的不愉快无疑使这点更显明。毫无疑问，如果当时的德国拥有它如今正在筹建的强大海军，它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地位会更加有利。而美国的支持者也会面对极为不同的形势。

7

现在，我们回到德国的问题上，这一点还需要根据德国的历史来考察它的现状，因为如果不借助于适当的方式，我们不可能理解德国为什么有今天的声势。为了最好地了解这点，不仅需要认清一个国家的利益，还需

要体会到它的情感，并找到它可能的历史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作出评判。因为，大众的情感最强烈地左右着一个国家的行动，虽然物质利益是根本的动因，但它所激发的情感却有着更大的能量。无论统治者意欲何为，大众只是根据自己的是非判断来行事。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处于与他国政府的争执之中的政府都力求使自己的观点看来合乎情理，以赢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

过去的历史赋予了德国人一份情感，它和德国当前的利益需要融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德意志帝国的臣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的统治者的对外主张。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德国也有着自身内部的争执和利益分歧，它们将人们分为不同的派别，并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某项国际争端的看法。不过，比这些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团结对德意志民族发挥的重大作用。

比如，一篇法国报纸上的文章在以批评的口吻评价德国的外交时，不无道理地说道："在德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着宗派主义，可是它受到了民族主义感情的抑制，这种感情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加强烈。国家集体主义精神将六千万德国人集聚在其政府的召唤之下，而法国比其他国家更应该当心不能将这种精神抛于脑后。"这个告诫虽是单单针对着法国，但同样适用于整个世界。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德国人还普遍地认为，他们至今取得的成果能否得以保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海洋上的地位。自 1870 年以来，德国的统一为德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而工业需要市场、商业和船运业，从而也使保护主义呼之欲出。德国在 1879 年采取了保护主义方针，这既是为了发展国内工业，也是为了保护德国农业，防止农村人口向工业部门的过量流动。德国的劳动力数量之所以能成倍上升以满足工业发

展的需要，和外流人口数量的减少有关：在1881年是22万，如今只有2万了。当然，外来移民的增加也是一个原因，这正如一位德国撰稿人说，德国已成为一个移民国家了。

在军事上，与此相关联的是德国海军的变化。德国海军联盟引人注目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积蓄能量，以及周详地进行筹划以使手段和目标相适应方面有着独特的本领。这种本领体现在了德国的各个领域：军事、教育、工业和商业。当然，不管这个联盟在宣传上是如何出色，假如大众的所思所想和它的主张没有什么共鸣，它也不会在一些方面如愿以偿。

正因为德国公众对建立强大海军有着赞成性情绪，德国海军联盟才可以尽其所能为这种情绪提供组织形式、注入活力，并使它能积极地产生效果，尽管巨大的海军开支意味着债务和额外税收的增加。所以，这种情绪是德国海军联盟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该联盟的领导人最近也说道："不是我们的规章而是蕴含于联盟身上的那种精神造就了我们的成功。我们基于的这种精神反映了德国人的一个憧憬，这个对德国海军的憧憬已体现在了我们的旗帜中。"

德国海军开支在1875年不到1000万美元，如今则是一年1亿美元，而且这种上升势头按计划在未来十年中还将延续。应记住的是，这样大的一笔开销在德国比在美国能带来更大的收益。另外，海军活动及海运业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国家行为更能够激发起一国的上下一心之感。因为它们在国家疆界之外进行，给人的印象是更多地代表着全体国民而非其中一小部分的利益。与此相联系，有意思的是，德国海军联盟的100多万成员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于地处内陆的萨克森王国。和国家的工业成就相比，一支巨大的商船队或舰队更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上面这句话尤其适用于德国。在这个国家，海军还是一个崭新的组织，而统一的实现，即从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化为活生生的现实，也是不久之前的事。就统一而言，今天的德国和1789年至1812年间的美国很相似。在一个洋溢着民族激情的时代，统一自然为人所拥护，尚处于独立战争之中的北美殖民地上的情形就是如此。如今，德国的统一已被写入了成文的德国宪法，成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这部宪法经过一代人时间的考验，业已为德国人所认同，将来的情形也不会有什么例外。

不过，在依然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或集团利益的背景下，在德国还多少存在着独立主义情绪。这个德语词在美国这儿可理解为强调各州的权利，它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美国独立之初时，各自为政的几块殖民地之间的猜忌所导致的局面。而且，推动美国宪法的起草与颁布的只是各个殖民地的物质利益考虑。

直到1812年的美英战争及伴此而来的对于一个共同的外部威胁的集中认识，才使美国人形成了国家观念，联盟的理想才深入人心。对南北战争之前的动荡年代还有着记忆的美国人，不会不知道联盟这个简单的词所体现的情感是多么炽热。因为，在那时，无论是对奴隶制的憎恶还是利益的刺激，都不能像国家团结这个观念那样不容置疑、有着永恒的意义。

然而，德意志统一的最终完成不能没有超越物质利益的另一种推动力。这种力量可以在统一的德国对其当前国际地位中看出，这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激励。由于这种自我激励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新来者所具有的敏感，以至于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会给予这个地位应有的承认。

8

有意思的是，美国人应认识到曾几何时这种特点也显现在他们自己身上，它发端于一种不安的感觉。因此，德国和美国的政策中的确包含着颇具进取意味的自我激励成分。

若干年之前，德国首相比洛曾说："我们不会容忍被剥夺与其他强国在权利上的平等，我们也不会允许我们与他国同样享有的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受到异议。我们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我们希望在上帝的佑助下能永远强大。"

其实，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象征的门罗主义在产生之初并不为他国所喜欢。今天的德国对外意图也是如此，该意图明显地反映在了当前德国海军的壮大上。一国完全出于防御目的采取的行动有时在其他国家看来其势也咄咄逼人。防止欧洲国家对美洲大陆的侵吞行为对一个美国人来说



詹姆斯·门罗

詹姆斯·门罗（1758.4.28—1831.7.4），美国第五任总统，1823年在其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在已经获得，并维持自由独立情况下的美洲大陆各国，今后不得被任何欧洲列强当做将来的殖民对象"，反对任何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是美国对外，特别是对拉丁美洲外交的行动指南。

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这个市场只能为对所有外国一视同仁的中国人自己的政策所规范。即使中国在无助的情况下无力维护自己的统一，至少中国的完整作为一个原则也会随美国关于中国市场上的平等权利的声明应运而生。门户开放方针的执行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有关国家采取重大行动以支持中国的完整仍然有待观察。不过，只有在某些国家以据有的地盘为依托，借助于优势力量或阴谋诡计，无视其竞争对手，以谋取在华主宰地位，在破坏了门户开放必需的各国间平衡的情形下，才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有了平衡，局势才能保持平静。

现在，门户开放主张原则上已为西方国家所接受，只有这样，才不会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与他国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会成为一种影响，一个有关国家关于东西方间接触的一般政策的积极的、条理清晰的认识。

门户开放是新出现的一项国家政策，它旨在人为地维护各国间的自由竞争或商业机会的均等，在有关地区防止今天的多数国家在其所控制的疆土之内为它们自身的工业谋取好处的现象。

在当今的太平洋地区，门户开放是最引人注目的政策，且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政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商业性的，因为当今时代归根结底是一个商业性的时代。不过，从决定着进步的特征及程度的那些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看，工业和商业能否顺利、和平地发展还是取决于国家间的实力对比。

经济状况的好坏左右着战争的胜负，而对战争做好准备又会使经济运行过程免受外来之扰。海军的保护确保了英国的平安无事，从而铸就了英国经济实力的超群地位。类似的和平局面也体现在美国身上，它远离欧洲

的你争我夺，何况欧洲国家的行动还受制于其间的均势状况的变动。

因此，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如今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之国。所以，要使门户开放发挥有益作用，作用于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力量彼此间必须达成平衡，以便它能够稳妥地得以贯彻，免受诸多干扰。

10

接下来再考察一下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因为它和门户开放的推行息息相关，这对美国来说尤是如此。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太平洋国家及门户开放的倡导者，它对于上述问题有着特别的关注。另外，在运用它可以找到的有组织的物质力量以推行美国的主张方面，美国还有着与众不同的机会和优势。

对太平洋前沿占据的地盘而言，美国和欧洲强国站在一条水平线上。可是后者的地盘尽管有着军事或商业意义，却与本土非常遥远。其间的漫长交通线在多处易受可能的敌人的袭扰。而且，如前所说，欧洲国家的海军力量对比正趋于平衡，这使任何一国都越来越难以从本土向远方派遣一支大的分遣舰队。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对美国来说，考虑在太平洋取得霸主地位，虽然这个多少令人觉得遗憾的词被如此频繁地使用，以至于人们单单听到它就会产生抵触情绪，但是确保对自己拥有的地盘及通向它们的道路的控制则是美国的合理之举，不对任何他国产生危害。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相对于美国坐落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以至于它的东方领地和其本土港口之间的交通处于美国的强大

明，高人一筹的力量和准备才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很明显，在欧洲的紧张依然存在的情形下，英国和德国都不能将大批的力量投向太平洋地区。根据英国海军部首脑在议会中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在1910年3月，英国在中国驻扎的战列舰连一艘都没有，一级巡洋舰只有四艘。在英属东印度则既无战列舰，也无一级巡洋舰。在其他地区，英德两国的海军及在其他方面的力量也绝对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比如说，这些因素使另一个国家绝不会采取让这两国暂时联手对付自己的措施。

不过，门户开放作为一项政策如能得到遵循，并不会招致商业国家的抵制。如果谁企图谋取不合理的国家特权，尤其是借助于强制力或是对其目前的占有权的不公平运用，就可能促使有关国家采取行动以制止它对门户开放原则的违反。该原则也就可能成为战争的缘由所在，而贸易机会上的平等的保持就不会激起对抗。体现在了德国和英国间敌对之中的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对抗会左右其他欧洲国家相对弱小的海军的行动；这些海军都是均势局面中的因素，而均势局面正决定着所有的国家能否独立行事。

上述状况将使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太平洋国家——也是仅有的两个濒临太平洋的海军强国——来体现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局面。这是对国际和平的一个最好的巩固，因为这个局面显示的不是模糊不定的东西，而是令人一目了然的现实。

11

美日两国的海军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都更易于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力量的集中，以至于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正确的军事政策是否会使美国的

战列舰舰队无须驻扎在太平洋而是大西洋？当前，欧洲的海军力量平衡使英国和德国的舰队都被保持在了北海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及门罗主义的推行因而也得到了保护，其程度是太平洋那边的情形无法比拟的。在当前形势下，德国和英国都不敢，即使它们有心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对外政策加以破坏。

位于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与欧美国家甚为不同。它邻近中国、满洲和朝鲜，相互间交通的便捷给它带来了某些天然的商业优势。日本的另一个在自由竞争方面的优势是它的劳动力依旧廉价。可是，市场的近在咫尺以及日本对它们的兴趣不禁会使日本产生一种将其据为己有的想法。在和组织涣散的国家打交道时，这种心理很容易转变为谋求政治控制的尝试，而这种控制归根结底是借助于强权。

于是，经常有报道说，日本正在谋求建立在政治控制之上的商业优势且取得了一些进展。不管这些报道真实与否，它们至少说明了当时机允许或能够创造机会时，一些国家孜孜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它和美国称为保护主义的东西并无什么二致，只不过后者是在被国际法或国家间的政策普遍认定为合理的范围之内得以实施。

中国的谈判者们的软弱无能和腐败堕落招致了谋求政治控制的势力，从而危及了门户开放，并导致了这样的一直存在的担心，即以强权为后盾的不正当的影响正改变着各国在华所受待遇的平等，或者说正为未来这方面的不平等奠定基础。毫无疑问，俄国和日本的基本趋向，不管这两国对此有什么溢美之词，正促成了这种担心。

经过在一代人有余的时间内的发展，如今美国拥有的夏威夷群岛上的劳动人口主要是日本人，他们无疑值得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日本移民羡慕。这一地带的人口相对较少，和美国东部的交通联系由于快速列车也比较便

捷，不过对于承担战争需要的人员和物资的繁重运输还显吃力。

也就是说，在交通不尽完善的情形下，美国落基山脉以东地区的人力、物力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予西海岸以支援。这和美国所具备的可经海上迅即抵达巴拿马运河的优点截然相反。在当地没有美国舰队存在的情况下，对美国西海岸可轻而易举地进行侵袭；虽然美国舰队的随后到达或许会弥补某些损失，但就当前的世界形势而言，在美国的三大海岸线——大西洋海岸、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之中，太平洋地带最具暴露性。

因此，对于当今涉及整个世界的重大问题，美国人民应当有所了解。做到了这点，国家的政策才不会仅仅是政府的政策，也会成为全体人民的政策。才会具有上下一心的力量。没有这股力量，国家的任何作为都不可能达到效果，至少就对外政策而言是如此。

在 1910 年中，最显著地改变了各国间相互关系状况的事件是 7 月 4 日俄日协定的达成。该协定的意义在今天尚不能被清晰、彻底地认知，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不仅旨在调节俄日两强在远东的微妙交结点上的相互关系，也体现了两国针对侵害双方利益的他国政策所给予的相互支持。可能和这两个国家相对立的不仅有欧洲或美洲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其领土正是俄日协定的主题所在。

实基础。可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把细节暂搁一边，并将思想集中于某个问题的主要特点上，我们又难以清楚地领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于整体的重要性，并随之采取谨慎的行动。要知道，对这些关系及重要性的正确理解则取决于是否有一个精确的感觉。

世界的发展趋向于把行动放在最大的尺度上进行衡量，而世界上更多的是细微的、让人惊奇的、复杂的和出人意料的东西。虽然，每个国家或种族只处理其自身的内外问题，不过各自的命运却具体地影响了总体上的结果。这些影响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导致了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上的持续变化。

这些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性质则是不断波动的。比如说，由友化敌，由强变弱，偶然事件常常在某个时刻令人吃惊地改换局势。尽管国家及其领导者任何时候都易遭受到希望破灭、联合失败、根基动摇之类的痛苦，但他们理应充分考虑现时的趋向，从现实展望将来，估价当前各个因素的相对作用并由此预测可能的情形。简而言之，他们必须持有长远意识，并且在时机允许之时依照它们合理行事。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为的分析和事物的变化是如此地具有不确定性，预测和估计上的困难又是如此明显，他们又必须在顾及眼前需要的情况下处理每一时刻的局面，这就需要具有近期考虑、重点注意自己的脚下以及下一步的能力。因为，只有在他们务实的头脑确认基本方向是和国家利益的长远目标相一致时，才可以前进。

对此，可以在俄国向亚洲的推进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国和德国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中，在日本的进步中，以及在正在南部非洲的实践中初露端倪的英帝国联邦思想中看到明显的证据。这就是每个大国在这场运动中都有其表现，其影响绝不应被忽视。

2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上述可能前景的一个具体阶段进行研究。但是，在展开这种研究之前，需要简要地说明一下最近的形势变化。比如古巴、西印度群岛以及巴拿马地峡对于美国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利益的根本重要性。又或者单从外交谈判及政府主张、还有如克莱顿—布尔弗条约、格兰特政府吞并圣多明戈的努力、关于购买丹麦人占有的岛屿的失败谈判以及美国与哥伦比亚达成的确保地峡铁路运输的条约。再者，对美洲的关注在美国的世纪之初就已存在，尽管它由于内战的爆发而被临时忘却，但它在内战结束之际又愤怒地复活了，像美国对法国从墨西哥撤军的坚持就是其第一个成果。因此，在某一时刻，长期性观点就要服从于短期的迫切要求，但一旦危机过去，国家又需要高瞻远瞩了。

与此同时，事物已发生了变化或已处于变化之中。形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而老的因素的影响及重要性也让人看得更为清晰，因为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褪去了模糊的臆测成分，而更多地参与到了具体的行动中来。这样美国宣扬扩张的思想变得更加犀利与坦率。于是，美国的长期眼光逐渐地超出了安的列斯群岛与巴拿马海峡，注视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以及正在中国和日本发生的重大事件。

不过这种注意依然有其不足，除非美国及其扩张主义的支持者终于认识到了海权对于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影响。当然，海权只是为扩张服务，只是它的源泉和保护者，它自己并不是扩张本身。美国的扩张鼓吹者也未预见到向太平洋之外推进的可能。他们的眼界并未超越夏威夷，由于其对美

国的重要性，他们是从防御的观点来看待它，而非视其为旨在在世界产生更深远影响的跳板。关于这一点，到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之前，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依然为受早期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纯粹防御思想所控制。

此时，美国人只是将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马及夏威夷看作外围据点，并日益明显地认识到对美国的危险影响可能在那儿形成。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地采取措施，即使不采取斩钉截铁的行动，也至少要采取一项清晰的政策。

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正是在这个心理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也特别地表明，一旦落在了完全适合于己的精神土壤之上，思想的种子会如何迅即地应运而发。历史习性使美国人对建立超越自己大陆的疆界的国家权力的观点，以及为其证明的理由并不陌生。尽管如建立在亚洲的霸权之类的新奇设想令美国人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但长远计划一直是准备地成为现实。这和短期考虑、由于形势所迫而当即行动的做法并无特别的冲突之处，正如对菲律宾的吞并所显示的，这个吞并是美国扩张努力中最远的跳跃。

因此，就眼前而言，美国必须使自身的行为符合新的形势，并在新的形势之下安排自己的任务。最近年代的事件已极大地改变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并为其研究以及长远考虑提供思考方向。尽管这种考虑经推敲仍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而且时刻都可能产生不一致之处，但只要国家的航程需要富有远见的、持续的指导，它就是至关重要的。

进行这个研究需要具备灵活又坚韧的信念。除了门罗主义是一个可能的例外，美国人的长期习惯是对外政策方面的话题不甚关心。这既是美国独特的孤立环境的产物，也是它刻意追求的结果。这种意愿是从以前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在当时比在今天有着更充足的理由。

环境所决定。一个思想所基于的原则可能是符合必然的，从而也就是永恒的，是真理。但是对它的运用是千差万别的，信条、规范、主义都不是活生生的原则本身，而只是它们的表现。它们不能摆脱尘世变化的影响，在某种形势下的暂时应用也必然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不应将这些被尊崇的信条神化，也不应认为对它们的修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行。

不管如何信守一种主张，仍有可能调整对其实际影响的看法。以美国对欧洲复杂事务的疏离为例，就是在今天，无论如何不可能找到让美国干涉在欧洲发生的一场争端的理由。不过更可能的是，对于欧洲力量平衡上的巨大变化，美国不能再投以漠不关心的眼光。或者像过去那样仅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

从上述这些可以自然地体味到，鉴于不同国家的力量和地位，关注它们固有的权力与我们自身间的关系以及我们的态度对于国民的精神控制的密切影响是完全必要的。

所以，美国只是与其他国家具有共同的命运而已。因为，所有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比以前更为紧密。而且，尤其在亚洲，外部环境将所有国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共同点上。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可说，针对未来的可能性依然纷繁复杂。

3

亚洲的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它出现之时，世界正处于这样的时代：由于交通的迅捷，借助于电讯联络，各国的变动及其中的走势正空前地引起广泛注意。因此，一开始就可以察觉到包含地理因素的政治问题和军事

些力量沿南北两个方向的投射是业已开始并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中的首要因素。

朝地图瞥一眼，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这么一个再显眼不过的事实：庞大的、浑然一体的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的顶部毫不间断地向东延伸并横亘在日本的上端。在这样大的距离之内，没有任何政治障碍能阻止俄国集中它可调用的力量。

而在俄国境内，只有距离本身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碍可以限制力量运动的自由与充分程度。因此俄国拥有处于中心位置这个权力因素，另外俄国领土还像楔子一样伸进了中亚，而且在一翼受到了高加索山脉及俄国控制下的内陆里海的保护，另一翼则因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至中国西部边境的山峦而得以加强，这也是至今俄国还没有碰到什么来自中亚东翼可怕的危险的原因之一。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备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的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

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依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

所以，反对俄国扩张的人对俄国并无恶意，也不嫉妒它的昌盛，他们

只是认为，在任何政体之内，不适当的主宰现象都是不健康的，无论是就国内议会还是就国家间议会而言。如果世界联邦成为现实，政治的健康运行需要有反对势力的存在，它无疑应是以国家或种族的分野为基础。

北和南在逻辑上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推测，和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张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不过南北之间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无论是就程度还是就本质而言。历史的演进将越来越多的抱负与企图展现在我们面前。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南亚半岛也向北深深地楔入了中亚多争执的地区，但实际统治该半岛的种族的权力中心远在千里之外。而且与俄国的领土集中一片形成对比的是，他们的本族人口及军事力量的分布更加分散。

正因为如此，印度并不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它只是英国所属的许多块土地中的一块，它们遍布全球，由英国的超级海权联为一体。在这么多地方中，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受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

从本质上讲，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一来，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的。

因此，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像陆上据点一样发挥

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这种争锋在当今非常明显地以亚洲的领土为对象。

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不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为是以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防御或进攻行为也以此为基础。如果它不存在，或许对许多现在引人关注的东西可视而不见。但是，正因为存在着这个背景，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顿时多了不少外部的机会和危险，对它们绝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有必要思考、总结这些危险和机会，它们是一个国家外部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政治领域是和战争中的战略目标相对应的。

5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不能狭隘地将这理解为一成不变的生命循环。变化发展是活生生的生命的特点，但对国家而言又确实不能就此认为规模的扩大是必然之事。对人也是这样，在身材达到一定限度之后，个人的身体尤其是精神在很长时间内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国家来说，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

我们常常根据清晰确凿的权利规定来研析国家间的某一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设的前提是权利规定必须得到遵守。可是，当一件事情涉及到优劣强弱，而又没有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可依时，我们就只能权宜处理。从保全自我的角度看，这是合适且有益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坦诚地

考虑它自已以及其对手的需要，并通过互谅互让或公正的仲裁来寻求适当的平衡，这对有关国家乃至更广泛的人类群体都大有裨益。

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权衡中，政府和国家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所在，而只是工具性的东西，它们担负的不是它们自身的什么，而是子孙后代对于它们的信托。所以，放弃要求和求助于仲裁都受这种委托关系的制约，因而也就不能单从自我牺牲的考虑出发而采取这类行动。个人处理的是纯属自身的事务，所以，把眼光仅仅集中在英、俄两国的领土安全上面是不够的，虽然当今在亚洲它们最具竞争性意向。我们要明白的是，必须考虑到这两国既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权利，而这或受它们间的针锋相对态势的影响，或为亚洲本身的形势，主要是存在诸多争端的分割地带的形势所左右。

对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亚洲国家来说，发展权就意味着对亚洲的诸多问题的处理，意味着对亚洲广大地区的开发和利用，而这些很久以来是被排除在一般议程之外的。

发展取决于两个相关的因素：一是内部组织的活力，它是消除差异的力量。二是和国外资源间的交换自由。在文明国家中，前者是国家本身的分内之事。对国内制度而言，普遍的认识是，外来干预只有在政治发展的初始或衰亡阶段才是可被接受的。组织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涉及外来因素。交换自由则不同。由于依赖于外部环境，交换必然意味着需要外部允许，它既来自于与之进行交换的对象，也来自于交换过程涉及其利益的其他外部势力。

当今欧洲国家间一个明显特点是普遍的领土扩张倾向，它已造成了公共土地的相应减少。与此同时，对于那种包含有实行排他性控制之威胁的任何行为，有着更多的嫉恨。这种控制或通过直接占领，或借助于操纵性

影响，尤其是当它不是依托开放市场上的公平商业竞争，而是凭借着排他性的军事或政治力量时。

所以，所有寻求通过商业和交换来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的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个这样的国家都希望在上述领域有平等的机会，不受基于公开或秘密的强权运用等非公平竞争的外来消极影响的阻挠。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害怕、让人厌恶并助长争吵。

迄今为止，军事力量的使用是问题症结所在。可以说，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目前的趋势是，通过获取新的地理要点，通过巩固在新旧土地上的权力，英、俄在实行领土控制方面正越来越具有优势。

上述情形适用于大致位于北纬 30 度和 40 度之间的所有地带，而不单单对于中国。由于巨大的面积、众多的人口及表面上的无依无靠，中国很自然受到更大关注。如果把亚洲的中央地带看成一个源泉，认为借此全世界的国家通过互相交换或受益能够给它们自己带来生机，我们用不着试图详尽地估算这个源泉到底多么巨大。

因为，亚洲地区可以最终向世界的普遍繁荣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这正是各国倍加关注的重大利益所在。从各国或对其谋求控制、或争取分享的企图来看，这些企图又是和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一致的。

6

接下来，我们需要谈及内外交通问题，这在战争政策上极其重要。完全是在国内范围内的交通是商业发展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构成了重要国际航线的交通了。一目了然的是交通主要可分为两种方式：海路和陆路。当

然，这种区分令人想到今天正稳固地盘踞在亚洲土地上的两大欧洲强国的本质不同。

不论其出发点和方向如何，海上航线随船只的航行而延伸。这样人为力量并不决定着它们的存在，而只是影响着对它们的运用。而且海上交通的载运量是陆上交通根本无法相比的。陆上运输既受制于地形对交通的巨大阻碍，也受制于面对这些阻碍而加宽道路、增修铁路所需的开支，它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不可比拟。这好比铁路根本不能与河运竞争一样，它在速度上的优势不能弥补运量上的劣势。由于简便易行且载运量大，在相同距离内，水上运输更为便宜，并因此更为普遍的运用。这些特点不是偶然、暂时的，而是本质上的、长久的。只有在没有水上交通的地方，或是水运距离比陆运太过遥远以至于前者的固有优点尽被抵消之时，陆运在价格与运用的普遍性上才有竞争力。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强调这些事实，因为铁路运输快得多的速度给普通人留下了非常不同的印象，他们容易忘记铁路运力的有限。交通，或者说物资交换，其好坏不只是取决于速度，也取决于在较长的时期内能够被稳妥运送的货物数量。

不过，我们还需要明白，海上交通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的使用又是另一回事。后者取决于能力。该能力一是体现在单纯的海上海军力量上。二是体现在海陆交界地带的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的相得益彰或是缺乏协调上。在海陆交汇地带，由于陆军力量传统上是政治权力基础的缘故，必然会有海陆力量之间的不协调问题，故需要达成其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周边地带。依托于海权的领土控制的性质、范围及坚固性是政治影响的本质所在，这和根据地在陆上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是一样的，来自这些根据地的影响辐射远至内陆地区，并在那里发挥着在范围和程度上

和始发点同样的作用。

所以，陆权的使用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在任何海陆交汇之处，陆上环境也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在性质上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强弱。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现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岛屿及海岸对战略的影响上以及像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上。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军力截断之处，如巴拿马地峡，或这种截断由于陆地的毗邻而极易发生之处，也可见到上述情况。人工水道最容易受到被截断的威胁，苏伊士大运河就是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所在。而从地中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无疑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前景也显示出了这种情形。

考虑到陆地和海洋作为交通渠道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交汇之时的相互作用，无疑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因为物资交换使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

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交通越方便，运输量就会越大，财富相应地也就会越增加，相互作用在此具体地体现出来。要有大的收益，就必须对保持并促进有利的环境倍加关心。也就是说，从商业交换中获得最大好处的国家最希望商业能不断发展，而商业的兴衰又受和平与战争的左右。于是，借助海洋进行贸易的国家把和平作为首要的利益所在。

因此，这些国家确实需要做好在必要之时诉诸战争的准备，以此来推

行它们的和平政策。不过就此而言这样的军事准备本质上应是防御性而非侵略性的。这也是出于以下原因：

由于这些国家的主要利益是在海上交通方面并对其更具控制权，它们对争端地区的陆上控制能力就不可能又强于其边界和这些地区紧邻的国家。由于海军对内陆采取强制行动的能力有限，所以使用海军要借助于政治智慧。而海军作为用于防御的军事工具，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权利也不构成威胁。

如前提及的，俄国的统治范围绵延甚广且团为一体。再加上俄国离开海域远之又远，它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陆路来完成与亚洲多争执地区的大量交通、联络任务。由于陆上自然条件如此恶劣，很难想象它们能由哪种政治扩张的进行而得以改善。

这意味着，即使俄国现在抵达了海边或是能够很快做到这点，由于这些抵达点与俄国中心地带过于遥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还要主要经由陆路。所以就俄国的幅员来说，海上贸易的好处只会波及离海岸较近的地区，而这些受益地区由于相对较小也就不会达到通常海上贸易所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而且，因为濒临的是内海，上述地区又可能遭到敌国封锁之害。单单看一下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波罗的海的出入口就一目了然了。

这些情况表明，如果陆地与海洋交通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的确如上所说，俄国在财富积累方面就处在了不利地位。换句话说，俄国缺乏促进其人民获取财富的工具和手段。假如这是事实，俄国顺理成章地就会心怀不满，而这又马上会表现为侵略。因此，俄国必然会不断推进，而这又充分显露它的最终目标。如彼得大帝广为人知的志向所表明的，俄国时常拥有有组织的推进计划，可以谨慎地考虑这些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国对自身明显需要的认识以及在此之上的躁动不安。



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是后世对沙皇彼得一世的尊称。彼得一世（1672—1725），原名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之子，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第四代沙皇（1682—1725），著名统帅，1682年即位，1689年掌握实权。他制定的西方化政策是使俄国变成一个强国的主要因素。

这些或许是亚洲局势中最大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在这里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实际上只有部分的俄国领土从海上贸易中受惠，而这些领土即使加在一起，和俄国的全部国土相比也只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小部分。

所以，俄国希望不仅获得更多的、更开放的海岸，也希望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控制以染指其他远方的海滨地区，来自这些地区的好处将促进整个帝国的普遍繁荣。在此还需附带言及俄国对内统治制度和一般政策的特点：在吞并了某一地区后，俄国通常要基本剥夺其他国家在俄国实行占领之前就已享有的东西。

如果已经认识到了利益冲突的情形，但又只在其中看到敌对的根据，那就犯了个可悲的错误。一些国家在接触海洋的程度以及自然条件方面更为幸运，这就大大便利了它们的贸易血液的循环。这些国家对于俄国即使没有同情，也至少应多份坦诚，因为后者因其海岸的狭窄、内陆的广阔与条件恶劣以及气候的十分严酷承受着诸多的束缚与艰辛。

但是，尽管应该持有上述态度，俄国人民依旧有其自身的责任。不过，与此相同，在亚洲地区，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都最紧密地系于大众和政府

的道义责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仅根据现有的自然的、人为的或法律上的权利，或者是文明发达社会中业已确定的那些原则。

因此，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许多机制瓦解，或者是对它们组成部分重新调整的局面。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成为现实，其影响都会是稳定、持久的，自然因素的存在与作用已清楚地展示了这些。这两种情况也可能会达成一种平衡，从而使每一方都能通过自然选择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

第六章

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的冲突

军事形势就是政治形势，对其正确理解有助于和平。尽管存在着上述优势，但有理由相信不能将它们用于政治侵略，不管它们在战时能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当然可以用它们来阻遏凭借武力谋取商业垄断的尝试。但是，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

1

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均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国，西面的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及波斯。

谈及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未来的影响，最直观的就是自然环境使俄国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而其他国家即使在俄占领土上享有一份权利，那也纯属偶然。而且该权利的大小、地位和运用也只是差强人意。

俄国凭借着实行全面主宰，得以在海权作用范围的极限之外随心所欲地施展力量。不过，即使在某些地区不能对俄国采取直接的抵制，也常常可以通过在其他地区运用力量来施以足够的制约。这种力量或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其作用取决于其本身的强度以及存在的场所。

因此，施加上述压力给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多少是可行的。因为各国利益都是多样且广泛分布的，在国际场合这非常明显，这就是在一个地区的行动永远受制于对在其他地区的虚弱地位的牵挂。作为军事行为，这类约束方式被专门称作为“转换”。

如果俄国推行一项愚不可及的独占政策，而这导致了上述压力，这会

益，并认为选择冲突纯属吃力不讨好。这正是目前和平能在欧洲国家间有效存在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如果和亚洲的未来紧密相关的国家能对于现时的各自优缺点、至关重要的利益及在东方的合作可能有着合理的评估，并对各自所需的多少和能力的大小进行厘定，亚洲问题就肯定能被和平地解决。

尽管根据现实情况的力量协调以及相互谅解更可能是心照不宣的，也就是说这将导致与产生摩擦及心理恐惧截然相反的情形。但，我们不妨这样去想一想，比如业已在欧洲发生的战争将得以避免。因为，在相互竞争的意愿之间将存有一种恰当的制衡。

2

将海洋由自然状态有效地转变为存在着海权的状态，其最具决定性的方式是商业控制。

海洋就其本身并无什么产出，但作为主要的商业通道和交通场所，它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于是，海洋的独特意义体现在被转运的商品身上，以及交换的利润带来了国家的物质繁荣。因此，放弃对商业的控制、放弃海上帝国是绝无可能的。

所以，由于海上强国在可见的未来有着一致的利益，面对日益增长的要求放松对商业的控制的呼声，这些国家应谨慎考虑能作出多大让步。要知道，海上强国推行其必要政策的手段会因此而有所受限。解决的办法是，保持上述独特优势，对甚嚣尘上的呼声不应过早响应，应持缓行和慎重考虑态度。清醒地认识到放弃它被长期认可的特权是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何

况，掠获所谓的私人财产就是这样一个自商业冒险时代就已存在的权利。如果认为在海上敌方的物资可由中立国承运，更大错特错了。海上帝国无疑是一个世界帝国，它的权杖无疑可被放弃，但这样做是否明智呢？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对上面提到的私人财产中的“私人”进行解析。就“私人”这个词的一般意义而言，属于个人，但运往其他国家以求交换的商品并不是“私人”的。众所周知，钱是战争的血液，而一旦参与了对外贸易，个体公民的财产就对国家财富的增加起了作用。

所以个人财富对于战时国家的血液循环举足轻重，这和国内贸易的情况根本不一样。后者在一国之内进行，没有其他国家的参与，因而只不过起到一个生物体内功能活动的作用，仅把身体拥有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体内部分而已。不过，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

海上商业就是这种资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因而对支撑战争的进行甚为重要。扰乱国内贸易会导致功能过程的紊乱。虽然，这可能妨碍、也可能不妨碍战争目标，但前种情况因造成了不必要损失必然会受到抱怨。如果对外商业活动由于所谓的“私人”财产受掠而被阻断，其影响便不言自明了。这就是，干预他国对外贸易直接促进本国的战争目标，会使对方因失血而精疲力竭，被迫顺应于我，而实施其代价又是极小的。

3

如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对应于亚洲中心地区的浑然一体的国家，那它的

扩张就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事实上，这的确也是如此。因此，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的侧翼，才能有效地扼制俄国。这种扼制之所以十分有力，不仅因为如前所述侧翼攻击有种种好处，还因为它是针对着俄国的海岸，也就是朝向海洋的出口。换句话说，内陆地区是需要和这些海岸保持不受阻碍的联络以尽可能获益的，而这一点，必然由力量强大且占据较好地理位置的海上强国所左右。

因此，对俄国而言，它要保证上述利益不受侵犯，出路就是寻求尽可能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出口。这主要包括东部的中国海岸。至于在西部则有两个方向，一是经波斯抵达波斯湾，另一个是经黑海或小亚细亚涉足地中海。研究一下地图就可知道俄国在波斯的进展不仅会使它靠近海湾，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及其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取良好区位，从而便于进行针对印度的行动。

俄国的这些行动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激起后者的强烈而且合理的敌对情绪。因此，必然会使后者利用一切强有力的手段去对抗俄国。这些手段的基础是海权。不过，海权除非得到认真加强，否则不能和俄国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及其他情况而具备的陆上霸权相抗衡。

另外，由于俄国的政治一统及领土的绵延不断，对俄国施加的影响或许会造成散乱无章的现象。然而，有关国家已认识到，由于在维护争执地区的商业和运输自由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从而双方都是有着一致的要求的。要知道，这些国家政策的正确，其间协调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能否认识到上述利益并准确评估自身的力量。国家间合作的有效性取决于共同利益导致的必要性。所以，对利益及其实现条件认识得越清楚、全面，合作就越稳固、长久。

由此可见，陆上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

无必要。合理的打算只应是诱导他们接受一种能促进他们的进步、增进他们以及全世界的利益的局面。

如何实现这一局面，答案就是逐渐接管对当地的统治。如在印度。当然，这或许是一个尚无法预测的细节问题，因此，这样的回答与其说是事先设定的，不如说还是取决于实际的演变。

在过去的历史上，上述变化（或者说实际的演变）一般是由私人商业企业为前导的。而且，当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大量的非法行为。后种情况要求外国政府进行干涉以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这不仅表现为要求当地政府改正过去的错误，并承诺永不再犯。还表现为要求为此得到某种担保。比如说被给予某种程度的地方统治权，而宗主国的勃勃生气会使这种统治趋于加强。这就好比一粒种子如果被播下，它的发芽、生长更多地是由其自身的而非土壤的条件所决定，而且它一旦生根，也不易被拔除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主宰一块土地的不是当地的抵抗，而是与其同类的国家的抗衡作用。

在中国，上述过程已经开始且在继续。不过有几个国家参与竞争，这种局面是否会像在印度和埃及那样为一些突发事件所根本扭转仍需拭目以待。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不应认为它们将永远处于上述过程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无论这类过程会导致什么具体结果，普遍的情形已充分表明它是一个客观现实。为此，应该对现状进行研究以使未来比过去更多些确定性。这个研究起始并基于两个业已说明的基本情况：

第一，当前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将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

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

不过，认识到有这两个主要竞争者并不意味着就忽视了这种情况，即

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也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

关于第二种基本情况，有一个明显的例外。由于法国与俄国有着正式联盟关系，就其根本利益来说，是海上强国的法国在东方成为了俄国的支持者。除此之外，还是天然的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倾向，这是一个合理且长期存在的情况。所以，这好比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而这绝非一时的情形，因为某些局面看来会长期存在。

上述几国和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几国中，英、日、美三个国家绝对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于海军方面。德国不太一样，不过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使它也希望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和他国一样，德国也必然要反对独占性控制。德国的这种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体现在了德国的扩充海军计划上。

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形势需要，四个国家可以在中国采取同样的一种以海军为后盾的行动。这些国家可用手中掌握的基地来支持这种行动，强大的海军力量足以使这些基地防范陆上进攻。不过德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比较易受攻击。日本则因其岛国地位而比较安全，香港也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所在。占据着菲律宾的美国也有着同样安全的基地。

由于上述情况保证了海洋得以处于海军控制之下。在基地、舰只、防御和进攻力量、基层官兵和上层决策者诸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还可受到陆军的支援。在俄国的一翼有着日本陆军，而在5000英里以外的另一端，有着德国军队。德军对于亚洲问题的意义正说明了美国为什么对德国的长盛不衰十分在意。

而也不是不可解决。考虑到地中海的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2000英里，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南北岸的强大存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放弃上述危险航线，将苏伊士运河作为一种“新的安全的航线”来使用。

不过，假如有关国家能继续加强并扩大它们的政治地盘，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这条航线所受的威胁就会减少至一种有利的得以建立某种平衡的程度。这时，相对于更安全、但也更漫长的绕过好望角的航线，上述航线至少能作为一条用于军事目的的临时航线而被使用。

军事安全首先取决于海军力量，但显而易见的是，海军需要获得东地中海地区。此外，还需要一种既能保障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又能有助于通过利益联系赢得广泛民众支持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业已在英属埃及存在，如同在印度和菲律宾。

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努力保证它即使在战时也依然畅通，而促进埃及稳定的努力也必然有利于运河。需要提防处心积虑的沉船行动造成运河的暂时关闭，但如果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了严格军事管制，这种厄运就不会临头。另外，即使运河受堵，依然可找到相当短的通道以及时完成军事任务，只要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就行了。

在战时，埃及归属现状的维持及通往东方的最短线路的安全都最终取决于今天称为土耳其亚洲部分那一地区，不过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波斯地区的长期政治倾向。如果我们能想象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

现在，就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国也不能比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对更多的问题产生影响。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也会变得不安全，如同奥斯曼帝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外部力量之间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竞争。所以，这场交锋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抑制的，因为各国的政治行为是相互对立的，而该行为正是起关键作用的不同国家特性的反映。

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与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是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不过，这样一来，有一个问题就产生了，这就是，无法预测的事，又如何进行分析呢？在这里，请记住，尚不能进行预测并不就意味着无需对形势认真分析。相反，决定结果的不仅有那些未知的东西，也有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通过仔细考虑问题的重要性与性质，并确定所期望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更为重要。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如果做不到这点，它们就不堪一击。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区，不存在像中国的长江那样的一条水道以使内地与海洋相通，虽然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借助陆上交通，尤其是铁路。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的情况下，文明就以铁路为中心扩散其影响。

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就将主要由私人企业实施，而且优先建造的将自然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线，尤其是在那些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不管一条铁路走向如何，它必须迅速发挥政治和战略作用，这都必然会激起出于军事与商业原因的对筑路特许权的争夺。

8

上述分析说明了北纬30至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的变化。从其中可以简明地推断出：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对其未来也需早作定夺，但以利凡特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有着大得多的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不用说还有相对独立的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除非英国和德国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否则它们不会让利凡特与波斯湾成为一个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尤其是当后者在太平洋地区和它们发生严重对抗之时。

由于上述航线从始至终相对狭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可以对这条路线进行有效控制。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不能抵消这些据点由于比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

在地中海西部，就地理而不是海上力量而言，法国握有控制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随地理与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又有所变化。这一地区的当地国家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来会不会有则要看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政治前景了。

有人反对英国和德国在利凡特保持海军力量的存在。由于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缺陷，而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这样的反对完全正确，它虽然并不能改变目前现实，但清楚地体现了在利凡特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

基地的必要。因此，这样的基地可使海军行动就地获得补充。与此相连，天然条件将埃及变为了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运河的淤塞，都不能改变这些条件。如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的，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运河开凿之前，埃及就成为了有关航行的必经之处。

在大国时代，埃及由于其适合居住的地区比较有限，必定要成为大国的附属物。那么，是哪一个大国的呢？是否谁离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为它更容易巩固所得？目前看来，英国在利凡特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就能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就地中海这一个面积不大的海域而言，一支部署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控制整个海域并且毫不费力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这支舰队并不过分重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或许开往直布罗陀或苏伊士并从那获取补充，但不必驻扎在当地以保卫它们。只要在利凡特、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至西的地中海地区。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行动。

上述供应至少也可来自于两个方向：红海和地中海，有哪一支舰队能同时切断它们呢？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有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可用，如果嫌这条航线过长，那就更没有理由过早放弃苏伊士航线了。难道一些临时的原因或灾难只会使英国舰队暂时处于劣势？有什么能比经由

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更加保险？一旦英国海军处于了长期劣势之中，不管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也就瓦解了。

总而言之，根据严格的军事分析，看来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却青睐好望角航线的观点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战略考虑。对一个业已握有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正确的方针看来就是牢牢抓住埃及，巩固对其统治，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必需物资的供应基地，以预防可能的对英国的切断行为。在英国孤立的情形下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利益大体趋同的今天，更是如此。

不管根据国家的能力，针对现实应作出什么决定，上述讨论已有力地表明了，针对潜在侵略的几个颇为重要的特点，在利凡特的战略中心有着决定一切的长期意义。因此，我们很难不认为上述几个特点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它们作为整体，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名，在它们身上具体体现着众多的复杂事实。

9

在当今时代，“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具有这种意义，因为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取决于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前面之所以对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谈论很多，就是因为它们和苏伊士通连，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在于对所讨论的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这条线的最关键点就是在连接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

那么，是否可以谨慎地认为，经过好望角的环形航线可被放弃？或者问得更直率点，较短的航线是否是唯一一条对各国有用的航线？鉴于国家

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长期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维系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实所能提供的尽可能长远的观点来展望将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不是南北向的，而是东西向的，而东亚和西亚正给发展潮流以最大的推动。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过程与影响离不开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它们作为捷径所在推动了人力对自然障碍的克服，而苏伊士运河业已开凿成功。大致说来，这两条运河也标志着一种分界线，这条线以南地区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一直比以北地区的要次要得多。

另外，尽管两条运河都非常重要，但苏伊士运河更有意义。即：因为没有，近期内也不会有像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可供替代了。何况，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再加上土耳其也处于衰落之中，另外，围绕着苏伊士运河，有一股国家间的嫉妒心理，而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则多少防止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假如上面的分析正确，就会自然有这个问题：政治思维习惯能否受到上述情形的影响？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方向时的首要考虑所在。当然，其他考虑也不应该排斥在外，只是，这必须排列为第二位，应严格服从于前者。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情况左右了英国对南非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

对美国来说，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的价值在各方面都大有上升。因此，美国必须认真注意任何哪怕稍稍地影响了它的政治变化。不过，在美国大陆，从其南端可对地峡施加影响，门罗主义已失去了往日风光。

虽然出于国家荣誉的需要，美国可以继续执行门罗主义，但鉴于世界上的机会与注意力已显而易见地转移到了亚洲，不可否认，无论对美国还

是其他国家来说，利益中心已极大地发生了偏转。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马上着手处理，那就需要考虑一下，请求对一个并无感情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自身有效行动的能力？这都还不好说。因为，一个国家政策以及军事活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集中精力、始终如一。

到此，我们的讨论集中于亚洲之外的民族和国家，以及人口众多的所谓中部争执地带。毫无疑问的是，后者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仅仅是使有关国家变得更为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并不是事实。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尽管在某些方面就像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但它们并不是一群为他人所有的羊。通过个人体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国民性格可能是坚强、果敢的，不过，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最终丧失了进行自我更新的能力。假如这些论断大体正确，那么，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点：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将依然止步不前，这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进步，其动力也必定来自外部。在后一种情况下，外来推动的源泉和特点以及所导致的变化，显然对世界有着重要意义。

更何况，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同样十分重要的是，本质上并无不同的一个种族的成员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还是由于暂时的差异，分为了几个独立的国家乃至敌对的集团。由于答案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很难平静地想象中国的 4 亿居民能被收纳在一个有效的现代政治体制之内，并共同生活于一块并不宽敞的国土之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对中国的影响将改变中华文明的特性，而这又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外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作用不是最终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变化上。所以，未来发展方向对于亚洲国家至关重要。由此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与相对能力颇令

人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一段长期的历史进程将如何开始，而其归宿在很大程度上正蕴含于开端之中。

所以应该具备长期的眼光，不过现在尚根本无法预测结局。不过，可以确切认为，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因素是如此之多，所以必须耐心观察、认真思索、并积极行动，以形成严谨的认识。这样才能保证不会有什么事情令人措手不及。因为上述做法给我们赢得了时间，而时间的充分是处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变化过程变为了有序的缓进。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特性的作用，而将曾一直单独存在的它们融入自身文明之中。

另外，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的结果，条顿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近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变化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这个至今依然使我们受益的历史结果可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恺撒自己并没有有意识地要造成上述结果，他只是看到了现实中隐藏的危险，从而想到应该推进罗马的边界、巩固罗马国家的外围地区以阻滞敌人的进犯，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屏障，完全是从防御目的出发的。

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欧洲文明已发展到了一个需要进行对外交流的重要时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它将以本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而告终。尽管按大家所希望的，也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欧洲文明应保持它的独特性，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因素，尤其是在长期接触中一直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明因素。它们间的更进一步融合将潜移默化地产生应有影响，这些并不要求欧洲各国的特性趋于同一，但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是比物质进步更缓慢的过程的产物。

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之时，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并融入了圣基督教传统。这不是一成不变地从某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也不是一时的奇想，而是一套时刻发展的固有精神信念和代代



查理曼大帝纪念碑

查理曼大帝（公元732—814年），法拉克国王，罗马帝国的奠基人。他建立了那囊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公元800年，由罗马教皇加冕称帝，号为罗马人皇帝。他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及经济生产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并引入了欧洲文明。

对当代的文明国家以及文明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比企图凭借中央权威来解决疑难和调节利益的做法更加致命，这和由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异曲同工。和公民社会一样，国家社会正常与否取决于个体成员的活力，而它很大程度上由成员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能力所决定。

另外，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而起的激烈竞赛使各国间在种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明显差异长期化。而在冲突中产生并得以保持的强烈民族特性一方面会加强亚洲国家的内在自觉，另一方面也会激起它们的反作用，以防范为外部所同化的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如果仅仅是形式而非本质的完美，其过早出现就令人忧虑了。

第七章

以中国为中心

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

既然认识到了现存的问题，就应尝试着去解决。在接受了外部干涉做法的情况下，问题的成功解决依赖于求得外部力量的政治均衡局面，这既能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处于有害的主宰地位，同时也能以健康的发展为依托，促进东方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进步。这当然是好事，如果东方民众在保持他们的特色的同时，也能成功将欧洲文明的因素植于自身的话。

欧洲文明虽然也有不足，但已在促进其成员的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一旦东方国家发生了上述关键变化，新注入的因素同样会发挥它们对于今天构成国际共同体的自我依赖和自我管理的人民所具有的功能。

2

在日本这么一个较小的国家，已经能看到上述变化，对此人们已述之甚详。而且，日本的变化正揭示了这种可能：我们能够从国外的制度中吸收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有益成分并将其植入自身之中，与此同时还依然能保全本国的特性。尽管日本的确未曾像中国那样经受政府的瘫痪之苦，但从感受到了外力的推动那时起，日本经历了一场制度革命，并在近些年成为了国际尊严与权利的全面享有者。

当然，这样的过程的长短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在如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外部动力的影响强度与问题的多少、所针对范围的大小都有相关性。暂且不论日本人民的适应能力如何，尽管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不过，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日本较小的幅员、较少的人口便利于它的进步。与此相联系，对外接触点的增加有利于中国这么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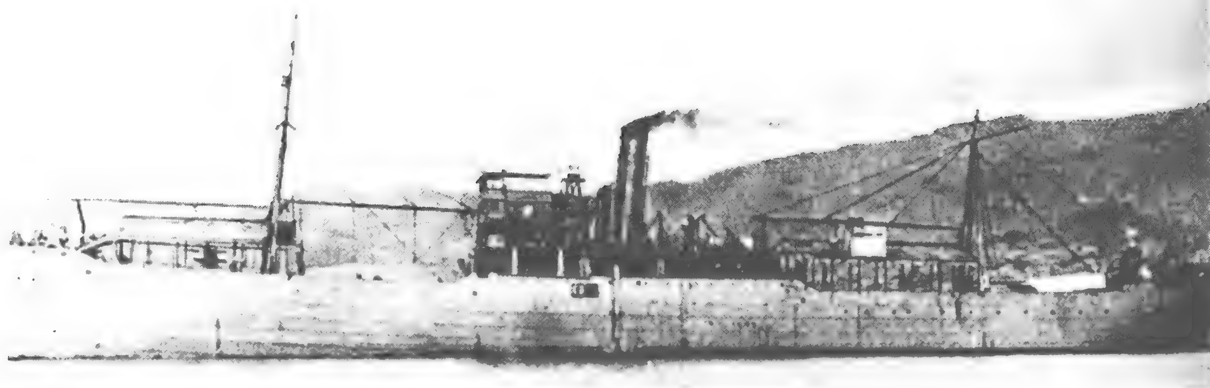
广大得多的地区的发展，外来影响可以以这些点为中心分布并发挥各自的作用。

因此，并无理由对不同的国家出于各自的迫切利益在中国展开的争斗与冲突忧心忡忡，这是不可逆转且应被如实接受的现实。当前的行动只能以当前的形势为依据。不应不切实际地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嗟叹，而应利用它来激励我们去采取行动。当前的需要就是使下一步行动尽可能地和最终目标相一致。

换而言之，要努力认清形势，在此基础上争取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在影响上的平衡并尽力减少其间的冲突。这类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尤其需要德国、英国和美国这些条顿国家予以关注，因为它们之间有必要进行合作，而合作依赖于认识的一致及利益的融合。比如说，在俄国这样一个国家，其政府体现的是最简单的政治一统观念。因而，俄国也就不像其他国家要不可避免地因组织的复杂而伤脑筋。在这样的组织中，公民的不同意愿之间既要有顺从，也要有一致，而这点对于国家政策和国际谅解都有影响。

从日本的崛起到现在以及今后，我们都需要注意日本。因为，日本有明显的重要性，而且，虽然就文化和位置而言日本是亚洲国家，但在通过行之有效的内外措施后，日本已经获取并保有了国际社会全权成员的地位。作为岛国的日本的力量组成使其必须位于海上强国之列。尽管如此，日本对于大陆的领土企图即使再大，也是有限度的，这源自日本和邻近的大陆相比，它的人口相对较少。更进一步讲，日本希望扩张领土是没有道理的。

西亚和地中海这样的地区尽管是现在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明显处于日本的可及范围之外。地理条件同样使美国的主要利益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及美洲大陆。而且，不像美国，日本国土的狭



1914 年日本海上飞机运输船

这是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一艘改良后的军用运输船。此运输船可以用来进行水上飞机的搭载，担任训练以及飞机运输的任务。

小使它不能希冀拥有可用于远方地区的剩余力量。何况亚洲的大国竞争会削弱日本开拓远方的可能，虽然它离大陆很近。实际上，可能除了俄国，所有国家在谋求土地占领方面都受局限。

日本由于其国土较小，其他国家由于距离较远，都应期望通过商业和政治联系来激发中国民众，从而改变中国。这可以在军事上借助于海上力量。海上力量由于其机动性，既可在当地发挥作用，也可被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以遏制敌对影响，起到诸如进行商业控制以加强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

即使四国协力为共同目标而行动，种族特点的本质不同依然会为人所察觉，且以某种并不一定就是敌对的方式导致各国在观点和作用上的不一致。

4

日本与中国同是亚洲国家，但它对吸纳欧洲文明所持的赞赏和热情是一个吉兆，它让人可以颇为放心地期望欧洲文明进入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并将其改造，就如罗马文明影响条顿部落一样。不过后种情形所产生的是条顿文明，而不是罗马文明的单纯扩延。所以，应期望的是一个经过改造的亚洲，而不是另一个欧洲。为此，愉快地接受一个新兴的亚洲国家或许是正确的做法。

然而，必须切实承认种族特性的不同会产生相应的观念或行为上的分歧，而这又容易导致误解甚至冲突。我们都希望正义与和平主导未来的世界，而种族差异方面的相互宽容对于规划未来是不可缺少、无比重要的。即使在一家人之间，利益的分歧也可导致争吵，但是只要存在着共同的情感与传统，和解就不是无路可寻，虽然源于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误解使人往往不易找到和解之路。

在上一章，陆上和海上强国对立的利益与地缘状况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不过汇聚于亚洲的各国在性情上的差异还未被较多谈到。这些性情可被归结为三大类：亚洲的、斯拉夫的和条顿的，其中任何一类或许都不能为他方不折不扣地完美理解。只是，必须认清、分析并接受不同的性情，不能有任何抱怨的理由和借口。毕竟，我们不能废除它们，何况，这也是不可能的，要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只要它们产生于本身内在的动因，且并

利益时能够坚信，只有适当地满足他人的要求，而不是执意阻挠其进步，才能最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当前亚洲的落后政治环境准确地反映了亚洲国家政治才能的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有效的组织机制的缺乏使亚洲人民丧失了采取有效行动的权力，余下的只是停滞不前和对变化的消极抵抗。这些是在未来的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过一时还用不着对其采取什么措施。

在为发展进行有组织的准备方面，日本是亚洲的代表。不过日本不足以成为强大推动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考虑，从特性与意图来说，另外两个相互竞争的种族中的哪一个对日本的短期利益和亚洲最大限度的未来发展更加支持。日本将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航向。

5

另外的两个种族，斯拉夫和条顿之间则有着一清二楚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方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差异中有一部分是根本性的，植根于种族自身之中。另外一些则是两个种族多个世纪的成长环境的产物。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源于相互理解之缺乏的敌意，另外还有利益的冲突。原因在于，两者在亚洲的相对地缘状况以及随此而来的抱负促成了这些冲突。

要想令人满意地处理这种局面，首先必须承认问题的存在，不要一边心存戒心，一边用伪善的辞藻粉饰现实。如果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希冀会出现两条虽然不同向、但也不会相碰撞的平行线。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合二为一，但可以如实地相互接受，不夸大相互间的分歧，并且在共同的关

注对象找到相通之处而不是争执。双方只有都认识到了对方的基本需要，才能做到这些。

种族特性的不同表现在了行为上，因为行为是精神的物质表现。在此之外，陆权和海权的区分也突出了两大种族之间的分野，限定了它们的利益和意愿。陆权和海权之分存在于两大种族的地缘状况之中，并和它们在亚洲的利益目标相联系，也清楚地涉及到交通问题，即朝向目标的通道问题。条顿国家占据海洋，而斯拉夫种族则几乎与海相隔离。但在陆权方面，条顿人处于劣势，它在地理上远离亚洲，而斯拉夫人的一大片地带却和亚洲接邻。亚洲的对外交通几乎全由海路，故而这方面条顿人拥有无可比拟的控制优势，它在海洋与商业发展上也同样如此。

从本质上讲，上述相对状况不可逆转。固然可有一些变化，但也仅在有限的范围内，绝不可能导致平起平坐。上述状况的存在也是政策的根据，这决定或左右国家对于扩大势力或实行占领的要求，影响着某一种族的垄断地位。另外，同样应承认每个种族绝对需要在并不主要由它掌握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点，虽然它们肯定会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共同的相互需要表明在一些领域双方必须相互让步，以力求协调。

例如，俄国对那条经由波罗的海和黑海迈向大洋的有缺陷的且政治依赖性强的通道就永远不会满意。同样清楚的是欧洲的条顿国家德国和英国不可能允许俄国在利凡特、并由此在苏伊士航线上处于主宰地位。但是，俄国可以做到这点，只要它能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就能将它被封闭在黑海内的海军基地转化为进出自如的坚不可摧的基地。要知道，一支能稳固地发展、扎实地训练并有自由出入口的强大俄国舰队所具备的优势在这个世界是无出其右的。

如果俄国针对的是苏伊士运河，那么和海权紧密相连的商业形势将有

根本变化。我真心希望英国通过以下行动来弥补自己的失败和损失：集中力量于地中海和利凡特地区，和德国共同维护对于苏伊士地峡及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从而确保对于两国必不可少，且无法为经由好望角的航线所取代的苏伊士航线的安全。

那么，怎样并且在什么地方俄国的海洋要求才有可能被满足呢？只有两个地区，不过得到其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会让俄国彻底心满意足，为此俄国对于海洋的孤立也不可能被改变。

这两个地区，一是波斯湾，俄国可以自黑海之滨纵贯波斯抵达它；另一个是中国的海岸，俄国已可经西伯利亚到达该处。俄国获得波斯湾意味着它必须侵略波斯或从其获取让步。抵达波斯湾不会使俄国的雄心得到满足，除非伴此而来的是对从俄国在东土耳其的边界最南点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的占领。

如果这些都能实现，俄国就处在了印度的侧翼，从而能够干预可能出现的从地中海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并延伸至印度的铁路。另外，尽管从波斯湾并不能像从利凡特那样对经苏伊士通往东方的航路施以绝对控制，但波斯湾具有侧翼上的意义，战时从那里可以施加长期性的威胁。而且，应注意的是，如果俄国在波斯湾驻有一支值得英国舰队及其盟友认真对待的海军，后者就可能疲于奔命，以至不得不放弃在黑海和中国海域的海军活动。

因为，如将海军力量分散部署于上述两个地区，它们相互间不太可能进行呼应。这样的形势暴露出的明显弱点会使有关国家不能采取一项会给它们带来危险的安排，这自然对俄国有利。

此外，如果反对俄国涉足中国海岸，这看来也无道理，而且会毫无必要地激起俄国的仇视。这样，如果对俄国果真不进行多少抵抗，和在争执

地带的西端时一样，在东端，我们也能看见各个强国的汇聚，它们围绕的中心利益由于中国的现状颇具争执性。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列强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

不过，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就是海上强国和俄国间的互惠协定不应采取正式条约的形式，而只应是一种谅解，它也不应由人仲裁，而应建立在按互让精神对现实的承认之上。并且还应包含这种认识：即不应

俄罗斯 Kuznetsov 级航母

“库兹涅佐夫”级（Kuznetsov）航空母舰是前苏联的第三代航空母舰。其主要使命是确保苏联弹道导弹和潜艇的安全和战斗效能的发挥，消灭敌方海上和基地的海军兵力。该舰的特点是，舰上装有滑橇式飞行甲板，舰上所装备的武器系统齐全，威力强大。



因此，从结果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和海军力量密不可分的众多利益是海上强国赖以存在的基础。若以海军为工具就要听从当地人民的意见，而不是强求当地人俯首帖耳。因而海军只能被用来抵抗排他性的举动，或帮助有关国家抗击征服行为。为此，海上强国应同心协力，不是以有约束力的同盟方式，而是本着心心相印的精神。

6

除了俄国和日本，其他有关的强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于是我们可将各国分为两类：一是主要以陆地为交通渠道的国家，另一类是依赖海运的国家。海上航线有着数量及便利程度上的优势，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贸易路线。这些路线中的两条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一是从欧洲经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因此，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必将给后者以重大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

“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一

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

上述状况赋予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们可以借此来抵消其在亚洲与陆上强国相比时地理和物力上所处的劣势。比如，拿破仑就是为此才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土地。不过，如果海上强国都采取美国所奉行的方针，在战时对敌人的商业毫发不动，拱手让出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借以在一地施压以缓解在另一地区所受压力的主要手段。这样的退让如果发生在今天，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凶险，因为在亚洲的交锋正处于成败攸关之时。

在德、英、美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特有着明显的利益，这儿正是两国和东方的交通线上最易受攻击的部分。为此它们需运用海军力量予当地以充分的防护，以亚丁及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另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无疑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必须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以及防范致命进攻的安全需要。

由于有利于所在国家发展的商业有助于上述影响的加强。因此，有关国家可凭借财力和在必要之时运用武力来支持商业。将苏伊士运河视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将此牢记在心，英国尤需如此。英国在印度的庞大利益随时可能要求利用这条捷径，既为商业，也为军事。即使是由苏伊士运河的封闭所造成的军队和货物的转船也会减小苏伊士航线相对于好望角航线的时间优势。

至于德国，它在该地区的利益虽然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不尽一样，但也是真真切切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以决定性控制，如奥斯曼土耳其

其他国家的权利，对这些权利不能仅仅用世俗的、本质上因时而变的眼光来衡量，还需要参照人类的那些并不完美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架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必须处于适当的位置，情感因素只有恰如其分，才可能处于理性思维的正确引导之下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过，一个国家的聪明才智更多的是体现在是否能通过和他国的合作来加强自身力量方面。这种合作基于利益的一致，如果这种一致又表现在了国家特性和传统方面，就会有助于共同理想的生成。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被维系在这样的一条三边纽带之上。它们不必结成同盟，但必须以被血缘关系所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美国和德国、英国的利益虽不尽相同，也十分接近。如果认识正确，那么这三个国家虽然是追求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不应成为敌人。因此，美国在感情上应站在英、德一边，帮助扩大它们的影响，从而增进共同的利益。此外，有关英、德与东方的交通对美国的影响是间接的，因此，这很不容易引起美国的关注和同情，因此，能做的就是更多的理解了。假如美国能有这样的明智认识，美国和英国、德国之间自然也会有更多的相互关照。

于是，反过来美国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注意和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英德三国各有各的方向和要求，这三国也能达成默契，在利益重合的地方一致行动。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前者从政治上看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则对美国必不可少。

如果双方都能够顾及对方的需要，并给予或是积极干预或是道义支持之类的帮助，就像英国在美西战争伊始不支持组成反美联合那样，大家也就不需要考虑对当地进行政治干涉了。当共同利益需要时，就应根据对形

势的正确理解共同行动。在此之外，每一方的分内之事应不受干涉，错误的插手常常使最亲密的朋友反目为仇。

因此，我们必须公正、冷静地考虑当事双方的利益，切实顾及我们所打交道的国家的想法和基本需要。在思考过程中，既要抛弃任何成见，也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的作用不应妨碍形成客观、公正的判断。亚洲问题的演化需要几年而不是几天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信条或许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根据当前现实依然需要考察它们。

比如说，一条交通线是否重要很大程度上由东方问题决定，因此经由苏伊士的较短航线才日益重要，这条线经过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也更多地处于变动之中，地中海地区也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重新获得了以前曾享有的突出地位。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勒比海由于其对巴拿马地峡的意义，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而门罗主义对该地区的运用也显得更重要了。

太平洋地区对美国也日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既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广大市场，也是一个交通要道。而且美国在该地区新获得的地盘也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加大了它对于该地区的责任。而已经存在的苏伊士运河和将要出现的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则集中体现了当前变化的本质特征，与此同时这两条运河的使用又是这些变化的促进因素。无疑，麦哲伦海峡的地位将由巴拿马地峡取代，而地中海的顶端则取代了好望角。

这样，新的形势导致了非洲和美洲南端的相对孤立和重要性的下降，也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地区对于交通要道的意义已经较小。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东亚危机的临近导致的另一个影响重大的情形是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的接近。这个事实鲜活可见，而且由于英、美清晰可辨的当前和未来的利益一致性，正处于客观的发展之中，虽然双方间还有着不少的不愉快因素。

此外，英美接近不仅仅是一个情感上的过程，但双方间由来已久的情感适逢其时地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首先，起首要作用的依然是利益的一致。紧接其后的是感情上的互助。关于这个，从美西战争的起源中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明显地表明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支持被压迫的受苦者的理想，只不过相对的孤立淡化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这种同情。

在美国，人们已睿智准确地看清了上述情形。不过，存于人们心中的一些简单的迷惑又不无道理地影响着对于正在南非进行战争的英国人的同情，因为南非战争所围绕的问题正是当初的美国革命为之战斗的，而且一旦人民没被给予代表权，向他们征税就是粗暴的压迫。这个原则其实为英国和美国所共知，只是英国暂时的违背令美国反感。

由于英美两国都认识到彼此间有着共同的观念和理想。因此，在美西战争和南非战争中都有着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同情。

借助于战争，美国的团结得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得以实现，而德国人则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这是德意志帝国的存在基础。战争也促进了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心心相印，从而使帝国联邦设想能尽快转化为具体行动。没有战争，这个转化是不可能的。

同理，为了将英国与美国间的相互同情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使美国乐于欢迎，并报答由此而来的英国给它的无价支持。这也需要美英之间存在的共同情感和共同利益，一旦有战事，或者说当一国受外来干涉威胁时，它的姐妹国家就能予以支持。

当然，战争肯定是一种灾难，给人类带来最多痛苦的灾难之一。不过，此时需要认识到，虽然“仲裁”这个词颇为人所喜爱，但这仅是因为这个词的美好内涵，而不是因为人们对于当前形势已经有了全面、理性的分析。在两年之中已经发生了两场战争，而任何一场战争所关系到的正义目标都不可能依靠温和方法得以实现。

当美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区已有40万人死于悲惨的长期饥饿，这很大程度上是西班牙人残酷镇压的结果。进行对西班牙的战争的理由在于美国有权出于简单的人道原因进行干涉，以及西班牙业已不可能以对被统治者无害的方式来管理它的殖民地。也就是说，已经用不着再相信西班牙人的新允诺，这不一定是出于对他们的诚实的怀疑，而是因为持续的失败已证明西班牙根本不具备实行正义的、健康的统治能力。

英国进行与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的理由既在于与以上相似的解除压迫的干涉权利，也在于一个多世纪之前，美国的先辈为之而与宗主国开战的普遍原则。即：不是以代表权为基础的征税就是暴政。

一般来说，英国并不为住在海外且处于不良统治之下的英国臣民强行索取公民权。不过，德兰士瓦 90%的收入由英国居民所创造，为此英国主张德兰士瓦国家给予后者平等的待遇以作为回报，但这被拒绝了。需要记住的是，在南非，不仅英国和美国的首要信条自由遭到了践踏，而且曾鼓励外国人前往德兰士瓦的五年内可获公民权的法律竟在五年期未到之时就被修改了，于是应有的权利遭到了剥夺。

有意思的是，说英语的英国和美国分别参加了上述两次战争。相对而言，这种情形在德兰士瓦战争中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许多生于异国的公民对他们的出生之地仍有着一股亲近之情，而不怎么受美国利益的影响。

即便如此，英、美之间依然有着坚实的联合基础。两国的相互理解已经开始，不仅在利益和传统方面，也在平等和法制这些观念方面。只要这种认识日趋深入，两国之间就会越来越为共同的精神所维系，并可能建立联盟意义上的联系。为使这个集团在种族和精神上都更臻完美，其他的条顿大家庭成员也应加入，而德意志帝国尤为重要。对此可以等待，人为强求这一过程的早早实现绝非明智之举。当然，需指出的是，英、美日益接近作为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对于第三方的加入有着最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结论，可有如下的认识。

当前的时代和行动的需要业已表明了英语种族之间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另外德意志帝国也可能加入共同行动之列。

在过去的世纪中，各种因素使欧洲拉丁国家的权力和影响与条顿国家相比显得相形见绌。然而，意大利的统一却使事情有了明显的变化。而且，新的意大利在地中海上处于战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对于欧洲的重要性甚至远大于加勒比海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另外，政治考虑还使意大利和法国

分别位于了政治平衡天平的各一端。

意大利的上述态度和拉丁国家以及条顿国家的根本需要是吻合的。后者要保证其在利凡特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对作为海上强国的它们必不可少。颇具意义的是，这个形势使意大利这个最具传统的拉丁国家和条顿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这样就保证了美国能继续发展与拉丁文明的合作。

而且，对当今时代尤为重要的是，意大利这个伟大的罗马的直系继承者已清楚地明白了其利益所在，并且将以意大利为中心恢复拉丁文明而感到光荣，而这会增进已从拉丁文明中获益甚多的各国的普遍利益。

第八章

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

外来压力迫使日本要进行变革，不过日本人并没有主动地去寻求压力的刺激。日本只是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后，为了普遍的利益，他们必须让中国接受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解决。这就是日本的对外战略决策。

而中国也必须打破固步自封的传统，以开阔的胸怀接纳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壮大的事物。唯有如此，才可以追上或赶超欧洲文明。

因此，从日本的改革经历我们最好能认识到，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向来是阻止一个国家改革的绊脚石。

日本的转变是条顿祖先的经历的重现，对后者产生影响的是罗马的政体和基督教。不过，与日本物质面貌的巨大变化相比，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对日本的渗入还为时不长，因而也就尚未达到完美的地步，从而可以独立地发挥其影响。因此，日本仍需要借助人人可见的物质成功来促进、鼓励对外来观念的吸收。这些观念就潜藏于物质表层之下，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认识、理解它们。而且，只有依靠长期实践和新思想的变革力量，才能使其能真正为我所有。

为此，日本必须虚怀以待，不是迫于外来压力，而是发自内心地愿意。如果日本这样做，它会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善意对待。后者并不想在日本看到一个它们自己的翻版，这只会是一个虚假的模仿和构想，而是希望曾使欧洲受益无穷的力量也能让一个亚洲民族从里到外获得新生。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国家不同于另一个国家呢？

2

欧洲国家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显示了以下两个因素：

(1) 国内的进步与个人的完善。

(2) 对外来影响的积极反应。

在日本，目前也仅在日本，我们看到了亚洲对欧洲文化的欢迎。如果可以根据所结的果实来判断一棵树，那么在这种欢迎态度之中，我们也可看到日本人民在实现增进幸福条件方面，都有巨大的希望。

3

尽管最近在中国发生了某些事件对各国的行为和决策产生了暂时的影响，但决定各国政策的根本形势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它主要取决于中国之外的，从东到西的全球范围之内的状况。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欧洲各国已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是一致与冲突并存的。其中，这一致性就体现在，各国需要把亚洲国家纳入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中，且不是诉诸外部的锁链，而是通过内部的改变。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看，这个设想完全具有切实保护各国利益的意义。它所针对的是遥远的未来，其目标不是一个幻梦，而是和一个不断地因具体事态而调整的一般过程相一致的战略态势。

我们来看美国是如何认识的。美国政府不仅体会到了，而且最近还用书面形式说明了以下两个相互补充、但表面上看来又是相互矛盾的认识：

(1) 必须强调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侵犯。

(2) 尊重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独立。

关于第二个认识，和下面这个看法完全一致：

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满腔同情和必要的积极帮助中国，而不是无道理的干涉去协助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并改造，并重新规定他们国家的生存状况。

实际上，美国政府发表上述内容的声明是颇具意义的。因为尽管该声明无疑针对了最近发生的事件，但它的主要意图是表明不干涉中国。该态度是对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普遍倾向的强调，不过根据近来的新情况对其

作出了具体的职责和政策规定，在美国的这种立场中，可以看到超越过去和当前的理性的理想主义和务实主义的良好结合。后者使前者能够充分考虑到当务之急，并为它们所修正。这就像在前方出现一个未经标记的浅滩时，水手转舵绕其而行，等到看见了深水区时，再按自己要去的方向恢复航向。

上述这些表明了美国的领导者的英明才智。不过，对于实际上还是领导者们行动的最终认定者即普通大众来说，仍有必要对近来动荡年代中的事件予以特别关注。这是因为，通过考察当今时代的种种迹象，我们可以马上知道它们给予了我们什么机会，并从此机会中得知赋予了什么任务。

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履行这些责任，这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要知道，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我们的领导者在行动之时不可能无视人民的普遍意愿，而如果这些普遍意愿和现实情形紧密相连，领导者就必须努力如实地了解现实，并根据种种表现估测变化趋势。

这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是注重观察现实，二是得出合理的推论。

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知识和实际结论，规定了一个国家决策的大致方向。如果有了这些，国家的举措也就有了保障，人民也就可以放心地让政府去处理日常事务，而一个得到了人民坚定支持的政府在这个世界上将无比强大。

总而言之，在当前世纪结束之际，形势的发展已使世界商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所在。一些国家或许不敢奢想成为商业霸主，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世界商业圈中收益的份额，而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也取决于在一个国家尽可能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

地理上，它大体位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在这条600英里宽的地带中，有着亚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包括大部分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华帝国的绝大部分。

在上述两条纬线的南北，英国和俄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力。由于商业控制所领先的军事力量的性质，这两个国家一个主要以陆地为根据，另一个以海洋为依托。同样已经指出的是，倚仗政治侵渗而不是与其相反的纯粹商业竞争在远东谋求商业控制的基本问题正左右着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对抗。

在亚洲大陆范围内，就亚洲的问题而言，军事力量的作用典型地体现在了俄国和英国身上。这两个国家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和海军，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他们发展商业的手段也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另一个则主张通过绝对地废止他国权利或取得超乎一般的特权来实行独占。

在亚洲大陆之外的其他一些强国，包括美国的领土状况，使它们就军事力量而言属于海军国家，而且在一般政策而非正式同盟的意义上，美国是和英国站在一起的。它们和英国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惊人地类似。而且，同英国一样，由于地理上的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关键利益，美国也缺乏在中国内陆充分使用军事力量的能力。

不过和欧洲相比，美国受到的影响小一点。因为，与欧洲的距离相比，美国离东亚更近，凭借对美国的防御至关重要的海洋，美国更能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

不过太平洋和南非至英国间的距离一样长的宽度，会使美国不容易在东亚进行军事行动，这必然促使美国尽可能地避免对外行动。日本虽然离亚洲大陆很近，但它有限的幅员、人口以及财富，必然会使它的力量长期

受限。

由于上述原因，所有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就不能通过炫耀武力（虽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和最令人信服的体现，就在于商业及来自其中的种种好处上。借助于商业，就能使道义和精神能得以传播。这好比人一旦拥有这些，他就会看轻物质上的享乐，认定人不是仅为面包而生存。

5

目前，除了俄国和与其结盟的法国，其他为在亚洲、尤其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而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广泛意义上的海权为后盾。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上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能从商业中获益，并通过互利互惠来影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也表现为海军在海洋和可航行水道上的军事行动。海上强国依靠这些，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通过逐渐侵削或断然使用武力，将它们全部或部分地从中国排挤出去，限制它们的贸易自由的企图。

不过有一个地方是例外。这个唯一的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在笔者看来，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

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

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100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30倍的收获。

商业扩张以及从其中产生的好处，只是使欧洲国家如今向中国施压的部分原因。东西方文明的接触及相互的影响不能一直被漠视，也不能因为围绕着不受干涉权利及所谓的独立国家的自我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争论不休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这种相互影响过程已经开始，而且既不可折回也不能被阻止。

所以，美国能够积极去做的就是引导这个过程，并争取实现一种良好的环境，以使两个文明能自由地发挥各自的影响。同时，各国已坚持要求中国给予自由买卖的权利，并不讳言中国人必须和美国进行贸易。

这样，美国也可以要求其思想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且中国人有着交流思想的自由。当然这不是强迫他们去倾听甚至接受什么。

如此看来，在处理中国问题之时，首要的目标是：

（1）防止任何外部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

（2）坚持门户开放，而且是在超出对这个词的一般理解得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应在商业上开放，也应对欧洲的思想和来自各个领域的欧洲教士开放，不过后者应是自愿来华者，而不是某国政府的代理人。

就实际意义而言，向中国施加思想上的影响远胜于仅仅给予它商业实惠，而且对欧洲国家说来，中国变得有序而强大而与此同时却又没有为在

欧洲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陶，那确实是一件危险的事。

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理所当然是荒谬之极的，这和对和平的发展与进步的追求完全相背离。在欧洲，基督教和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科学工作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面的估计，关于基督教在欧洲的影响的性质与程度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确实存在是无可否认的。

从纯粹的政治观点看，基督教思想、教义和欧洲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同等进入中国的权利，而一些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冒犯，也不应被当成将基督教排除于中国之外的合理理由。

举个例子来说，修建铁路并不是一种基督教活动，但却触怒了许多中国人，只不过由于这种行为已被其政府允许，他们只好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对传教活动的同意，却不能促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洗耳恭听。在中国的贸易开放上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凭借压力取得的，而最重要的施压手段就是战争和武力。商业借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来开辟道路，而思想，无论世俗的或基督教的，只要求借言论的自由而传播。

既然当前的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于了一个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那么对美国来说，其公民完全有必要认真去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并如何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是目标和能力两方面的。

目标上的准备是一个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首先要制定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再仔细选取一个行动方向，也就是形成一项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十分明确。

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这主要包括两个相关的要素：

（1）做好必要的武力准备。

（2）按照政治形势的切实需要来削减义务。这能使我们节省下力量并将其补充到必要的地方去以加大力度。

需要注重的是，我们应全神贯注地考虑上述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就中国而言，最近在那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已促使美国政府就它的目标与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美国在现在及将来都将继续执行业已体现在过去的行动中的政策。对美国人民来说，他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设想一个什么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良知，是否符合是非感，是否体现了对于现实的期望。

总而言之，美国坚决要求获得平等的商业权利，同时将努力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以及独立选择自己的政策和政治制度的权利，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除非发生了在国际范围内不可容忍的事情。

不过在阐明这个政策之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该政策和与其他国家的在中国的政策并不一致。对这些差异用不着大惊小怪，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简而言之，美国并没有什么把握能得到随“门户开放”而来的商业利益，除非美国为争取中国的开放而付出应有的努力。同样，美国也没有什么把握使中国的领土完整能切实得到尊重，除非美国愿意发挥道义的影响，在必要之时毫不犹豫地以武力反击任何会排挤美国的商业、削弱美国的影响的专断行为。

美国如果要在中国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中国的代表人物认识到美国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来帮助他们，抵制任何超出合理限度之外的要求。美国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是世界的普遍利益，美国不可能毫不受损地和这种利益相分离。当然，这些原则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会有具体

的体现。

因此，美国政府不可能让中国问题放任自流。中国应该乐于接受外来的正确的政治观点，以及高深的思想并将其融为己有，从而从其内部实现应有的变革。国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出现或获得新生，单凭外来压力也不可能使体现于个体身上的优秀素质为一个国家组织所拥有。变化过程只有始于内部，并且以其有固有的或植入的活力为条件。不过，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进行自我更新、从外界自觉地吸收、消化精神营养的内在动力，而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至少大致具备了这点。

6

外来压力迫使日本要进行变革，不过日本人并没有主动地去寻求压力的刺激。日本只是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而中国即使在已经和外部有了长期接触之后，仍旧继续反对吸纳那些可以一扫其沉沉暮气的东西。目前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反动浪潮的目标，就是切断与唯一可能的活力源泉的联系，抗拒这种浪潮既合理又完全必要。

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中国可以不必喝水，但它至少应允许将水输入家门。何况即使美国袖手旁观，上述工作也要进行。

因此，可以这样去理解，门户开放政策，不管是商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的，应针对中国任何地区。要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的中部地区比较容易实现，并以此为坚实的根据地来推动其他地区。其原因就是，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最稳固地存在。因为，汽轮从海上可驶至离海 600 英里

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一个大港口。

这个事实也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在这里，给物质文明提供动力的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假以时日，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赖以抵制与合理外来影响截然不同的外来控制行径的主要后盾。

所以，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范围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一个中心地域，而不是四面出击。而美国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不过，美国会因此而身处在几个强国的利益争斗之中，因为长江流域也是其他欧美列强的地盘，这种争斗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和趋势。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需要与某些国家建立正式的同盟关系，或明确站出来反对某个国家。这是因为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国家之间都有大家各取所需的利益要求，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有着限度，如果达到了这个限度，美国就必须进一步行动，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才能成为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美国不能得罪所有的国家，而是当有共同利益的时候，是可以采取同盟或者合作的关系来获得在中国的利益。关于这一点，英国和美国在利益的性质以及法律和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共同之处。

所以，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希望的，不过不能误以为合作必然要求放弃选择自由的权利。因为，没有这种自由就不可能保持行动上的独立，而一个条约，不管是关于结盟还是仲裁的，只要是无条件的，就可能危及美国的自由，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将为一无所知的未来立下保证。

因此，为保证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就需要显示美国的力量，或

为了在东方发挥美国的商业影响，美国迫切需要使大西洋海岸能够借助地峡运河，来缩短与和东方的距离，为此美国还同样需要在加勒比海巩固其海军地位，以此确保运河的使用。

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在此不妨给一个军事教科书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的告诫：即足够的安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安全，在任何军事局面中，不管是被动的防御还是进攻行动，危险都不可能荡然无存。我想这对任何职业来说都是如此。当然，一种合理的、压倒性的有利于己方的局面还是可以获得的，拿破仑有一句至理名言就肯定了这种情况。

那么，美国是否可以因为不可能做到极致，便不努力去尽量争取安全呢？是否在任何情形中人们都是如此行事？成功的人当然不会这样。让我们考虑一下在什么条件下美国才最有希望确保地峡运河为美国所用。

首要的一点是，美国必须有着一支可随时应付紧急事态的强大海军。这不是为了压倒任何有意和美国作对的海军力量，而是为了让对方明白，和美国在加勒比海竞争统治地位在政治上是明显不划算的。这样一来，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重视、顾忌美国。也只有这样，美国关于加勒比海的立场才会被普遍认可，运河的安全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保证。对此，美国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支强大舰队，这个做不到，其他的也不必提了。

迄今为止，只有英国这一个强国，曾经试图对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地位进行挑战。直到最近不久，英国才停止将西印度群岛和南美作为其商业和政治考虑的主要目标。英国对该地区的兴趣，自 18 世纪以来就存在了，那时，美洲的糖是英国的主要贸易商品之一，西班牙的殖民地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在英国人看来是令其垂涎三尺的有利可图之地。

第九章

美国向外看

英国因其强大的海军，和在美国的海岸附近握有坚固的据点，这无疑是美国的假想敌国中最难以对付的一个。欧洲的海上强国并不只是一心一意地提防着它们的陆上对手，它们也怀有进行商业扩张的想法。这将使它们，而且已经使它们卷入与美国自己的冲撞之中，即使美国目前还没有推行放开手脚的政策，其结果也是一样。

1

英国因其强大的海军，和在美国的海岸附近握有坚固的据点，这无疑是美国的假想敌国中最难以对付的一个。在这种情形下，和英国国家达成诚挚的谅解是美国一个最重要的对外利益所在。此时，美国人关于他们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想法与政策正逐渐发生变化，在这方面的种种迹象不难以找到。

比如，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为国内工业保持住国内市场，这成功地在各种投票活动中得到了肯定并规范了政府的航向。雇主们和工人都同样被引导着从这种观念出发来看待各种被提出的经济措施，对任何有利于外国生产者向他们自身领地渗透的步骤持敌视态度。

在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内，美国的工业一直受到保护，以至于这种实践已化为了一个传统，落入了保守主义的窠臼之中。这些工业就像近代的铁甲舰，虽有着厚厚的装甲，但引擎和火炮低劣；能很好地进行防御，但攻击力薄弱。

当前，夏威夷群岛上的内部麻烦正愈演愈烈，不允许其他国家具有与美国同样的影响力应成为美国坚定的决心。在整个世界上，德国的商业和殖民推进正和其他国家发生碰撞，德国和西班牙在加罗林群岛问题上、和英国在新几内亚划分问题上的纠纷。最近德英两国关于在非洲的利益分配的谈判法国对此深具猜忌。萨摩亚事务。德国和美国围绕着西太平洋群岛的冲突，以及所谓的德国在中南美影响的扩大。这些都是都是确凿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关于德意志帝国的进攻性的、尚武的精神气质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德国的扩张被确切地认为更多地产生于德国的国民性格而不是其政府的有意识的政策。德国的政策在这方面不是引导而是顺应国民的情绪。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更加可怕的情形。

2

眼下，动荡不定的政局，如在地中海、中美洲和许多太平洋岛屿，尤其是在夏威夷群岛，所存在的和大部分这类地区在军事和商业上的重要性相结合，正滋生着各种危险的争吵。对美国而言，未雨绸缪才是稳妥明智之举。无疑，和旧时相比，各国总的趋向是更加厌恶战争。不过，为了拥有珍贵的闲适和悠然自得地享有商业带来的好处，就必须坚持具备和对手同等的力量。

另一方面，无论是国际法上的规定还是基于某个公理的裁决，其都不能被指望用来求得对争执的公平解决。如果它们和一方的强烈的政治需要相冲突，而另一方又处于相对的弱势的话。比如，就依然悬而未决的关于白令海海域海豹的猎捕的争端而言，不管如何看待美国的主张，根据受到

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准则，无疑美国的意见是合理、公正、符合世界的总体利益的。

可是，当美国试图将其主张化为现实时，他们自己都强烈感觉到这对于国旗的尊严的民族主义的敏感是相抵触的。这不仅仅是英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美国的海岸漫长且缺乏防御，还在于英国的较大殖民地加拿大认为宗主国的力量是它们需要和可以指望的东西，这对英国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商业和政治优势。

因此，这样一来，有关的争端存在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而不是美国和英国之间。可是后者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争端来促进它和其殖民地之间在感情上的亲密。仅就英国而言，它可以和美国方便地达成一项对双方利益都有所增进的平等安排。可是加拿大渔民的纯属地方性的和过于自私的要求规定了英国的政策，出于加拿大是连接英国和其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和海上利益的最重要一个环节的缘故。

3

在欧洲战争爆发的情形下，英国海军可能无力保持经地中海通往东方的航线的畅通。但是，英国在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连接起来的哈利法克斯和基蒂马特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基地，从而拥有了一条替代性的交通线。这条线路比前者以及经由好望角的第三条航线，在避免受到海上攻击方面要好得多，而且两大基地对于英国在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商业活动和海军行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论上述争端最终如何得以处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立场只可能在加

拿大和其他大殖民地造成对母国的依附情感和信赖的强化。

另外，上述争端看来无足轻重实则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助于美国确信存在着许多伴随着通过中美洲地峡的运河的开凿而来的，对西半球和平潜在着和尚未被预见的危险。简而言之，这条运河会改变贸易路线的走向，从而会导致商业活动，以及通过加勒比海的航运量的巨大增加。这也意味着，这片海域的每一个地点的商业和军事价值都会上升，而运河自身将成为最为举足轻重的战略中心。如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一样。是运河将两大洋连接起来。

不过，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除非这里为条约所详细保障，否则它会完全为凭借海军力量控制海洋的好战国家所拥有。因此在战时，美国无疑应控制加拿大铁路。

不过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比之于任何一个海上强国，美国将无力控制中美洲运河。这是因为，就美国当前的军事和海军准备而言，在欧洲国家卷入的情形下，地峡的凿通对美国只能是一场灾难，对太平洋海岸尤为危险。

无论就事实还是意图而言，美国还是可悲地无法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发挥重大影响。除此之外，美国在墨西哥湾甚至都没有开始构筑一个海军码头，以作为其行动基地。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尽管美国有着大量的收入盈余，但对应于海岸长度和暴露地带，它依然显得贫穷。

那么，是否美国准备让德国获取位于拟议中的巴拿马运河和尼加拉瓜运河的大西洋出口前方的荷属古拉索岛据点呢？

是否美国准备默许某个强国从海地购得一个濒临向风海峡？比如，美国的轮船经由该海峡开往地峡的海军基地。

是否美国默许一个外国将保护权施于夏威夷群岛，这是太平洋的中心据点，至旧金山、萨摩亚和马克萨斯群岛的距离相等，并是美国至澳大利

亚和中国的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站？

或者是否可以认为，假如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出现，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的政策和权利坚如磐石，以至于对方会马上收回自己的迫切要求并体面地后退？

这些问题，很显然，美国绝不会这样做。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这就是，美国将如何备战，并以此保护自身的权益不受到侵犯。对此，可做以下分析：

这就是，在估量美国进行军事准备的需要时，要考虑到美国主要的海军和军事强国离其海岸比较遥远，如果美国在如此长的距离之内采取行动，那将十分困难。

但是，如果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居于有利地位的话，它就能够充分维护自己对于海豹猎捕场所的正当要求。这不是因为它可在大洋上截获他国船只，而是因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美国的城市受到保护，不受海上攻击。当然，这主要是其地理位置、人口优势使美国能对加拿大的太平洋水域可以任意采取行动。

另外，虽然在政治家的思维中固有的认为，美国在西半球的地理优势以及某个欧洲国家在对美国采取行动时，要对付的种种不利是不可否认的，但如果认为单是这些就足够保证美国的安全就显得天真幼稚了。因此，这需要把更多的东西投到天平上才能使其朝向有利于美国的一方倾斜。

当然，上述因素仅是防御性的，而且还只是部分地。尽管路程遥远，美国的海岸还是可以被抵及。何况，这些海岸未设防御，因此，美国只能在短时间阻遏前来攻击的力量。

不过，倘若美国海岸的牢固程度和它今日的薄弱程度一样高，在贸易

或战争方面的消极防御就只可能是一项可怜的政策，只要世界依然充溢着斗争与盛衰兴亡，那美国周围就处处是争斗。像“生存竞争”、“生活的竞赛”这些词语就是最好的解释。

因此，除了一场有组织的战争，美国的保护性安排指的又能是什么呢？的确，只能运用某些今天所有国家都承认的、属于国家权力的合法使用的程序。即使这些用自己的力量做自己愿做的事是正当的，美国的人民难道是如此地温顺以至于他们在其利益系于受到争议的权利之时不可能独行其是？或者是如此地麻木以至于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人向那些他们长期认为自己的影响应占上风的地区的侵入渗透？

这当然不可能。

4

实际上美国自己造成的在市场方面的孤立闭塞以及过去30年中在航运方面利益的减少与这个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生活的遥远是特别吻合的。现在，在笔者面前的是一幅北部和南部大西洋地图，它显示了主要的贸易路线的走向及所承载的运输量的比重。

有趣的是，我注意到相对比较冷清的地区是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和邻近的国家与岛屿。一条宽广的运输带从我国的北大西洋海岸延伸至英吉利海峡，同样宽阔的另外一条从不列颠群岛通往东方，经过地中海和红海。这条运输带溢出了红海的边界以表示贸易规模。通过好望角和合恩角的运输带的宽度，是红海地带的四分之一，它们在非洲与南美洲之间中线上的近赤道处交会。从西印度群岛发出的是一条细线，标示着当前英国和一个

及有着不断推动国家进步的进取精神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居住于美国的太平洋沿岸各州而被保持和加强。某项生气勃勃的对外政策在美国任何其他地方得到的支持，都不会像在落基山脉以西的民众中得到的支持那么多。

5

前面提到，在当前美国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一条横穿地峡的运河会给美国带来军事上的灾难，尤其是给太平洋沿岸地区。一旦运河修成，大西洋海岸并不会比今天更加暴露，它只会和它所在的国家一起承受更多的外来干预的危险而且缺乏足够的手段去对付它们。

而太平洋海岸则会由于它和欧洲之间的路线因经由一条能为更强大的海洋国家所控制的通道而大大缩短，从而蒙受更大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在于可以更方便地从欧洲派遣一支敌对的舰队，也在于某个欧洲强国能够在太平洋沿岸保有一支比先前更为强大的海军，因为这支舰队在需要之时可以被迅速得多地召回国内。

不过，如果太平洋港口的巨大弱点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明智处理，美国在那一地区的海军优势就能得到保障。由于入口的宽度和深度，旧金山和普吉湾这两个主要的中心不可能为鱼雷艇有效地保护。随之而来的是，舰队能经由一条毫无阻碍的通道通过炮台。

因此，仅仅依靠堡垒工事并不能给这两处地点带来充分的安全。尽管这些设施对防御是有价值的，但还应另外派驻海岸防御舰队，与炮台相互配合以反击敌人。而且，这些舰队的行动范围不能超出为其指定港口距离



改进后的美国战舰“瓦良格”号

“瓦良格”号其舰名来自于古罗斯时代的瓦良格人，1897年，在美国费城城克朗普船厂建造的轻巡洋舰。

之外的地方，因为这支舰队是该港口的防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这个限度之内，这些舰船永远可以在战争形势使该港口成为敌对的焦点之时给在海洋上行动的海军以有力的支持。通过舍去进行长距离航行的能力，海岸防御船只相应地可以在装甲和火力方面得到加强，也就是说具备更强的防御和攻击力量，从而增加了它对于在某一时刻将与之共同行动的舰队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除了英国，没有哪个外国拥有非常接近美国的太平洋海岸从而可以将其纳入它的海岸防御舰队行动范围之内的港口，而且值得疑问的是是否英国会在温哥华岛部署这样的舰队。

一旦加拿大太平洋海岸交通被截断，而美国一直有能力发起这样的打击，温哥华也就失去了它对英国的主要价值。这时，哈利法克斯、百慕大

和牙买加的所有者会通过对我国的太平洋海岸施压来保卫温哥华和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

就目前美国的海岸防御状况而言，英国绝对可以这么做。和美国的易受攻击的大城市相比，就算拥有整个的加拿大又有什么意义？

甚至即使美国的海岸得到了加强，英国还是可以那么做，如果美国的海军还不像如今所规划的那么强大的话。美国对加拿大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以至于加拿大与美国的海岸贸易被切断。

面对这些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建立良好的军事准备。正如谚语所说：天鹅绒的手套里面要有一只铁掌。而要做到这点，三件事不可缺少：

（1）凭借筑垒和建立海岸防御舰队来保护主要的港口。这将增强这些港口之内的团体的防御力量、给他们带来安全，并为一切军事活动提供必要的基地。

（2）壮大海军力量。这会使进攻性力量如虎添翼，单是它自己就使一个国家能够向外扩展影响。

（3）美国的政策应表明这样的不可违背的决心。

今后没有哪个外国将会在离旧金山3000英里之内获得加煤站。当然，这个距离之内包括夏威夷和加拉帕戈斯群岛以及中美洲海岸。燃料是现代海战的生命，是舰船的粮食，没有它，现代的深海庞然大物就会寸步难行，毫无作为。所以，一些最重要的海军战略考虑必须以燃料问题为中心。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美国面对的是许多外国的燃煤补给站，这促使美国要坚决地拥有武力，甚至是像迦太基促使罗马那样。因为，美国不能再默许由于他国在北太平洋先发制人而增加自身的危险，从而进一步分散自身的力量。

总而言之，在英国因其强大的海军和在美国的海岸附近握有坚固的据点，这无疑是美国的可能敌国中最难以对付的。必须格外提及的是，和这个国家达成诚挚的谅解是美国一个最重要的对外利益所在。

因为，这两个国家无疑要谋求各自的优势，但两者又受发自同一源泉且深深扎根于自己天性之中的法律和正义观念的支配。无论出现什么一时的偏差，一种向共同的权利标准的回归必定会接踵而来。

对此，英美两国缔结正式的同盟是不可能的，但对双方在禀性和观念上的相似予以坦诚的承认将激发亲近感，而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对双方都有益的合作。如果两者不再那么习惯于相互间的大惊小怪，一种更稳定的情感就会有力地生成。

第十章

夏威夷的战略地位

对夏威夷的兼并不会仅是一项与全部的动机相脱离、孤立的、非理性的行为，而且是一项成果，是扩展至已为其所充溢的国土之外的必要性的象征。



美国“帕金斯”号驱逐舰

“帕金斯”号是美国海军基林级驱逐舰。它是以海军准将乔治·H. 帕金斯的名字命名的第三海军驱逐舰。1944 年 6 月 19 日它由钢铁联盟公司在得克萨斯州的奥兰治建造完工，1944 年 12 月 7 日下水，并于 1945 年 4 月 4 日投入使用。

在这个原则的作用下，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亚丁和印度向世人展示出了一根完整的链条。这根链条被一环一环地打造而成，或通过公开使用武力或凭借政治交易。只是这根链条一直为一种民族特性牢牢地驾驭，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和恰到好处。为了说明这一点，从格莱斯顿先生想使英国结束对埃及的占领中得到证实。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对于政治生活的长期脱离结束的同时，是在埃及的英国占领力量的增加使他的回归愈发引人注目。另外，对于刚才说的那条链条，可以不无裨益地注意到，它的两个端点是最先为英国所获取的首先是印度，其次是直布罗陀，然后是马耳他、亚丁、塞浦路斯和埃及。

而且，毫无例外地，英国在采取每一个行动时，都有一个对手在一旁

气恼不已。西班牙从未停止过为直布罗陀而悲伤。拿破仑也说："我宁愿看到英国人出现在蒙马特尔高地，也不愿看到他们出现在马耳他。"

法国对于埃及的所思所想也是众人皆知的东西，甚至未经掩饰，再加上美国的警告，得不到机会的恶劣感觉更使法国气恼。

作为补充，在这里还需要提及一下英国在海洋上拥有的另一根链条：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圣卢西亚和牙买加。这些链条强化了英国人对于大西洋、加勒比和巴拿马地峡的控制。

但在太平洋地区，英国的地位就不那么令其满意了。相比于太平洋西岸地区，东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发展是很晚时候的事了，而且仍欠完善。在西太平洋地区首次对欧洲的冒险家敞开大门时，这里已有着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的古老的经济活动，它们提供的大量奇异的、华贵的产品吸引着受美好的获利期望所驱使的商人们。

2

美洲的西海岸就其由野蛮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则提供不了什么，除了墨西哥和秘鲁的金银。在西班牙人的长期统治期间，连这些东西也为并非一个商业国家的西班牙所垄断。由于离英国极为遥远且没有多少可供贸易的东西，美洲的太平洋沿岸不能吸引英国的进取心。对这个国家的水手的主要的和为人推崇的诱惑是获利的希望，为了追求利润，他们在其所渗入的地区之内，在通向远方的航线之上一个接一个地建立和吞并据点。由于只有借助于绕过合恩角的漫长、危险的航行或更为艰辛的危险的横穿大陆才能抵达，北美的西部海岸是地球上最晚为白人所占据的中等富饶的

海岸中的一个。

当温哥华正在勘察普吉湾并作为第一人通过将英属美洲大陆与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岛屿分离开来的海峡时，美国业已在事实上和形式上都是一个国家了。事情变化的结果是，通过后来的东北太平洋地区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发展，英国又一次发觉它正掌握着一条线的两端，它不可避免地希望在这两端之间获得一些中继点。

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可解释为什么英国不应该获得它们，如不考虑另一个民族，实际上美国自己也有着超越一切的、更紧迫的、更关键的需要。在这些连接点中，夏威夷群岛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固有的商业价值，都不能掩盖它在海洋和军事控制方面的有利地位。

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一个海军据点的军事或战略意义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具备的力量和资源状况。在这三者中，第一个最为重要，因为它是天然决定的。而后两个方面无论有何欠缺，总是能够完全地或部分地得到后天的弥补。

比如说，修筑工事可消除一个据点的薄弱，如果大自然没有赋予该地区多少资源，凭借长远的眼光，可以事先进行囤积。要知道，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据点的地理位置则不是人力可以变动的。

举个例子来说，在评估一个可能成为战场所在的地区时，拿破仑一世首先考察最主要的自然特征，然后算度控制要点、它们相互间的距离、相对的位置，或者按照航海方面的术语，它们的“方位”，以及每一点能为战事提供什么具体的帮助是颇有教益的。这些做法能提供基本的方案和构想，从中可以清楚地估量决定性的要点。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要点的多少会依据有关地区的特点而变动：在一

个多山的、地形破碎的乡间，也许会有很多。在一块缺乏天然障碍的平原，可能就没有几个或根本没有，如不算人为的造化的话。如果只有很少一些，每一个的价值自然要比有着很多的情况下的要大。如果只有一个，衡量于受其单独影响的该地区的大小，它的重要性就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达到了极致。

至此，可以说，在观念上，靠近陆地的海洋和一大块不为什么阻碍所割断的平原是相同的。一位著名的法国战术家说过："在大海上不存在战场。"其意思是说大海上没有什么自然条件能支配并常常束缚将军们的行动方向。可是在平原上，不管它是如何平坦和地势单一，各种原因还是要使人们集中居住于一些城镇与村庄之中并使道路的出现基于各中心之间的必要联系。

这是因为，拥有了道路的交会之处也就拥有了支配力量，不过，其大小取决于汇集于此的道路的数量以及它们各自的价值。在海上也是如此。尽管就其自身而言，海洋对一只航船不构成什么阻碍，它可以沿着众多路线中的一条来跨越两点之间的地球表面，可是距离、便利程度、交通或风向方面的情况还是给它规定了某些常走的线路。如这些路线经过某个海洋中的据点，而后者进而又有使用价值，它就具备了对这些航线的影响力。在多条航线穿过的地方，这种影响力变得极大，足以统驭一切。

叙述至此，现在让我们把这些考虑用于夏威夷群岛身上了。对任何一位观察一幅显示了连同两岸在内的太平洋全景的人来说，两个显著的情形是一目了然的。他一眼即可发现位于一大片浩渤海洋之上的夏威夷群岛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它构成了一个其半径大致等同于从檀香山至旧金山的距离的大圆圈的中心。如果不是懒得将一个指南针放在地图上度量的话，可以发现，这个圆圈的圆周在西方和南方经过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

东北方向的美洲大陆延伸的一系列群岛的外缘。

在这个圆圈之内散布着一些荒芜、无足轻重的小岛，它们的存在看来只是为了强调大自然在跨越将夏威夷和南太平洋岛屿分离开来的间隔方面的失败。不过，可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岛屿，如范宁岛和圣诞岛，在近些年内已为英国所占有。从旧金山至檀香山有 2100 英里，轮船很容易跨越；这段距离几与檀香山至吉尔伯特、马绍尔、萨摩亚、社会和马克萨斯诸群岛的距离相同。除了美国对于其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影响的萨摩亚，其他群岛都处于欧洲人的控制之下。

于是，这样的情景吸引着战略家们，附带地同样还有商业家们的注意：

独享一个关键的据点，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也不存在对这个据点的替代物。在此之外，还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位置特殊的岛屿与对于穿越太平洋的较重要的商业航线的明显的关联性。不仅是对于那些已处于实际运用之中、颇具意义的航线，也对于那些肯定将从未来的情势中脱胎而出的航线，夏威夷的事态使我国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关注这种情势。

上述的圆周勾勒出了其间必然有着交通联系的一些中心点。此外，所有人都会从未来的发展中察觉到，不管如何地不清晰，一个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在的海洋航线并导致新航线的生成的崭新的、重要的中心即将出现。中美地峡运河究竟最终位于巴拿马还是尼加拉瓜对眼前的问题并不重要，尽管和考虑过这一点的多数美国人一样，我相信它必定会位于后者。

然而，不管会是哪一点，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众多船只集聚于此必然会导致一个跨洋的商业中心的产生。世界上的其他商业中心中，几乎没有什么比它还要优越。各国将垂涎欲滴地注视着连接这一中心的路线，它与由航线相连的太平洋地区其他中心之间的关系也必定会得到详细的考察。

此类对于商业航线及其与夏威夷群岛的关系的研究，连同先前的其他战略考虑，全面提供了决定该群岛能在商业和海洋控制方面具有多大价值的基本情况。

再一次参阅地图，可看到尽管从地峡通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通往南美洲的最短航线和夏威夷并不发生什么可能的联系，或者说不受来自于它的影响。但通往中国和日本的航线还是要或经由该群岛或从近旁伸过，从中美洲开往北美港口的船只自然处于美方海岸的影响范围之内。

以上这些情况以及当前的、得到承认的太平洋地区政治力量的分布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国际上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确切的势力范围的默认。英国、德国和荷兰业已在西南太平洋达成了某种默契以避免该地区各自要求之间的冲突。尽管上述相互承认在形式上是人为的，但它仍是建筑于完全客观的和无可争议的形势之上。

3

在濒临北太平洋东岸的各国或地区之中，美国的人口多得多、利益大得多、力量也强得多。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而且，夏威夷群岛和美国间的联系自然也会比其他任何国家间的联系更密切频繁和重要。尽管有着同样自然而然的愿望的英国及其殖民地不太走运——在一条未来的运河尚未修通的前提下，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至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笔直航线如前面说的那些航线一样要经过夏威夷群岛附近。

这条重要航线也靠近夏威夷的事实更加强和突出了该群岛的战略重要性。只是这并未改变上述的论断，即美国在夏威夷的利益超过了英国的利

益。这建立于一个天然的理由之上，那就是邻近，它一直被承认为一个国家发挥影响的一个合理的依据。对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期望和它依赖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商业和军事运输来说，美国横在它与南太平洋之间且是离夏威夷最近的国家无疑不是件幸运的事。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在一个对于美国在太平洋的作用如此至关重要的点上，美国六千五百万人的利益比之于加拿大六百万人的利益，当然应被赋予更大的重要性。

从上述考察可以推导出夏威夷群岛的重要。它作为一个据点，有力地影响着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就地理而言美国有着最充分的权利来发挥作用的北太平洋地区的商业上和军事上的支配状况。这就是夏威夷的主要优点，也就是说它能直接促进美国的商业安全和对海洋的控制。

我们再来看根据从反面观察而得来的好处。这就是获得夏威夷将防止了另外某个强国占有该群岛从而给我国造成不利和威胁的局面的出现。不过，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还未能得到太多的重视，那就是某个海上敌国在离从普吉湾至墨西哥的海岸线上的任何一点 2500 英里的范围之内拥有一个加煤站就会对美国造成的巨大不利。不过，可建立这么一个加煤站的地点只有一个。如果有许多的话，我们会发现难以让它们都不为他国所利用。如被拒之于可作为一加煤站所在的夏威夷群岛之外，敌人就只能到 3500 至 4000 英里之外的远处去求取燃料，来回就是 7000 至 8000 英里，这样的不便使持续性的海上行动几乎不可能。

当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煤矿对于此论断是一个限制。可是，一旦需要，美国至少可以希望从陆上一侧对其施以打击。对于针对着一条海岸的攻防如此重要的因素竟集聚于某一个地点上，这样的情形还很少见。这更使我美国必须要掌握住它，如果美国确实能做到的话。

对夏威夷的兼并不会仅是一项与全部的动机相脱离、孤立的、非理性

的行为，而是一项成果，是扩展至已为其所充溢的国土之外的必要性的象征。

所以说，美国国濒临大西洋、墨西哥湾和太平洋三大海岸的地理位置内在地要求美国经由地峡运河拓展那些日趋繁荣的公用海洋。毕竟陆上运输一直有所受限。何况，想用陆路取代大自然自己创造的通衢大道简直是徒劳。

所以，地峡运河对于美国的未来有着不可避免的作用。这种作用与针对运河政策其具体内容尚不能被准确预见的客观实施的结果密不可分。但是，因为现今还不能肯定地预知或可能是偶然或可能是必然的未来的具体行动，确定在时机来临时有助于指导行动的原则更为合理。

因此，美国应从已为历史证明的基本事实出发，这事实就是对海洋，尤其是沿着由各国的利益和商业勾画出的重要航线的控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主要物质因素。

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从其中可自然地得出这条以控制海洋为目标的原则：在的确能够做到的时候，一定要把有助于对海洋的牢固控制的海上要点拿在自己的手中。夏威夷的当前事态就体现了这个原则的运用。

但是，从军事观点看，还得注意一件事：

世界还没有到了不需要这么做的地步。不管陆地或海洋上的军事据点和堡垒如何坚固或位置优越，它们自身并不能提供什么控制力。人们经常讲某某岛屿或港口能控制某某一片水域，这是一个十足的、可叹的、危险的错误。在考虑到还需要充分的保障、足够的海军力量这些不言自明的条件的情形下，这样的言词才可以只被大致地使用。

可是，政府对于自己海军力量的迷信和对于自己港口防御以及舰队的需要满足程度的漠不关心使人们有理由担心某些推进行动的后果。就连有

第十一章
地峡和海权

地峡地区的位置和形态的固有特点决定了它不能脱离世界其他地区而存在。随着因运河问题而来的变化的发生，美国也会被卷入国际大家庭的事务之中并将承受相应的负担。

如果美国认定其利益和尊严所要求的权利乃是建立在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而不是以其他什么国家的意愿为依据。那么，美国就有必要促使自己清醒认识到，跨洋交通的自由取决于对作为所有通向地峡的道路都必经的加勒比海的控制权。

1

在400多年的时间中，人们的心中一直包含着一个重大的观念。尽管就其存在的广泛性和兆示性而言，它只是那些具有指明某种必然使命的根本性观念中的一个，但它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思想中却最早地迅速化为了活生生的东西。

这是因为，在透过其时代贫乏而又欠准确的知识所模糊地看到的视野中，哥伦布勾拟出了一个借助于海洋的、紧密而方便的联络线，一条国家间的巨大纽带。这条纽带以两个古老而又不同的文明为端点：

（1）以地中海为中心。这是欧洲的商业、精华和文化的源泉。

（2）以遥远的东方海岸为中心。

实际上，有关哥伦布的实际业绩的故事各位读者已知道得足够多了，在此不需重复。不过，需说明的是，尽管在他首次返航所带来的短暂的胜利者的光荣之后，紧随而来的是笼罩着其后半生的大量失望和屈辱。但哥伦布并没有痛苦地认识到与此相关的问题在当时是无法解决的。

具体来说，一块由野蛮人和半野蛮人所居住的荒芜之地加入到了已知

哥伦布肖像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约 1451—1506），欧洲著名的航海家，是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者。生于意大利热那亚，死于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哥伦布年轻时就是“地圆说”的信奉者，他十分推崇曾在热那亚坐过监狱的马可·波罗，立志要做一个航海家。先后4次出海远航发现了美洲大陆，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航路，促进了旧大陆与新大陆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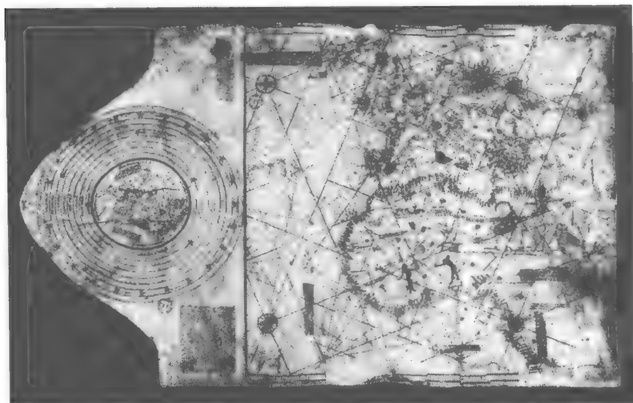


的世界中来的事实，并没有怎么使哥伦布从对于惠及他人的荣耀及长期吸引着他的黄金之梦中醒来。他所发现的西方的土地，实际上成为了航船朝着他希冀已久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障碍。像亚洲的众多山脊和剧烈起伏的地势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一样，不过所幸这一切并未进入他的眼界。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哥伦布直至生命的最后都希望通过到达难以发现的“秘密的海峡”，因其迟迟不露面而对他极具吸引力。也正是出于这种动因，才使得哥伦布一直保持着充满生机的希望和思维上的活跃。假如他知道了真正的事实，或许这些也就衰减下去了。

在哥伦布的最后一次航行中，这个伟大的冒险家抵近了美洲大陆，沿着它的海岸进行考察。海峡的真实秘密就隐藏在这个地带。

1502年秋天，在经历了多次尝试和厄运之后，贴着古巴的南岸而行的哥伦布到达了洪都拉斯的北部海岸。除了哥伦布本人的无以解释的信念，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着一个方向，而不是换一个方向航行。不过，经过一些思考，哥伦布相信他要寻找的海峡位于南方而不是北方。于是他转而东进，虽然这是逆风。在与风向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抗争之



哥伦布航海图

哥伦布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航路。先后到达巴哈马群岛、古巴、海地、多米尼加、特立尼达等岛。在帕里亚湾南岸首次登上美洲大陆。

后，他折回了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他发现海岸的走势终于可以让他沿着他希望的航向顺风前进。

在接下来的2个月中，哥伦布考察了远至波托韦洛的海岸，他发现并探测了陆上的几个迄今一直有着历史重要性的入口圣胡安河河口和奇里基泻湖。

另外，哥伦布还从波托韦洛向东走了一点点，到达了一个当时西班牙人已经知晓、有人从特里尼达去过那儿的地点。

因此，这位探索者确切地认为，从上述地点至尤卡坦的坚实的海岸没有断点，正是这条海岸挡住了他通往亚洲的道路。

这样，在哥伦布于1504年去世前不久，他已访察了那片土地上每一处可能存在着跨洋水道的地点。直至10年之后，当巴尔博亚依照当地人的叙述，得到了成为第一个看到南海（这在长时间里模糊地指太平洋）的欧洲人的荣誉时，人们才知道那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如何之窄。然而，地貌赋予的穿透它的显著便利又是如何地诱人。

2

在早期，也就是我们今天叫做中美洲的地区。这些地区充满着形形色色的西班牙首领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争斗。对此，有所企图的西班牙本国政府不是制止反而是火上加油。不过，另一方面，历史也展示了不间断的冒险的探索，是激发上述内部争端的躁动的原因之一。

在 1522 年 1 月，吉尔·冈萨雷斯带领着一些弱不禁风的三桅帆船从巴拿马出发，沿太平洋海岸北行。3 月，他发现了尼加拉瓜湖，其名称来自于住在该湖岸边的一位叫尼加拉瓜或尼加劳的酋长。5 年之后，另一位冒险家乘船去探察海岸余下的未知部分，他来到了尼加拉瓜湖并环行一圈，发现其出口就是圣胡安河。这时离哥伦布到达这条河的入海口才四分之一世纪。

至此，对秘鲁的征服、在中美洲以及沿太平洋海岸的西班牙控制地域和定居点的逐步增加使地峡很快具有了一种重要性。由此，我们能够明显地体味到美国获得加利福尼亚，以及沿着太平洋海岸进行扩展对于地峡的政治意义和作用。当时，绕过合恩角的航道漫长和充满艰辛促使人们希望获得一些更短、更少险阻的路线。尽管陆上运输有着装货、卸货方面的麻烦，但在蒸汽时代到来之前，它还是一个相对较好的替代办法。就连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这样。

于是，地峡及其邻近地区在当时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许多航线在这里分合，东方和西方在这里相交流。有时十分友好，但常见的则是对抗与冲突。这样，哥伦布的想法只是部分地、很不彻底地得以实现。

经过了诸多的波折起伏后，这种构想依旧处于只被部分地、不彻底地实现的状态，尽管后来的岁月已将其大大地拓展。海峡之谜仍是问题的关键和人们的怨艾所在。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上述商业中心的所在地一直是吸引着人们的普遍兴趣的焦点。至少对于那些无论是否直接地介入商业活动之中，但均与贸易变迁所导致的影响广泛的利弊有着利害关系的民族来说是如此。

不过，富有进取心的商业国家不会仅仅消极地接受那些不利的影响。那些造就了它们的特性，使它们必然期望把那些关键地区置于控制之下。掌握了它们，就像掌握了军事上的要点，可以对贸易路线、进而对不仅关系到单纯的生存，而且关系到财富和繁荣的增长。

至此，完全可以顺理成章的说，自从中美洲地峡被看成东西方间的交往之流的天然中心之时起，其历史就是围绕着控制权进行角逐的历史。自然条件清楚地显示这个地区位于上述交流最少受阻碍的方向上。而且，从较早的时候直至最近，该地区的一般特点中所固有的因素与偶然随机的因素的汇聚更突出和加强了这块两大海洋之间的屏障，同时也凸显了其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之上的重要性。

3

在几个世纪中，围绕着加勒比海并拱卫着朝向地峡的外部通道的西印度群岛，曾一直是欧洲的文明国家必不可少的热带产品的最大的、唯一的来源。在英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期间，英国正是以对西印度群岛和地峡两边的大陆地区的控制为其商业找到了主要的支撑。单是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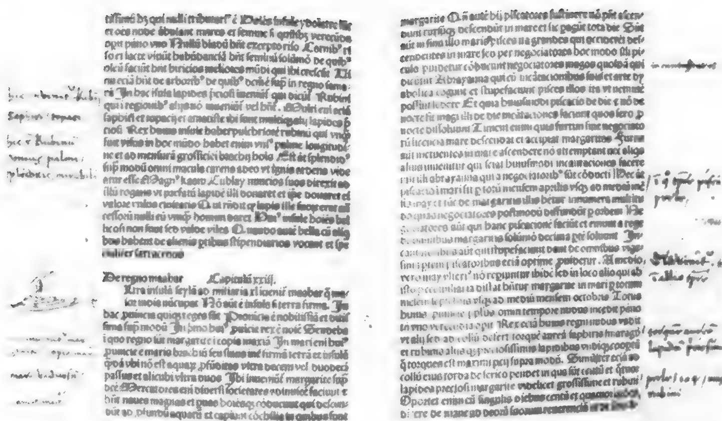
商业和战略重要性。两个世纪以前的一位雇佣军首领曾说道："格林纳达的腐化而尽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人们知道有着尼加拉瓜湖以及依赖于它的北方和南方海域之间的航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围绕着主宰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列颠群岛上的人民的日益加强的支配地位。在他们身上，商业开拓精神和政治特性如此美妙地糅合到了一起。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的扩展得益于当时的没有什么法则可言的状态，由此使得一个国家能够放开手脚地发挥固有的才华。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或者说这样一个这样的时期：秩序脱胎于纷乱。当然，这样的时期不仅仅是在早期的没有什么法度的岁月里，每当国家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危机时，每当古老的传统、公认的信条或成文的规定部分地或完全地沦为失效时，每当一个民族认识到先辈的政治头脑对自身的扩张所设定的限度不再适用于自身及世界的变化的时刻已经到来时，它会再次出现。想想这些，都让人觉得野蛮又残酷。

关于这一点，英国就是最好的证明。英国经历了其历史上的扩张阶段，投入了随一个新世界的发现而来的国家间的斗争中，并从一个极不起眼的国家，借助于海洋，成为了欧洲的商业构架，并一直雄霸很长的时间。英国的海员和殖民者遍布于每一片海洋和每一个地区。不过，在那些能赋予英国以物质财富的地区，虽然英国人的政治上的才能与传统使他们能够建立自治的殖民地。而在英国国内生活中，广泛的自由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已由这个国家几个世纪的稳步成长及其旺盛活力的真切表露而充分证明。

可是，不管如何，自然的法则就长远来看不可违逆，毕竟没有什么软弱的缩手缩脚能妨碍英国获得极大的权力。单凭此点，英国便能够履行它



哥伦布在《马可波罗游记》书上做的标注

《马可波罗游记》13世纪末问世后，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书，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此书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欧洲人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哥伦布少年时期非常喜欢《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让他对探索航海产生了浓厚兴趣，可以说是他航海意识的启蒙。在西班牙的哥伦布纪念馆中，一本名为《马可波罗游记》书上有许多哥伦布本人的眉批，此图就是哥伦布在书中做的标注之一。

但是，按照估计，如此行事只会重复这位伟大君王所犯的致命错误。这个错误使法国永远失去了对国家的最稳固的繁荣的来源——海洋的控制。如果英国犯了这样的错误，对这个岛国的危害远将比其大陆对手受到的危害要大。对此，哈拉姆看得较清楚，他说道：“当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宣战并袭击它的西印度属地时，他的确没有多少正当的借口。不过，如我所想的，这其中也根本没有什么使他受到指摘的失策之处。他吉星高照，以至于远征的失败恰恰使英国获得了一个比它以前的国王的任何胜利所都更能带来好处的属地。”在笔者看来，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克伦威尔的星宿是位于合理的位置上来寻求好运——在海边，而不是陆地。

潮加剧了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必要性。

由于美国濒临两大洋的地理状况，这对于它有着绝对的利害关系。但是，尽管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压倒性的利益，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完全全地只与美国相关，其他国家对此也有着巨大的、重要的利益关系，虽然不是那么关键。不过，只要商业和政治之间还有着逻辑上的差别，可以说美国在上述问题上的利益既是商业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其他国家的利益几乎纯粹是商业性的。

由于英国作为一个海运大国和每一条用于商业的新航路的开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天然利益联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带着戒心审察每一个要求改变现有安排的意见。在问题只能诉诸最后的解决时，英国知道要动用力量来支持自己的立场。

不过，尽管就构成其国民福祉之根本的英国殖民地的性质和英国权力的特征而言，可能出现的跨洋运河明显地对于英国有着较大的实际利害关系。英国背地里还是认识到了所有关于地峡交通的问题对于英国的进步、安全和荣誉的影响比对它们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紧要。

英国明显已经有了这样的体会。运河的建成开通的形势将赋予其以优越的利益，只要这方面的变化完全是商业上的，那它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对英国不利。因为其结果将是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和英国相竞争的那个制造业和商业国家的前沿的许多地点更近。

在这里，大致说一下。读者面前没有地图也能容易地理解这些，目前利物浦和纽约离从瓦尔帕莱索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美洲西海岸上的所有地点的水路距离是相等的。这是因为这个事实：

从这两个港口出发绕行麦哲伦海峡的船只都必须经过位于巴西东海岸上、从每个港口到此距离几乎相等的三角。假如有尼加拉瓜运河，从纽约

出发的船只经过这条运河，而从利物浦出发的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从这两个城市至太平洋，大致经过横滨、上海、香港和墨尔本或沿着日本、中国和东澳大利亚海岸的航线将长度相等。

简而言之，不再是太平洋东岸，而是其西岸离利物浦和纽约的航行距离相同。而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以东海洋上的各点，比如说夏威夷群岛，将离纽约比离利物浦更近。

一位当代的英国撰稿人估计，基于这些情形之上的竞争将对不列颠群岛现今贸易活动的大约八分之一产生消极的影响。不过，尽管这种局面会引起英国的关注，就商业上的繁荣或艰辛对一个国家当代历史的影响而言，它只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它并不会严重地关系到那些决定着英帝国的完整或安全的首要问题，因为构成这些问题的主要是组成部分都位于那些以苏伊士运河为相互间联系纽带和最短的交通线必经之处的地区。在英国的属地中，位于东太平洋地区的属地是最少和最不重要的。而地峡运河只可能对东太平洋地区产生影响。

所以，地峡运河造成的主要的政治结果将是使太平洋海岸离大西洋海岸变得更近，并且更容易为欧洲的主要海军力量所抵达。

所以，尽管畅通无阻的水路运输能带来商业好处。但从军事观点看，运河也是一个会给美国带来相当弱点的因素。除了对于那些坚信人类本性的完善会使战争作为一种不可想象的事情而遭摒弃的乐观主义者，这些考虑必然会引致对于美国将采取的政策的严肃思考。

这些观念应得到普遍的恪守以至于不会因政府的简单更换或公众意愿的无常变化而被搁置一边。有助于澄清和明确公众对于非常重要的事务的意见的合理讨论永远都不能是有欠全面的。

从门罗主义还仅仅停留于形式与头脑之中的时代到 19 世纪中叶，有关

问题具体的和多少有着现实性的体现是跨地峡的航路针对于外来干涉的安全。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尝试，于是在 1850 年 4 月 19 日，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被订立了。那时，英国正掌握着一些大陆上的据点和一些外围岛屿。这些地盘不仅有利于军事上的控制，也有利于进行政治干涉。英国获得它们是依赖于对牙买加的占有。

由此可证明克伦威尔的预想是合理的。在这些地盘中，濒临洪都拉斯湾、紧邻尤卡坦的南界，由一条 200 英里长的海滨地带构成的伯利兹离地峡是如此之远，从而不可能和运河问题发生什么关联，以至于美国的谈判者在当时愿意不把英国对它的占有当成一个问题所在。对于英国在那里的权利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伯利兹由英国劫掠者首先占领，他们在牙买加落入英国手中之后几年进入了这一地区并且不再撤出。他们在那里砍伐原木，并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地盘，没让西班牙驱逐他们的努力得逞。

后来，他们的占领权和砍伐树木的权利为条约所承认。在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签订之后，通过 1859 年危地马拉缔结的一个协定，英国在伯利兹的“居民点”就成为了它的一块“保有地”。

再往后，在 1862 年，经过皇室的批准，这个昔日的“居民点”和最近的“保有地”成为了受牙买加当局管辖的一块正式的殖民地。在存在有危地马拉这个中美洲国家的情形下，这构成了中美洲的英国领地的显著扩展，而这是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规定不符的。

英国更重要的一个要求是指向莫斯基托海岸保护地。据英国人了解，该地带从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向南延伸至圣胡安河。就其根据而言，英国要求的权利没有怎么超出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达成的许多类似的交易的范围。

在 1687 年，也就是英国获得牙买加岛 20 年之后，住在上述地区的原

始人的一位首领被带到了牙买加。他接受了一些廉价的小礼物，然后同意了英国对当地的保护。在西班牙对该地区的控制延续期间，这两国之间不时有一些争吵和战斗。当后来问题被提至了英国和美国之间时，后者拒绝承认英国所谓的保护。在它看来，该保护权是建立在和当时西班牙的优先权相抵触的不充分的法律基础之上的。前者的权利在尼加拉瓜取得了独立之后应被认为转给了尼加拉瓜。

由于莫斯基托海岸离未来的运河极近，因此它的归属绝对不会被视作鸡毛蒜皮的小事。针对着海湾群岛、努阿坦群岛美国也应具有类似的考虑。它们分布于洪都拉斯湾的南翼，靠近洪都拉斯共和国海岸。一旦有着强大的海军力量的控制，伯利兹和莫斯基托海岸之间可以凭借它们取得联络。当时，美国主张这些正由英国占据的岛屿完全属于洪都拉斯。

面对着实际的英国占领状况，当时迫切想使争议地区转让给说西班牙语的各美洲共和国的美国谈判者看来对于有关议题对未来的影响注意甚少。在那时，人们的思想和今天一样，尽管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有用的经历，受那种憎恶对外领土兼并的共和国创建者确立的传统信念的支配。

结果，在考虑英国从莫斯基托海岸和海湾群岛这些并无权利而且实际上只给其制造了争端的地区退出时，无条件地承担了不在中美洲谋取领土，并为拟议中的运河及任何其他可能被修建的运河的中立提供保证的义务。一个特殊的条款也被列入了条约之中。这个第八款清晰地声明，两国政府的愿望不是“实现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建立一个普遍原则”。

再后来的情形是，将海湾群岛和莫斯基托海岸归还给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事宜受到了很大的耽搁。与之相伴的是美国与英国之间冗长的讨论和严重的误解。后者扣住条约的字眼，声称它只是不被允许在条约订立之后再在中美洲获得领土。而美国政府强调并一贯地向其代表说明：美国的

理解是协定确定了对任何现在和将来的占有局面的放弃。

如果看了条约的第一款，不能不叫人感到，虽然实践可能不是那么讲究情理，但条约的措辞既可以支持英国的立场，也可以为美国谈判者纯真的信心提供根据。这个印象是有趣的，主要是因为它显示了一方从除道义之外的任何方面看，它的主张都相对缺乏力度的迫切。另一方实际的占有和海军力量赋予了它在讨价还价方面的明显优势的谨慎。不过，到了1860年，上述地区还是被归还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在这以后仍然是一项规定着在地峡问题上美国和英国间的关系的国际协定。

不过条约的存在对英国的利益有好处。只要美国还不无所虑地反对任何对地峡地区的外部干涉，英国凭借它的海上地位，再加上其无处不在的资本，英国仍将长期地把握对于任何可能的事态的绝对控制力。

但连续几届英国政府却保持中立。这样一来就让其他强国有了大展身手的时机。

6

我们来看美国在上述问题的态度。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国家政策就是公众的意志。公众意志和一般的流行观念极为不同，它所导致的是一种与那种不时得到冲动表达的脆弱情绪不同的豪情壮志。就其被广泛理解和认同的意义而言，门罗主义是一种十分含糊不清的流行观念。在地峡问题上，它几乎沦落到了黯然无光的地步。

对于那些关注着地峡的人来说，站在哥伦布这位伟大发现者的希冀中望去，地峡那儿寄托着一个时代的征兆：在这个时代中，令哥伦布魂牵梦

绕的海峡的展现将把东西方拉入更紧密的联系之中。不过，时间已经引入了另一个哥伦布未曾想到的、和海峡相关的因素，一个位于他所知道的西方和他所寻找的东方之间的伟大国家，它伸展于他无意识地发现的大陆之上，东西方在此相聚合。对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对海峡的控制对它来说即使不是生存的需要，至少也是充分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的国家。有谁能否认它无权对于一个对其至关重要的地区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谁也不能否认，除了它自己的人民。可是它的人民就这样做了。也许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为此不要忘记这点：在一个有利的时刻，无所作为与采取最有力的积极行动相比，虽然不是那么合理，但也是有着同样实际的影响的行为。

这是因为，一贯且协调得当的行动取决于坚定的信念。而合理的、健全的、始终如一的国家政策之中的信念必定来源于参照过去经验的对于当前形势的细致思考。在这里，对于历史教训的真实意义和将其应用于现实的方式，一开始无疑会出现相当的意见分歧。不过对于这些不同不必觉得遗憾，它们的出现表明了所引起的关注。一旦讨论变得广泛和充满活力，是可以期望看到一种健康的、与现实相合拍的公众情绪的逐渐形成。

反而，令人反感和担忧的是懒洋洋地随波逐流，对于正在走近的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任意地置之不理，对于摆脱在时机来临之时可能存在的那些束缚，如果在宪法或传统偏见中有这些东西的话，比如说漫不经心、磨磨蹭蹭，那问题可能会朝坏的方向转化。

举个例子来说，不管尚未解决的夏威夷问题包含着什么具体的东西，几乎不能否认关于它的讨论显示了那些障碍因素的存在，即将这样的情形仅仅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对于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下定决心的时刻已经到来的警示。有两种意见并不是坏事，极为糟糕的是长时间

地游移于其间。

在笔者看来，地峡地区的位置和形态的固有特点还是决定了它不能脱离世界其他地区而存在。因而只能在外部环境的变化随时机成熟而发生时才变得具体。如今，这种变化的迹象一眼可见，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美国土地上人口的迅速增长至少使人注意到了两点：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发展增强了太平洋对于整个世界，尤其是美国自己的商业和政治重要性。另一方面，美国的创造力及其在三个方向上向海洋的抵及促使它必然要寻求朝向其他地区的出口和道路。在这种可能没有完全到来但显然正在到来的形势下，一条人工水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是不用强调的。它将使美国的大西洋海岸有能力在平等的、涉及到距离的条件下，针对着东亚的市场与欧洲展开竞争，将使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航路缩短三分之二，至瓦尔帕莱索的航路缩短一半。

从这些情况下可以察觉到，运河肯定会被开辟。不过，一旦修成，运河不会只对美国自己有利，虽然主要是对美国有好处。许多原因加在一起会使欧洲和东方的贸易继续依托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但对于美国的太平洋海岸地区来说，地峡运河将为它的一类占相当分量的贸易提供一条短得多、便利得多的通道。

在此的另一项重要的考虑是和一场将危及英国对苏伊士运河使用的战争对英国海运的影响相关的。英国的许多政治家和海员经过思考，十分怀疑英国有能力控制从直布罗陀至红海的漫长航道，他们赞同在战时依赖经过好望角的航线。不过，经由尼加拉瓜前往许多东方港口的航线将比经由好望角的更短。而且，比起通过地中海，在较近处经过欧洲一些国家港口的航线，加勒比海的航线在防范遥远的欧洲国家的攻击方面要容易得多。

目前，加勒比海中的要点由外部强国所占据。不管如何想要得到，美

国不可以以不公正的手段来获取这种地盘。不过，一旦公众舆论确信美国需要它们，而且不应在它们朝我们迎面而来时极其天真地避开，美国就能取得显著的进展。如果宪法确实造成了一些困难，宪法也为人民提供了一条消除这些阻碍的途径。不过，可能会有人反对对宪法的这种认识。就其所受的各种制约而言，宪法是自由性质的，但与此同时它也牢牢地设置了一些由简单的头脑所炮制的枷锁。

同时，没有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能禁止美国发展海军，使它足以承担可能需要它去干的工作。对此，大众的观点是只需要一支跛脚的力量，而这限制了我们应付某种并不完美的形势的各种需要的潜力。

另外，如果我们认识到美国有三条海岸，其中一条与另两条的水路联络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取决于一个离美国最近的港湾密西西比河口几百英里远的战略地点，那么，我们将看到“防御”这个词可应用于远离美国海岸的地点。

随着因运河问题而来的变化的发生，美国也会被卷入国际大家庭的事务之中并将承受相应的负担。所幸的是，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是一个海外强国，从而能够从那些海洋是其哺育母亲的国家的历史中找到上佳的借鉴之处。

第十二章

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

战争的结果取决于凭借机动力量对一处要点的运用，就如一只棋子的效力取决于它的自身价值与相对位置。

就位置、力量和资源上的优劣而言，古巴相比于牙买加明显地、绝对地处于上风。要使牙买加和古巴平起平坐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需要使向风海峡一直开放。

而牙买加岛对于由古巴、海地和波多黎各组成的大阻隔带是这么一种关系：它是一块天然的起跳石，借助于它，美国就可以从其入口到地峡。

1

古巴和牙买加这两个被视为要点的岛屿，对于控制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最具实质性意义。就位置、力量和资源上的优劣而言，古巴又明显地绝对地处于上风。

在地球表面某些部分的绝对和相对的重要性随着它们对于人们的利益关系而不时地变化着。

在这些文明的衰落与我们当今时代曙光的来临之间的争斗不断的动荡岁月中，地中海地区由于古老传统与文化在此的集聚，依然保持着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尽管它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在阿尔卑斯山之外，以及大西洋和北冰洋海岸逐渐形成的、更年轻、更有生气和更有战斗精神的国家的挑战并最终丧失。

直至中世纪的结束，地中海一直是东方和西方保持商业联系的纽带所在。因为从利凡特向东去开展贸易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陆上行程，越过高山和沙漠荒原，而地中海提供了唯一的水路联络，因此，好望角通道的发现使地中海丧失了这一优势。

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性。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这种重要性不仅关系到和它们相邻的国家，也和整个世界相关。因为，这两者都是由陆地围绕的海域，都是东西方间交通链条上的环节，而且链条在此为地峡所分断。而且，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都集中地体现出了影响到海权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长处和缺点。这个结论对地中海来说明显是正确的，它的历史已表明了这点。这对加勒比海来说更是合理不过，这既是因为它不像多半岛的地中海，其海岸的外形使陆地上的力量不能那么远地、那么强有力地楔入海洋。也是因为鉴于前面提到的历史情形、最早的殖民者的特点和这片土地为文明人所居住的时间的不长。

3

其实，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地区（不包括美国）根本不存在某个能和欧洲的那些倚重于陆军远胜于海军的大陆强国相比拟的陆上强国。只要那种和政治家们的谨慎考虑明显不同的国民感情倾向能被辨清，那么不难看到，在今天的地中海，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海上强国正与德国、奥地利、俄国这些陆上强国对峙，而后者居于主动。这种情形在不久的将来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加勒比海。如前面一篇文章所肯定的，加勒比海主要是海上强国的领地。

为了能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或许应要求读者将此铭记在心：

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虽然像那对暹罗孪生子那样连在一起，但仍是不同的地理单元。实际上，墨西哥湾也叫做加勒比海。墨西哥湾的范围由北

起佛罗里达半岛，南至尤卡坦半岛的投影线所清晰界定。

在这两点之间，200 英里的距离由古巴岛所嵌入，它在一边留下了一条指向大西洋的大约 100 英里宽的通道佛罗里达海峡。在另一侧则是通向加勒比海的、稍宽的尤卡坦海峡。作为一项重要的军事考虑在此值得一提的是：

从密西西比河口往西至卡托切角，尤卡坦半岛的顶点，不存在任何能被认为完全符合大型战舰需要的港口，在眼下正被讨论的这一地区的其他部分屡见不鲜的这样的港湾在这一条长长的海岸上是找不到的。这是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中的一个有着军事上的重要性的因素。

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这两片水域中的每一处，都存在着一个有着突出的商业意义的地点。在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河口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经由水路的进口和出口货物的会合之所。不管这些货物来于何方或去往何地，它们就像到了一个大十字路口那样汇聚于此，或者说就像一个帝国的通途大道在大都市相交会一样。

无论密西西比河及其众多漫长的附属河道作为遥远的内陆和世界海洋通途之间的便利的交通媒介对于美国有什么价值，所有进出密西西比河的货物都得集聚于这条河的河口。那些小的然而重要的墨西哥湾沿岸城市，比如莫比尔、加尔维斯顿或者是墨西哥的港市的存在没有降低密西西比河口的重要性，反使其在相比之下更显突出。这些城市通过佛罗里达海峡或尤卡坦海峡同样地与外部世界相联系。

同样地，在加勒比海，众多重要港口的存在和对于生长于本地区的热带产品的繁忙运输，使那个叫做地峡的地点的重要性更加引人注目。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也还是道路的交会。这种情形不论是天然的，还是简单的人为倾向所导致的，都决定着一个地点的商业和战略意义的首要因素。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尽管存在着陆上运输和货物转运这些不足，自首批探险者的时代起，在其后的多个世纪中，地峡一直是东西方交通线上的重要环节，虽然重要程度依时而变化。而且，一旦地峡为一条运河所贯穿，它将造就一个可与密西西比河口相比的海上中心。不过这两者也会有不同。就后者而言，那些在一侧相汇集的水道位于一个大国之内，载运的是这个国家的财富；而在地峡，在其两侧会合的道路完全位于为所有国家共同拥有的海洋之上。

所以，对地峡的控制或取决于对地峡本身的控制，或间接地取决于对通向它的道路的控制，或取决于拥有一支实力超群的海军。在海洋事务中，后者一向是支配性的因素，完全就像在陆地上机动的陆军必定会决定堡垒的得失一样。

这样，美国就有了两个关于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军事探讨的中心。这两片水域合在一起，控制或影响着一侧通往这两个有着商业上的价值，因而也就有着政治上和军事上意义的中心的道路。在这里，另外一侧的道路，即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内陆航线和交汇于地峡的太平洋一侧的海上航线，和美国并无多少关系。

4

道路在军事学上叫做“交通线”。交通线也许是战略、军事或海洋方面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从字面上讲，它们是最具根本性的，因为所有的军事行动都离不开交通线，就像一株植物的果实离不开和根之间的联系一样。

因此，可以在地图将上述两个中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通线路画出来。这些线路体现了这些中心和外部之间的相互依赖，凭借着它们，两者相辅相成。一旦它们被截断，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墨西哥湾或加勒比海中所有地点军事价值的大小有无正取决于它们对于这些交通线的潜在影响。

对此不可能预先给予或伴之以一番从海军战略的技术角度进行的探讨。如果需用这方面的解释，那么它的使用应是替代性的、随机的和严格的。所以，这里只想简要提一下的是，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以下要素：

（1）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

（2）力量，固有的或后天的。

（3）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

尽管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力量和资源可以被人为地供应或增加，但移动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港口却不是人力可胜任的。若将直布罗陀搁在大洋中间，那它的力量也许会四倍于今天，但在军事上它将一无所用。

基于这些考虑，在仔细研究了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各个港口和海岸固有的优点之后，在地图上用黑色方块显示的一些地点被选择了出来。这当然不是说其他地方就不具备各种长处，或者说所考察的这个地区的各种战略就已一无所漏地体现在了这些地点上。在特定状况下，它们的价值大小程度受具体的环境制约，而且还必须予政治状况以一定的注意，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使一些地点中立化。一些地点之所以未被考察是因为它们和离它们非常接近、处于实际上能将它们纳入自己影响之下的强有力地

位的其他地点相比黯然失色。

另外，战略上的常识是：被动的地点、需受保护的地方不管如何具有力量，即使是军事行动不可缺少的支持所在，也不应占得太多。这样做会浪费力量。类似地，在对某个海上行动的场所的研究中，有关的地点对于全局相对的和整体性的影响，其考察的目标的数目应该通过一个逐渐消减的过程，最后再确定那些至关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地点。

在美国，从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中可选一地作为建立海军基地的位置，一个被专门建立的小组最近作出的决定主张选用后者。这两地合在一起能很好地满足海洋战略和陆上战略的需要。以国家的海岸边界为基地的行动不应只依赖于某一单独的地点。虽然和所希望的理想状态相比，这两地过于接近以至于一个敌国用不着分散力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它们进行监视。不过，诺福克和纽约就不是这样。但是，考虑到重型舰只的吃水深度，它们仍是那条海岸上美国所能选择的最佳地点。

另外，基韦斯特，一个位于佛罗里达半岛顶端之外的岛屿，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佛罗里达海峡中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优良的和可防守的锚地。合理地控制它对于战时美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之间的交通联络必不可少。当战争在加勒比地区发生的情况下，依照现在的情形，基韦斯特就是需要掌握的最远点。如果这里有着足够的防御工事，美国的舰队就可以以其为依托；而该岛若被如此使用，它就将把敌人的力量从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有效地引开。

然而，它永不可能成为彭萨科技和新奥尔良所能成为的那种主要行动基地，因为它只是一个岛，而且没有资源，甚至淡水也没有。不过它还是可以被加以改造从而十分有效地为一支舰队提供日常的需要，如煤、弹药等等。

在基韦斯特以西60英里处还有着一座位于德赖托图加斯岛上的古老堡垒。它能够被作为基韦斯特的一个有用的补充，只是在目前它几乎还不能被考虑。基韦斯特距密西西比河口550英里远，距地峡1200英里。

在地图上圣卢西亚岛和马丁尼克之所以被挑了出来，是因为它们分别是英国和法国在所讨论的这片广泛区域外围上的主要据点。如果英国在这一区域还需要一个供辅助之用的据点，那它就会在安提瓜了。这个岛对圣卢西亚的作用就像彭萨科拉对密西西比河口的作用。同样地，法属瓜德罗普岛对马丁尼克岛也具有意义。这些地点的固有的重要性在于这个事实：它们是英法两国所占有的岛屿中离母国最近的，而且在它们与母国之间不存在任何不得不从其旁通过的危险点。

但是，它们也有其缺点：它们都是很小的岛屿，因而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易于被全面封锁。这样，它们在战争中的用处在本质上仍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而彭萨科拉或新奥尔良却均不是这样，它们有大陆为其后盾。

正是在这个方面，西班牙所属的古巴岛展示了它的卓越的自身优点，英属牙买加也是如此，但比于前者还是逊色不少。古巴岛虽然全岛呈狭窄状，但从圣安东尼奥角至迈西角的长度超过了600英里。

简而言之，古巴岛比其他的岛屿更像一块大陆，而且在有着适当的发展的背景下，包含着可以使其自给自足的丰富资源。古巴岛的面积是爱尔兰的一半，但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它的长度超过了爱尔兰的两倍。

所以，古巴岛的海岸线是极长的。在军事上衡量，它的许多天然港口可集中为三大块，其代表是西边的哈瓦那、东边的圣地亚哥和靠近南部海岸中间的西恩富戈斯，其中任何两个港口之间最短的水路距离是从西恩富戈斯至圣地亚哥的335英里。走水路从西恩富戈斯至哈瓦那要跋涉450英

如它以前常做的那样。在古巴的西班牙人具有的一个有利之处是，他们和美国尤其是墨西哥湾港口间的交通线将处于较好的保护之下。

不过这不是说沿这些路线开往古巴的船只将不会遭到袭击，平平安安。没有什么交通线能海洋上的或陆地上的都能免受攻击。我的意思是，相比于攻击这些交通线，保护它们更为省力。相比于防御方，进攻方必须积极得多，必须采取多得多的行动，因为它更为远离基地。

故而，攻击的成效还取决于英国能从其他战场抽出多少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位置上的优势不会只仅仅起到弥补在当地的力量上的小小劣势的作用。拿破仑曾说：“战争就是关于要点的事情。”这位闪电般的快速运动方面的大师肯定是指战争就是获取要点并守住它。

[illegible] 所以，尽管在力量和位置这两个因素的组合中，力量在本质上更具价值，但位置上的巨大优势使力量上的较小劣势变得不必忧虑永远是可能的，一加五可能比二加三要大。古巴岛的位置价值就是极大的。

如果将其完全看成一个海上要点而不考虑以其为基地的力量，牙买加岛对于战争胜负的作用远逊于古巴岛，虽然在牙买加岛上的金斯敦有着优良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只是对于地峡以及与此相关的加勒比海当地的问题，牙买加岛才具备着某种优越性，稍后要涉及这个方面。首先应做的还是完成对用方块标出的地点的介绍，这对于解释为什么要挑出它们是必要的。

在这些地点中，在地峡地区的三处彼此靠得很近。根据前面采取的规则，它们本应被适当删减至仅余一个有代表性的地点。但是，由于这些地点如此挨近地峡这个加勒比地区巨大的利益中心，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又由

6

荷兰拥有的库拉索岛也被做了标记，这主要是因为它的自然特点使人不能不考虑它。库拉索岛有着一个良好的、可以被改造得难以攻克的港口。另外，它天然地靠近任何开往地峡和经由牙买加岛东侧的船只所要走的航线。这些情形构成了库拉索岛在军事上的无可否认的重要性。

但是，荷兰是一个小国，不可能再次参与一次全面的战争。实际上，正在泛起的一种担忧是，正谋求殖民扩张的德意志帝国可能会因为荷兰依然占有大片殖民地而企图吞并它。这也许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和普遍相信是由德意志帝国的支配性影响导致的欧洲棋盘上近来的神秘举动相比又不能说完全让人难以理解。对于这些举动，那些疑惑的美国人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试图弄个明白，但一无所获。

这样看来，应该承认同样的中立可能也会体现在剩下的被标出的地点上。它们就是坎昆岛、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岛。其中的第一个位于尤卡坦半岛的端点上，属于墨西哥——这个国家在地峡问题上也有着十分切实的利益，因为它和美国一样，有着绵延的、既濒临太平洋也濒临大西洋（在墨西哥湾）的海岸。

不过，坐落于尤卡坦海峡这个从任何墨西哥湾港口至加勒比和地峡的必经之路上的岛屿除了其位置并无其他可提供的了。它的驻泊条件几乎令人难以忍受，没有丁点资源，只有付出和所得不成比例的费用才能给其配备上防御能力。另外，把该岛看成一个有前途的军事要点只会更加突出这个最肤浅地瞄上一眼也会让人铭记于心的事实：就位置而言，古巴岛在对

考虑到加勒比海的1200英里的阻隔地带中有600英里在古巴土地上，接下来是50英里宽的向风海峡。其次是300多英里长的海地，最后是莫纳海峡，无可辩驳的是，一支以古巴的圣地亚哥或牙买加为基地的优势海军，可以给予美国和加勒比地区尤其是地峡之间的所有通道以非常严重的干扰。

与此相联系，也应考虑佛罗里达半岛和将其与巴哈马及古巴分离开来的海峡的狭窄对于美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之间商业上和海军上的交通联系的影响。如果能想象一下佛罗里达半岛，这个长但是不宽的地带被完全移走或为一条贯穿其颈部的海峡分为一个岛屿将会导致什么情景。为此，必须确保对海峡的两个入口的控制，这样一来，运输也就不会被迫经由一条狭长的、在其一侧与他国——可能也是敌国的领土相邻的海峡了。

在美国与英国或西班牙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这条海峡或许会受到离己方基地不远的敌国巡洋舰的骚扰。这个半岛的作用是将美国从大西洋至墨西哥湾的航线向南推远了200英里，从而使得美国必须为控制佛罗里达海峡而拥有一个基地。然而，美国差不多完全缺乏有用的港口这点又将事情弄得更糟。在大西洋海岸这个最暴露的一侧，不存在这样的港口。在墨西哥湾，没有哪个港口能比离基韦斯特175英里的坦帕湾离前者更近。

实际上，对于美国在地峡运河上的利益并不能说些什么，目前这样的一条运河对美国的重要性尚不能和佛罗里达海峡相比。前者将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而后者连接的是大西洋和墨西哥湾。

在这里还可附上一句：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连同其海峡的影响也被翻版到了古巴、海地、波多黎各以及将它们分离的海峡上面。它们整个地构成了一条长长的阻隔，它对于加勒比海的战略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如

果其中的海峡为敌人所控制，这一阻隔带就会将墨西哥湾推至绝对孤立的境地。

7

牙买加岛对于由古巴、海地和波多黎各组成的大阻隔带是这么一种关系：它是一块天然的起跳石，借助于它，美国就可以从其入口到地峡。关于这个交通线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此进行探讨。

在涉及加勒比海的入口以及该海域的内部控制的问题上，牙买加处于一个突出的中心地位。它到科隆、尤卡坦海峡和莫纳海峡的距离相同，都是 500 英里。与南美大陆上、加伊纳斯角及中美大陆上、格拉西亚斯的距离更短，都是 450 英里。

另外，牙买加岛紧贴向风海峡的后梢，它对后者的控制力一点不比圣地亚哥差。任何一个军人读者都几乎不会不注意到，牙买加岛作为一支大型舰队的基地会像一个将只在几个点上可以出入的一条边界线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的陆军据点那样发挥作用。如从牙买加岛向每个方向上派出一支相对精干的快速侦察船队，它们能予上述三个海峡的通行状况以及时的注意。即使船只是在其他地点上出入加勒比海，以牙买加岛为基地，可抵至加伊纳斯和格拉西亚斯，并能确保该航线不受外来干扰。

由于拥有位置上的优势以及一个可以被令人满意地发展为一支大型舰队的海上基地的港口，牙买加无疑是加勒比海中间最重要的地点。可是，和古巴相比，牙买加还不能被认为是加勒比地区最具决定意义的地点。要知道，一个地点的军事价值既是数量意义上的，也是质量意义上的。不论

一个地点的位置多么优良，单凭这一点也不能充分地弥补力量和资源方面的缺陷。直布罗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固有力量的代名词，但它的狭小、孤立和资源的贫瘠构成了对于它的进攻性力量、甚至对于它的坚不可摧性的限制。这些对军人来说不难理解。

我们再来看牙买加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比如，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和欧洲的交通，它的劣势地位丝毫未被改善。牙买加离这些地点以及圣卢西亚，因为欧洲方面的支持，使得牙买加的资源集中到此的距离使其处于一个极为孤立的境地。这种状况还因下列事实而愈显突出。

这就是，无论百慕大还是圣卢西亚，都依赖于外部提供经由它们运至牙买加的任何东西。而古巴的幅员、人口数量、海港数目及产业规模则使它自然地积聚起了一个大的商业社会必须具备的资源。这些连同古巴与美国的邻近和它的其他位置优势几乎使得世界上的其他岛屿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可在军事意义上与古巴媲美的地点。只要和美国有着友好关系，古巴就不可能被孤立。

任何这类的探讨的目标都应是通过逐步缩减所考察的众多因素，从而使余下的决定性的因素可以变得更引人注目。只有这样，战略图景的特点才能日益显现。这方面的主要工作在前面已经进行。概括起来，我们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

一是两个决定性的中心：密西西比河口和地峡。

二是四条主要的将这两地与其他地区连接起来的航线。这四条航线分别连接地峡和密西西比河口、地峡和北美海岸（经由向风海峡）、墨西哥湾和北美海岸（经由佛罗里达海峡）、地峡和欧洲（经由阿内加达海峡）。

三是所讨论的地区的主要的军事要点以及它们独自的和相对的重要性。

基于有关的讨论，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因为“交通线”是战略中

如此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那些所处位置决定性地影响着数量众多的或很大范围之内的交通线的地点是最重要的。

在上述的四大交通线中，三个经过古巴和牙买加附近。即：从密西西比河口经尤卡坦海峡至地峡，从密西西比河口经佛罗里达海峡至美国的大西洋海岸，从地峡经向风海峡至北美大西洋海岸的航线。

至于从地峡至欧洲的第四条航线则与牙买加岛比与古巴岛更为贴近，不过这两个岛还是比该地区岛屿中的任何其他岛对它更具控制力，因为其他岛屿相比于牙买加或古巴更容易为这条航线所避开。

所以，古巴和牙买加这两个被视为要点的岛屿对于控制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有着最具实质性的意义。此外，对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都具作用的战略中心是在向风海峡，因为在这里古巴和牙买加两岛屿对加勒比海的控制力的相对大小得到了最终的检验。如前所说，在一场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不主要是要点，而是机动力量。对于任何情形的充分说明都存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组合中。

就位置而言，古巴岛是比牙买加更具优势的要点，原因前面已经给出。在掌握着这两个岛屿的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形下，双方机动力量的相对大小将为向风海峡的受控制状况所检验，因为，该海峡是牙买加与美国海岸、与哈利法克斯、与百慕大进行联系的最短、最佳路线必经之处，为此它对牙买加来说必须保持开放。

另外，如果牙买加的力量未强大到足以强行使该海峡保持开放，它就只好通过规避、通过采取隐蔽的手段来维持基本的供应。因为，它无力在海峡方向上充分显示力量，无力在任何方向上从靠近它的古巴的影响之中摆脱出来。在这种状况下，放弃最佳道路意味着受孤立；这种情形一旦是长时间的，那就可能只有一种结局了。

1

在今天看来，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了。但是，英美两国间基于共同血缘的亲近感可能会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并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

“亲缘关系”和“同盟”这两个词表达的是两个极为不同的意思。就其中包含的权利与义务的意义而言，它们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根本不同。前者指一种自然的联系，后者则纯粹是后天的。

相应地，在“同盟”的词源学意义中，可以找到一种受制于一条人为的纽带的感觉；这纽带既可是力量之源，又可带来忧烦。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对应物就是婚姻纽带。当它存在于从人性中升华出了超越一切的情感的特殊状况下，无疑是所有纽带中最强有力的。

不过，如日常经验所表明的，当爱因固有缺陷的存在或不良意图的萌生而凋谢，只剩下冷冰冰的义务时，婚姻就成为同样最令人伤神的东西。

就个人而言，我乐意相信近些年英国和美国间友善之情正缓慢却实实在在地上升。最近的乔治·克拉克爵士的和亚瑟·席尔瓦·怀特先生在《北美

评论》上的文章令人高兴地表明了这点一。同时也证明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传统正使两国相互感知，并且正摧毁着那将具有共同血缘的两国人民分离开来的隔阂之篱。在这儿美国见到的是亲缘的作用，是共同的源泉导致的完全正常的结果，是同一血缘的孩子们的自然亲情的流露。

尽管他们曾相互争吵并疏远，但后来都认识到这样的一种状态是错误和有害的。这种复活的情感或许会吸引那些观察着世界问题之生成的人们的注意，让他们认识到想象和情感在多大的程度上驾驭着世界。

如果在强烈的感情冲动之外，美国还未忘记在两国相当不同的政治形势之下存在着共同的、世代相传的政治传统和思维习惯，那每一国人民的政治发展则受着同样的道德力量的支配和塑造。因此，两国逐渐走向行动的协调一致的可能就会变得日益引人注目。

在分布于欧洲与美洲文明的所有因素中，没有什么能像两个根本的，但却是对立的因素（个人自由和对法律的遵从）的独特结合更有积极作用了。这种作用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

因此，就英国而言，英伦列岛有限的领土幅员不同寻常地加剧了促使居住于此的人民在疆界之外寻求行动空间的客观趋势。而另一方面，乔治·克拉克爵士引用的数字充分表明了产生于同样原因的同一种趋势也存在并作用于美国身上。尽管尚未完全有人居住的广阔的国土和由保护主义体制造就的大批国内产品的消费者导致了对于这一趋向的一些偏离。

简而言之，英美两国的地理状况在性质上相同。虽然程度有异，但它们按着同一方向来对两国发生影响。对其他国家来说，陆地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与光荣是国家的繁荣与声誉的主要源泉。对英国和美国而言，如果它们正确地估计了它们在人类进步的伟大戏剧中可以扮演的角色的话，则是海上利益与其息息相关。

故而，在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海上利益，这需要有一支组织得力的力量用以驾驭海洋事务的总进程，并在必要之时维护指导海上战争的法则。因为，这些不仅是基于一个合理的推理过程之上的思考所得，也以历史的教导为依据。通过运用这种力量，通过维护这些法则，通过仅仅使用这些手段，在那英国是唯一的海上强国的19世纪之初，英国使自己免遭于崩溃，并且强有力地使历史沿着一条较好的方向前进。

当上述诸有力的以及决定性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将英美两国汇入了同一条道路之时，当激情开始要体现为行动的时代将其曙光投入人们的眼帘之时，一个油然而生的问题是：那些为这些曙光而欢呼，并欣喜地加快这个美好时代到来的国家应支持怎样的当前政策呢？

《北美评论》在一个短时期内集中登载的卡耐基先生、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特先生的文章表明并没有太多人寻求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尽管我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希望看到英美两国在海洋或其他方面形成一个同盟，但当前的形势使我不能设想这点。

因此，我宁愿说：让每个国家受到更多的教诲，认识到自己的海洋利益的广泛程度吧！如果这点做到了，它们利益的一致将变得一目了然。在没有“经验”这位伟大老师的情况下，这种一致感不可能牢牢地印在人们的心中。因而经验也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发生随着那并不遥远的时代而来的事实的话。在这个时代中，美国人民必须再次致力于向海洋迈进，对外大展宏图，如同他们在故土和新的家园上的先辈所做的那样。

不过，即便如此，还有着其他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每一个国家适当的活动领域，对于就对热诚合作之实现至关重要的地方达成一致，双方目前还可能产生疑问。使这种情形更显突出的是：

只要美国自己还是不愿意通过创建一支足以依赖的力量来保证有关地

区的安全，就不能合理地期望英国会相信我们具备缔结同盟的条件，或在对其海上权力至关重要的地方向我们作出让步。正因为在调整每一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的过程中令人满意的合作可以此过程为基础，一定数量的摩擦可能出现。所以，我不会主张在时机不成熟之时为建立同盟而努力，这种实现所希望的目标的举措是强人所难的，而且甚至可能令人着急上火。

故而，我宁愿一贯地强调双方在天性和周围环境方面的无可否认的相似之处。因为，这不仅表明了共同的血缘，而且还预示了共同的命运。若将这种思考的种子植于土壤之中，就会发芽、生长。其过程是这样的：先出现叶片，然后是穗儿，接着结出丰满的果实，到这时你就可以用你的镰刀收割你的政治成果了。不过现在它显然尚不成熟。

因此，正确的做法是：静静地，不事张扬地，如同缓渐的自然过程，情感就被糅合进了国家的躯体之中。萨姆特港的国旗受到轰击，美国内战爆发之时北方的一跃而起证明了这点。

尽管我坚信英美两国在海洋上真诚地携手合作有利于这两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但我还是同样地相信不仅应该希冀而且应该平静地等待这种局面出现。与此同时，更应该创造这种真挚友情所依凭发育的条件。

但是，我们仍需要明白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有些过程是不能被催促向前的。只有当作物从它们沐浴于其中的阳光和空气那儿慢慢地吸收了有益的影响时，它们才能茁壮、协调地生长。

英国这么一个有着充满光荣与艰辛的历史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尚没有做好准备以向着和美国的再次联合迈出不同寻常的一步，却突然碰到了这么一幅最终图景：分裂、国家认同感的消失、制度的甚为剧烈的改变、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向一个大联邦下属部分的地位的沦落，这些也许就是英国在遥远未来的命运。

因此，指责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特先生的建议，只会将那些他们谋求去说服的人赶开得更远是没道理的。何况，这些建议都是清晰、坦率和有条有理的，它们的前提充分考虑到了两国共同利益的无可非议的理由。对于乔治爵士的建议，密切的私人关系使我有幸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妥帖不仅仅由真诚的善意和对于任何关系到美国的问题的广泛认识所决定。如不去挑剔这些建议的细节，对此我提不出多少意见，我对它们的异议仅仅是：我不认为时机目前已经成熟。

在美国人的心中和认识中，还不具备接受英美联合的土壤，我也怀疑是否英国公民更有心理准备。两个建议都想到了英美间的海军同盟，虽然具体的主张不一。可是，难点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尚未认识到或承认它在海洋上有着巨大的利益。而且，其国内人民大多数依然坚持深植于已往的政治史中的信念。即：抱负应该受限于洗拂美国的东部、西部和南部海岸的三处海洋。

对我来说，我相信这种认识曾是真理，但当前而言可能就不那么正确了。如果这它只是我的一种偏见的话，那最好的办法是在采取其他行动之前将其清除出去。在美国，如果要有稳定的、一贯的国家政策，就必须和公众的信念保持一致。后者一旦形成，长时间也许无声无息，但碰上特定的时刻，就会化为强有力的行动。如 1861 年北方和南方在多种因素驱使之下的行为所表明的。

假如国人对于海洋事务的思想意识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就不可能认为决定着国家繁荣和历史走向的最有力的因素存在于海洋之上。这个主题不仅对于一个国家有其重要性，也关系着世界历史和人类的福祉。就迄今我们看到的而言，人类的命运维系在存在于欧洲及其美洲的分支的文明之上。那么，受到并不过分的赞许的欧洲和美国文明又究竟是怎样的呢？

可以听到这种保证：多个世纪的英勇战斗所建立起来的宏大的制度规范尚未受到侵蚀。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斗争中，无可否认的利益和觉醒的国家意识将引导美国发挥它的作用。因此，美国应尽量避免卷入欧洲人的事务。这对发展美国的独立性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自身强大了，就可以从欧洲人那里承担一份辛劳，也就是说为维护共同的利益而负起一份应尽的责任。

要达到上述效果，请记住这样一条法则：不管发生什么，海权在当今年代将扮演它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扮演过的角色。而美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必定成为向文明世界的海权提供动力的前沿地带之一。

因此，关于海洋，也许更应该说是水域，其基本事实是，海洋是大自然中伟大的交通媒介。

然而，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了。像与之相比微不足道的陆上利益一样，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因此，作为各国为之角逐的最大猎物，控制海洋也会像其他激起争执的利益一样有助于使对目标的矢志不移精神和力争上游的品质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而这些正是文明国家社会的力量所在。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邻近可能会像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

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政治冲突。就像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

可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这种理想将为政治上的联合所弘扬，而后者反过来主要基于自然的亲情，以及对于携手合作带来的相互利益的明确承认，而不是巧妙炮制的条约协定。

如果合作精神存在，一个种族就会有着充分的聪明才智为这种精神的发挥效用提供必要的手段，而英美两国也会在控制海洋这个将它们分离开来的有益工具方面找到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驾驭、但或许可以为这个种族的联合力量所支配的对象。如果一个英美间的同盟真的到来，它也许更是无法违逆的大众呼声的产物，而不是政治家以娴熟的手腕拟定的计划的体现。

但是，我认为，我们或许不必持有这种经常被提及、乔治·克拉克爵士也极力鼓吹的认识。即：英美间的相互支持在将来可能会使海洋商业总体上免受迄今它在战争中所受到的侵扰。在此我必须试着将我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极为清楚，因为它们在一些人看来似是消极的，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它们与我在其他地方对这个话题所作的大量、系统的探讨相矛盾。

乔治爵士和怀特先生都主张建立英美间的同盟。前者指的是一个海军联盟，后者则指正式的条约关系，针对的主要是战时的可能事态。的确，每个人的主张的主要特征都是在英美之间促进友善，防止分歧因素的出现。但我们必须清楚，即使追求这个目标也是为了两国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可以互为倚重。因为，这样战争确实可以更肯定地被避免。即使战争来临，人们也会发现这两个国家在海洋上连成一气，从而在海上无懈可击，据有了海洋一直只赋予其绝对的统治者的对总体形势的控制。

因此，在我看来，英美联盟得心应手的逻辑结果就是霸权。可是接下来，如果高高在上，为什么还要向某个敌国让步，同意它的商业不受侵犯



英国皇家海军鱼雷艇驱逐舰“哈沃克”号

"哈沃克"号是哈沃克级鱼雷艇驱逐舰，由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亚罗造船厂建造，是皇家海军订购的第一批驱逐舰之一。它有240吨排水量，每小时27海里的速度，并装有一个12磅的发射炮，3个6磅的发射炮，以及三个鱼雷发射管。"哈沃克"号于1893年8月12日下水，并于1893年10月28日试航成功，它的最高航速表明它有能力抗衡战列舰。它在1912年被破坏。

正是因为英国的海权虽然仍居于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已是今不如昔，不再是无与伦比，英国才转而承认挂中立国旗帜的船只上的货物不可侵犯这一原则。这项让步出自于地位的相对虚弱，或者也可能出自于某种被误解了的人道主义。

不过，不管它是否适当，它只会对中立国有好处，对强大的交战国不利。在政策上讲，对英国的这个让步的唯一合理解释是：英国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承受额外的敌对负担，如果中立国将和它的敌人站在一起的话。在另一个场合，我曾说货物受旗帜保护的原则永不会变了，意思是说从当前的迹象来看，没有哪个强国会在海洋上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可以用武力推翻这个原则。

同样地，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断言，一个对其海权有信心的国家或同盟永远不会作出让步，让某个海上敌手的被不恰当地称作“私人财产”的东西免受侵袭。任何时代的较弱的海上交战国都梦想实现这点。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乍一看很合理的论点很有说服力。

举个例子来说。拿破仑一世这个大掠夺者在把以战养战的原则推至极至方面是竭尽全力，毫无恻隐之心，甚至在和平时期都毫不犹豫地以附属国为其军队的供给来源，用归根结底就是以属于外国人的私人财产的财富来供养自己的军队，可是当他把别人对其帝国海上货物的截获和对运行于一条内陆乡间小道上的一车货物的截获相比时，他倒变得理由十足，表面上看来极具说服力了。

在所有这些论调看似合理的表层下面并不存在多少令人疑惑的思想，它们都没有认识到情形的本质不同。即使在陆地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是基于这样的简单原则：损害不会是任意的。

就是说，当要达到的目的十分微小或者和可能引起的伤害十分不成比例时，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就不会出现。由于这个原因，未投入商业冒险的个人财产在文明的海上战争中是受到尊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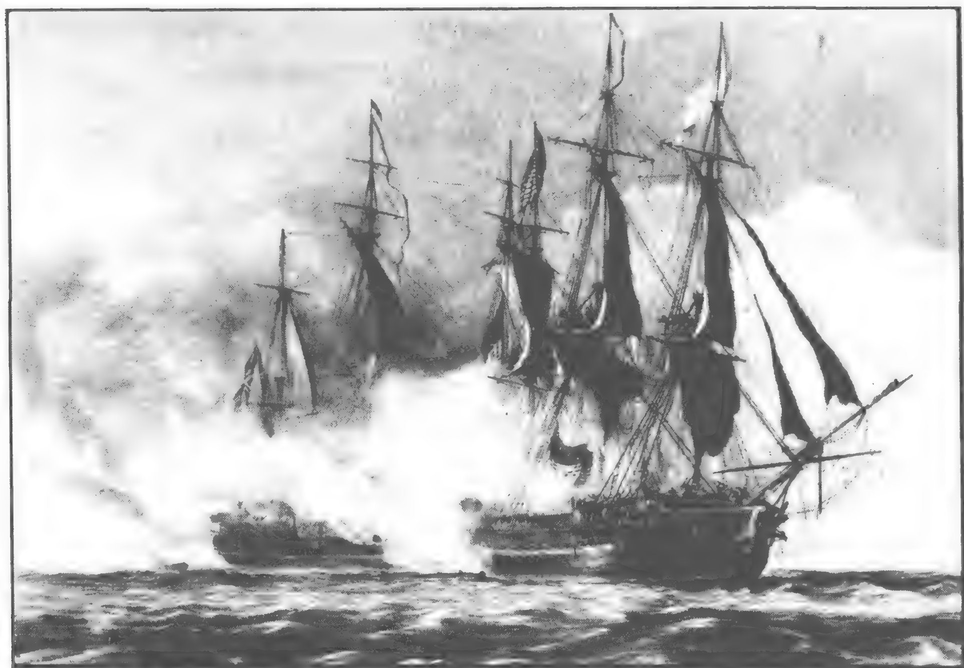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如我们都知道的，在陆地上，规则根本不是不变的，当对私人财产的征用和破坏符合某个敌国的意图时，它也就不受考虑了。一个跋涉于大道之上、手握短棒的人可以声称他的短棒有着文明赋予财产的全部神圣。但是，如他用棒子打破邻居的头，上述的对于他的财产的尊重也就转瞬消失了。

今天，运行于海洋之上的私人财产以最具活力的方式参与增进了它所属的那个国家的财富与资源。一旦这个国家进入了战争，它的运行于海洋之上的所谓的私人财产就加强了这个国家战时的财力和耐久力，因而也就

第十四章

美国海军的战略崛起

构成当今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整个世界所处的政治形势的因素已和19世纪之初根本不同。因为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发展的快慢、国家的大小。如今的美国又大又强，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拥有了进军世界的能力，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就能决定一切。美国过去和今天的最大不同是：就与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的联系远近而言，以前美国确实处于一种政治上的孤立状态，而今天这种状态实际上已不存在。



被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夏农”号齐射之后残破的“切萨皮克”号

“夏农”号是38枪勒达级英国皇家海军级护卫舰。它于1806年下水，并参与了拿破仑战争和1812战争。在后来与美国海军“切萨皮克”号的对战中，于1813年6月1日赢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

上述这两种情形都显示了一种隐约可见的景象，这就是在一支新型海军的出现和美国正走进的这个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如果有着这种耦合，其体现的就不仅是某种明确的意图，也有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

因此，就“海权”这个词的广泛意义而言，将和这种变化紧密相关。实际上，海权将成为那些不再主要是国内性质，更包纳着关系到各国与整个世界关系的活动的主要特征本身，而不仅仅是其原因或结果。

正是在这一点上分化出了对立的认识。那些认为美国的政治利益仅局

认，除非执行完全的孤立政策，否则就必须为了对付国际上的错综复杂而在海洋那头获取领土。这种复杂或许能被十分容易地避免，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可用来加强美国主张的分量，就会促使对手对自己的失策以及不当之处予以承认。

2

今日的美国和 19 世纪之初的美国在情势上的不同，自然地表明了美国多么有必要避免不假思索地接受那些已化为信条的先例，多么有必要寻求一种英明的原则以验证那些为一代人所创立的行动方向的政策，而且这样的政策必须因时而变化。

在 19 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美国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这些强国在地理上有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

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

于是，美国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自身利益的土地，美国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是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

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如此的交易看起来自然是不那么光彩。

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美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

虽然，杰斐逊时代的政治家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大陆进行扩张的需要，但关系到更长远的利益的问题被当然地推后考虑了。在那个时候，具有眼前意义的事情迫切需要处理，考虑那些人们并无多少关注的问题只会分散注意和力量，而这对于如同对于从事战争一般的治理国家，乃是一大忌。

不过，尽管当时的美国政府本可以令人高兴地避开上述麻烦，它还是发现——如同任何时代的政治家们，一旦存在着外部利益，不论其特点如何，它们绝不能被忽视，也不可能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一样。结果，虽然当时美国人民对于大陆之外的世界并无什么政治野心，但他们的商业活动使美国的利益和正处于交战之中的其他国家的关键利益发生了强烈碰撞。

如果不能看到当时受争议的问题，更多的是牵涉到了正处于与拿破仑生死搏斗之中的英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关键利益，我们将可悲地误读 1812 年的英美战争以及导致这场战争的事件所给予的教训。那时候，美国政府试图就争端和英国达成妥协，通过和平施压避免暴力的使用，而不是通过建立一支强大得足以在国际事务上发挥可观作用的海军来解决问题。这样一来，美国就被拉入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3

构成当今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整个世界所处的政治形势的因素已和十九世纪之初根本不同。因为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发展的快慢、国家的大小。如今的美国又大又强，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拥有了进军世界的能力，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就能决定一切。美国过去和今天的最大不同是：就与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的联系远近而言，以前美国确实处于一种政治上的孤立状态，而今天这种状态实际上已不存在。

当时，美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国外政治家对于欧洲大陆上的空前重要的问题的严重关注促成了美国的孤立状态。而那孤立政策对美国来说也切实可行，因为这符合美国一时的需要，当时美国尚属弱小，需赢得一定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独立。那时候，除了有关密西西比河航行权的问题，和其他国家的摩擦只可能是产生于跨出边界去寻求贸易机会的活动。

现在看来，说实话，原则上对于商业就像对于战争那样厌恶的杰斐逊实行禁运制度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惩罚了外国人并且减少了美国卷入国际纠葛的危险，也使本国的船只免受伤害。即使这种做法使贸易受损，造成了草儿在纽约大街上生根发芽，它还是通过消除危险的对外活动而作了补偿。

今天，无疑没有多少人会心平气和地看待一项将美国和平地割离于它的主要商业航线的政策。不过，在1807年，许多美国人宁可委曲求全而不愿进行一番战斗，或者甚至建立一支也许会促成战争但更可能使战争得以避免的力量。

可是，在今天无视这个事实，即美国不再像在杰斐逊时代一样处于一个不起眼的或孤立的地位，变化着的局势或许又给美国带来了一个类似于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曾碰到的两难问题。这就是，美国不仅已经长大，而且世界的面目也发生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如今，海洋这个各国间交通的重要渠道已经能被迅捷、安全地跨越，各国间的距离从而也大大缩小。在从前或许是远离美国、引不起美国多少关注的事件，今天就发生在了美国的门前，并给予美国以密切的影响。

1812 年美英海战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英美之间的主权之争并未停止。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加拿大省，人口稀少，防御松懈，美国欲向北扩张。1812 年至 1815 年，独立不久的美国就主动挑起了一场与前宗主国大英帝国的战争，史称 1812 年美英战争，这也是美国独立后第一次对外战争。



如前所说，这是政治摩擦之源，但接近又正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世界已变得更小了。从前尚处远方的地点今天已因其对于我们的靠近，而对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过，尽管距离已经缩短，对美国来说水上距离依然存在。不管这段距离如何之短，政治影响要想将其跨越，最终还要凭借海军。海军是美国不可缺少的工具，当紧急状况出现时，这个国家能够依靠它将其力量投射至自己的海岸线之外。

要想知道杰斐逊时代变动着的环境对杰斐逊关于海军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就需要考察一下那些不复存在、甚至当时就稍纵即逝的事实。1812 年的战争表明了一支海军的价值，不过不是通过那些值得称赞但其实并无多大意义的某只舰船的胜利，而是通过因为一支与国家的需要和暴露程度相适应的海军的缺乏所造成的我国海岸及对外交通的瘫痪。

当时，美国海军无疑以其在海上战斗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荣誉，但这荣誉仅仅归于自己而已。政治家们只使自己丢了脸，他们让国家蒙受了海岸被袭扰、商业活动被炮击的羞辱。可是，另一方面，再也找不到比美国海军的胜利更鲜活的例子来说明约未尼所称的“仅仅为了取胜的战斗所带来的一无所有的光荣”了。

若不考虑美国海军为自己赢得的荣誉最终使这个国家看到了这支小小的力量的高效并显示了海洋对美国可能具有的意义，再没有什么牺牲比那些抛洒在海军的快速帆船和单桅帆船上的鲜血相比更不值得了。美国海军当时的行动无法和那些前哨战斗、侦察战斗和对于保持一支军队的士气既属不可缺少又有着无穷意义的各种服务相提并论，它们仅仅是一些零散的行动，并不存在什么相互间、单个行动与能够左右战争胜负的整体行动之间的联系。

1812 年战争结束后不是很久，发生了一起在美国对外政策史上是划时

代的、对于美国海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事件，这就是“门罗主义”的提出。只是不时地，从范围到目的，人们对于这个声明有着让人捉摸不透的曲解。也因为如此，才有了一些说法以“门罗主义”的名义被提了出来。

不过，如同对于任何其他的政治信念，美国没必要给予门罗主义某种最终的确定性以反对将这个词用在那些和其本义绝不相符的论断上。但美国应意识到名称的误导作用，尤其是在那些这样的错误或许会诱使大众相信某一外国正蓄意破坏美国所坚持的防卫原则的问题上。

4

美国对门罗主义基本精神的坚持不是通过正式承担某些无法摆脱的义务来表现，而是通过设立某些先例，显示出一种全体人民都始终奉行、美国不可能默默地放弃而又不冒使国家受辱的危险的普遍立场。也就是，美国或许需要接受一些看来是自然地由门罗主义中导出的推论，但我们根本不用通过遵循近来某些用门罗主义的名称予以修饰的论断来坚持门罗主义。

这些论断也许体现了某项合理的政策，比门罗主义本身更适用当前局面，但它们和门罗主义不是一码事，虽然其间有些共同之处。剥离所有的后天发挥，就其本义而言，门罗主义所表达的是一个最终只有借助于海军才能实现的设想。因为它的基点就是：在美国疆界之外地区的命运之中寄托着对美国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它的显著特点则是：海军，只有海军才能为它提供保障。

从此以后，门罗主义又得到了多次不尽相同的运用，而这些运用所基于的事实背景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并在今天达到了顶峰。美国已成为一个太平洋强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依赖地峡运河来进行它的两大海岸之间的交流。这样，根据变化着的形势，门罗主义被作了修整。从这种灵活性而不是最初的门罗主义声明的字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原则的本质特征：承认不处于美国政治控制之下的海外地区不仅关系到单个美国公民的利益，也关系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利益。所以，在某些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被迫对这些地区采取行动。

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消除一种常常为人提及却又多少有误导作用的说法所造成的错误认识。这种说法就是：美国只需要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经常附加于其上的还有这么一句解释：防御指对我们本国海岸的防御。

如今，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所有人需要的都只是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但我希望美国永不寻求战争，除非是为了保卫它的权利、它的责任或它的必要利益。在这种意义上，美国的政策可以一直是防御性的，虽然有时美国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其合理性不只是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准则，而是为了无可争议的权利。

不过，如果美国在海外有着可能必须由海军去保护的利益，那么自然的结论就是：美国的海军在战时除了保卫海岸，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另外，作为一个公认的军事原则，如果美国希望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争中采取主动，无论这在道义上如何站得住脚。

5

对国家安全而言，重要的是意志以及将意志化为现实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既有着得到清晰表述的国家目标，又有着足以实现目标的手段，它就可以对战争做到有备无患。不过，这不意味着国内不存在什么争论，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关注之处就缺乏真诚、合理的考虑。最危险的一种情形就是公众平时默不作声，一旦心血来潮就贸然行动，却又没有有组织的力量作支撑。

国家，尤其是自由国家，对于这种紧急局面往往最缺乏应有的准备，可是，即使由于无法避免的政府的更迭频繁，民主国家在目光的清晰性和行动的一致性上有所缺陷，但作为补偿，它们被赋予了一种本能，能够不自觉地、下意识地领悟到真理并在行动的日子到来之前做好部分的准备。

因此，说美国的大众并未有意识地认识到美国在海外有着关键的政治利益或许不错，但说他们没有在自己与海军的重建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可能更正确。不过，美国的海外利益照样存在，美国的海军仍在发展。后者将最有力地保证对前者的维护不会导致对和平的破坏。

所以，从我的观点来看，美国海军近来的发展既不表明我们已有了正式的政治目的，更不表明我们感到了某种威胁的存在。只为少数人拥有的先见之明和坚定打算并不能推动整个国家前进，这是一个法则。

国家不会站在子弹的射程之内发出挑战；如果它们都处于这个射程之内，战争就不会多到哪去，当前欧洲为时已久的武装下的新和平证明了这点。决定着国家行动方向的大众情绪总是逐渐地、不为人知地受到那些琐

从而增加了各国间的接触点，海军的重要性随之更加突出，这是事实。对该事实的敏锐判断日益明显地表现在了欧洲国家的报章中，更显示在了外国政府对于海军的日益强调上。另一方面，欧洲大陆上各支陆军力量的加强以及领土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定，使每个国家更加担心一种竞赛会被引发，于是欧洲处于了一种政治上的平静之中。

当前，欧洲大国的对外活动场所是欧洲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差不多用不着怀疑，它们之间的斗争会越来越近地影响到我们。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影响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展，这片海洋越来越成为政治变化、商业活动和各种竞争的集中之地，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大国都卷入了其中。

由于这些缘故，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虽然眼下还不具备根本的重要意义，但作为地峡修成之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水道所在，作为拱卫着通往运河的道路的地区，它会十分的引人注目。立于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上的日本作为一个强大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而崭露头角也着实令整个世界吃惊。

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导致战争。而某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将大大增加美国和交战国发生碰撞的可能，随之我国的政治家们就更要为避免卷入和保持中立大伤脑筋了。

虽然欧洲各国政府都声言要保持和平，而且对它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和平确实为其所愿，但它们并未表露任何对于在远方进行政治经营和谋取殖民地的厌恶。相反，它们对于扩大活动空间和增强影响的执着是今天最不难以看到的事实之一。

在其中的一个国家，这种活动主要是政治性的，由其政府所推动。它受长期的传统和对于管制的热衷所驱使，寻求扩充它的活动空间以便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管理和支配，至于经济上的得失它则似乎并不关心。

在另一个国家，动力来自于个体公民无处不在、永不衰竭的热情。他们主要为获利欲望所驱使，只遵循商业上的目标，其政府也给予他们的活动成果以承认和保护。

另外，还有一种海外活动，其动机主要是私人性质和商业性质的，其中的个人寻求的只是财富而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政治上的抱负，国家的干预主要是为了在一些地区保持对于其臣民的控制。如果没有这种干预，后者也许会与他们的国家相疏离。

但是，不管海外活动的形式如何多种多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体现了有关国家人民的禀赋和创造力。这也证明了这些活动背后的动力都不是人为的而是发自天然的，所以将会一直得以延续直至某种变化来临。

越来越多的文明人口正寻求占据新的地盘，扩张生存的空间。如同所有的自然力量，这股潮流无遮无挡。当它涌入了那些有着很好的自然禀赋，但当地居民的无能和无知却使其丝毫得不到利用的地区时，当地的制度也就分崩离析了。埃及近些年来的为人熟知的情形绝对是个典型的例证。

这好比在埃及，原有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得以延续，这不是由于那些曾长期生活于这些制度之中的埃及人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牵涉到了几个欧洲国家在埃及的利益。英国目前在政治上和行政上都控制着埃及，探讨英国在埃及的拓展和存在有无可指责之处，是否经得起纯粹的道德家的评判并无意义，就如同讨论一次地震的道义性一样。多方权衡得失，英国的做法大体上还是正当的，它有利于整个世界，尤其有利于埃及人民，不管他们自己对此会怎么看。

因此，埃及的例子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文明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接管

有关地区的本地居民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文明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都侵蚀了它们所控制的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的权利，像美国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交往就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也就是说，一种权利要想不可分割，它就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可不幸的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如果一个集团对其所居住的土地的使用状况给整个世界，尤其是给它的邻居，有时甚至给它自己的成员造成了损害，那么它对于有关土地的使用权就不是不可剥夺的。

作为例证，看一看吉达的阿拉伯人对于为防止一种致命疾病扩散到始发区之外而采取的整治环境措施的愤怒抵制吧！再想一想土耳其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的可怕生活状况吧！这些情况之所以存在，或是因为其他国家普遍地漠不关心，土耳其的例子就体现了这点。或是因为错误的做法有充分的力量为倚靠，就这种情形而言，只有在这种做法导致了毁灭或遭到更强大的力量的打击时，权利才会被剥夺。

由于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依然处于未开化的种族或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后者不健全的政治或经济发展又不能使其认识到所拥有的土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广泛利用。另一方面，在文明国家内，无论政府还是大众都空余热情，缺乏足够的机会和生计，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后者向海外积极扩张的景象。

当前美国没有参与这种扩张之中是一件不争的事实。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其人民都未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趋势所感染。不过，形势促使美国必须

美国如何准备海战

在当今时代，为战争做准备这个问题既牵涉广泛又较复杂。这就像建造一支船舶时的情形一样。在其中，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努力导致的是一种妥协，而妥协是所有的军事方案中最让人没把握的一种。

对于美国面临的任何军事危险的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就是在海上。对海上战争做好准备，既准备好迎击来自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好发动海上攻势，就是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做到有备无患。

1

对美国而言，面临军事危险时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即海上。准备海战，就是既准备还击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发动海上的进攻。

在当今时代，为战争做准备这个问题既牵涉广泛又较复杂。这就像建造一支船舶时的情形一样。在其中，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努力导致的是一种妥协，而妥协是所有的军事方案中最让人没把握的一种。

对战争的准备工作包含着许多经常相互矛盾、有时还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因素。这些问题就连国家财政部人士的聪明才智也无法使这些因素都得到充分的照顾。这主要是因为，构成国家军事政策之全局的各个部分要求并非总是合情合理，无法全部满足。

因此，有人常常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是主要的，你的其他要求必须服从于它，除非你能对它大有裨益。"

结果，或者是政府的钟摆从一端荡至另一端，或者是出于所谓公平考虑，所有各方面都只能得到比所要求的量要少一些而激起种种不满。换言之，国家金库里的钱财被分散使用了，而不是被集中使用于一种来自于正

只会使人格精神受损，除非是面对着一股明显地无法抵御的强制力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是一句时常被糟糕地滥用的话，但它的的确确包含着重要的真理。

所以，提供一支足以保护一个国家的基业的力量，并确保它做好在必要之时可以迅捷行动的准备是一个具有立法和行政两大功能的政府的职责。这样的一支力量是影响着或者可能会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势的一个必然产物。它的存在和规模是关于在哪个方向上存在着国家利益或国家责任的国民意识的反映。

鉴于战争造成的可怕灾难，什么时候或以什么方式采取可能引致敌意的行动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过，它也是一个关于一个时刻、关于后果重大、关于最终决定会被推迟至怎样的最后时刻的问题。

因此，关于战争的准备对于上述决定只有这样的关系：它应该足以满足可能会跟对方提出的最大的需要。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它应该如此地咄咄逼人，以至于将在被一个国家相信是正义的要求，并且得到了坚定的显示的情形下使战争免于发生。当然，这样的一种认识只意味着防御，对国家权利或国家责任的防御。虽然这种防御可能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形式。

所以，

从这种秉性中合理地折射出的是战争之外的任何之物也许都解决不了的症结。这件事首先是政治性的。只有在已经作出了政治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具体地讨论军事问题，因为军事力量要服从于政治利益和国家政府的权力。

因此，我们应选择那些最难以克服的、而不是最可能发生的危险来衡量由军事准备所体现的军事防范努力程度上的大小。如果估计到了较严重的危险，较小的危险也就不足惧了。

一个国家能够以平静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近在眼前但并不是非常危险的复杂局势，倘若这种局面并未超出它业已合理预测到的最大范围。也不应否认，在估计危险时，应该具备适当的、剔除了不恰当的乐观和过分的担忧的想象力。

当英国的评论家们认识到了他们国家对于海洋的绝对依赖，强调英国海军必须在力量上超过它的可能对手中两个最强大者之和时，他们提出了一种至少值得认真讨论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促使英国由奉行海军“两强”标准改为奉行“三强”标准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存在，它远在可能性范围之外从而不能对现实中的行动产生影响。

同样地，在估计自己需要进行怎样的军事准备时，美国不仅应考察一个潜在的敌手在政治形势对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最多可动用多大的力量来对付美国，也应考虑众所周知的长期性环境对对手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制约。

就军事力量而言，只有欧洲的大国能成为美国的对手。这些国家在西

半球有其利益，对于美国在一种显然无法抗拒的内在力量的驱使下表现出的日趋强烈的门罗主义政策趋向，它们一定程度上一致地予以本能的、坚决的反对。但是，尽管如此，毕竟还有着在其他地区的更广泛、更重大的需要吸引着它们的注意。

自1884年以来，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获得了面积从100万至250万平方英里不等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主要分布在非洲。如一般所理解的，这不仅表明一些国家又得到了大片新的领土，也意味着国家间的争斗和猜疑将继续存在。

对于边界的无把握心理，对于将一片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热望以及支配，对于协调各国关系的法则等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要去处理好的。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到合理不引发血腥暴力反抗的统治，以及不造成殖民帝国不必要摩擦的维系法则。但这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当17和18世纪的殖民扩张再一次出现在了美国眼前，与其相伴的问题也出来了。不过，这样的扩张在今天要受制于一些显得更有条理的安排以及国家间的相互顾忌。这种顾忌是对于战争的普遍准备的产物，是在最大限度上维系着和平的当今时代的显著特点。

上述所有的这些都明显地体现在欧洲人身上。欧洲是各种各样的海外拓展活动的共同源地，由此而起的任何争斗必定要通过在欧洲的海洋和陆地上的战斗来解决，而自此造成的财产和生命的损失又必须主要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承担。

至于美洲大陆上的政治局势，尽管不无令人遗憾之处，但和旧世界所面对的风雨前程相比，就领土的政治分布和归属的确定性而言还是十分稳定的。

在所有可被归在殖民扩张及东方问题诸名义下的问题上，除了西班牙，

所有有着相当的陆海军力量的欧洲大国都被直接地、深深地卷了进来。它对于欧洲东部的事务未显示出多少关心，也未投身于扩大它的依然广泛的殖民地盘的活动中。各大国当前的主要活动理应成为美国军事考虑中的一个因素，但不应为美国外交思维所接受。

不过，尽管这是事实，美国在过去的历史中还是没少经历与其他国家的争执。在这些争执中，尽管美国相信自己是有道理的，甚至到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宣战的程度，但另一方看起来并不同意美国的看法。这些争执主要围绕着领土的归属，是西半球在走到今天的政治局面之前所经历的殖民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

3

美国所面临的困难英国也曾经历过，这使它能更容易地和美国达成谅解。另外一个有助于此的因素是英国作为一个商业国家，对于和平有着热诚的期望，它不愿意承受战争强加于其的负担。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军国主义”都不是一种主导观念。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倾向和孤立状态合在一起，使其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好勇斗狠的战争观念之所以为它们所排斥，是因为它妨碍它们倾力去从事它们最重视的活动，而且和它们的思想传统相逆。不过，说这两个国家缺乏对于荣誉方面损益的敏感可就冤枉它们了。

今天，美国已用几乎不可能被误解的语言表明，如果需要，它决心诉诸武力来防止欧洲国家在其已占有的美洲大陆上的地盘之外再进行领土或政治扩张。对于美洲的边界争端问题，美国表示它坚持把它们提交国际仲

裁。如果英国将这种立场视为美国一项合理的政策的体现，它就能够如实接受它，而不会节外生枝地宣称必要时为抵制美国的政策不惜一战，进而影响到公众舆论，造成麻烦。

如果需要的话，英国自然会为自己的合理利益而战，那么，为什么另一个国家就不应说同样的话呢？维系着一个国家之荣誉的不是它是否愿意进行战争，而是它的要求是否正当。这种认识根本不是“军国主义”的，甚至和它毫无关系。

在为军国主义精神所浸润的国家，普遍的认识是一项政策应以武力为倚靠，而在由此而来的荣誉观念中，政策的合理性没有其位置。任何士兵或以武力为政策后盾的国家都不想让人感到他或它无力或不愿以硬碰硬。陆军的生命力就在于战斗精神，一旦这种精神让人看来在一种威胁面前萎缩了，它就会元气大伤，而国家的政治行动能力也会受损。不过，这种情形不会出现在英国或美国，因为它们主要的军事力量是海军，而海军从来不是一支像陆军那样的进攻性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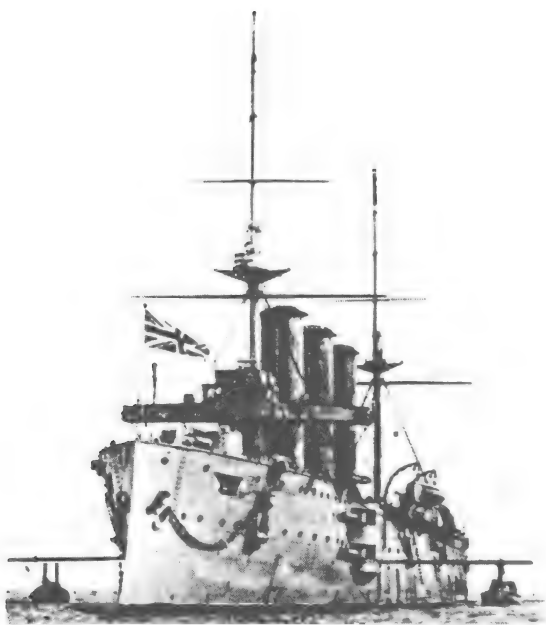
如今，美国已宣布它将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的政策，如果后者可能使美国与那些由于其利益而反对美国的立场、即使面对威胁也不太愿意妥协的有着军事传统的国家发生碰撞的话。那么，假如这么一个国家为反对美国的要求而决心不惜一战，为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同样毫不退缩的美国又有必要进行怎样的准备呢？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

刚才说到“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这句话。而这句话实际上包含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你必须要有这个实力，否则，你拿什么去打对方。因此，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尤为重要。

对准备工作而言，它包括“种类”和“程度”两个方面。当确定准备应达到什么程度时，需要估计最强大的潜在敌国在战时会动用多大力量对付你，同时也要考虑到它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面临的难题和承受的负担会给它的总体力量打多大的折扣。这种估价既是军事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而后一种意义上的考虑是支配性的。

就“种类”而言，准备可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前者主要是为后者而存在。有了防御性的安排，作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进攻性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在海上战争中，海岸防御是


英国皇家海军舰艇“蒙茅斯”号

中世纪的一种巨型舰，通常是大且吃水浅，是一种以帆和桨推进的单甲板船，可用作商船或战舰。

防御性因素，而海军是进攻性的。如果海岸防御充分可靠，海军统帅就可以放心地认为他的行动基地（港口和燃煤储藏地）是安全的。

海岸防御的存在意味着海岸可能遭到袭击。海岸易遭到怎样的袭击呢？主要有两种：封锁和炮击。后者比前者严厉，而且通常包括前者。对一支能执行炮击任务的舰队来说，封锁是更容易办到的事。对于炮击的必要防范措施是设置海岸炮火。由于这种炮火的威力和射程，一支舰队常常不能进抵至可对海岸进行炮击之处。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将炮火带从有关的城市大大向前方推移，从而使敌人舰队如果想对海岸进行炮击，除了进入上述炮火的射程之内别无他法。不过，也有情况表明，一支舰队由于其运行的快速，可以不受多大损失地通过炮火区域。这样，通过封锁航道来阻滞舰队的前进就十分必要了。

对此，今天的一般做法是运用水雷，这种武器单在精神上就能对一支快速通过的舰队起到震慑作用。不过，一旦这支舰队成功地穿越了过去，它就会抵至防御带的末梢并和有关的城市近在咫尺，而后者这时也只能为其所摆布了。

所以，海岸防御就意味着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不过，只有在商业上或军事上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地区才有必要受到如此的保护。现代舰队不可能浪费弹药来轰击那些无足轻重的城镇，至少是在它远离本方基地，比如说靠近美国海岸的时候。只是，那样做与其说会浪费钱财，不如说会消耗战斗力，而这种损失不是一支舰队愿意承受的。

虽然海岸防御本质上是被动的，但海岸防御力量的构成中应该有进攻性力量。它和进攻性的海军不同，活动范围受地域限制，但另一方面又是前者的一部分。这种力量要对敌方的海上浮动力量采取攻势，其自身必须也是浮动性的，也就是说活动于海洋之上。海岸防御中的进攻性成分体现



“闪电”号驱逐舰

“闪电号”驱逐舰是格罗姆级驱逐舰，为二战期间波兰海军拥有，目前在格丁尼亚作为博物馆军舰保存。这是波兰海军唯一一只荣获英勇勋章的军舰，同时也是世界上保存得最古老的驱逐舰。它是J·塞缪尔白·考斯为波兰海军建造的两艘格罗姆级驱逐舰的后一个，取名为“闪电”。这两个格罗姆级驱逐舰属于二战前最全副武装的和最快的驱逐舰中的两艘。

在鱼雷艇上。必须在观念上将其与远洋舰船相区别，尽管这两者可以协调行动。对于狭义意义上的海峡防御，一支区域性的、由小型鱼雷艇组成的舰队是必需的。它的活动将使一支外来的敌对力量感到生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一位已经故去的英国著名海军将领曾说，他相信在当今的战时紧张状态下，一支封锁舰队中一半的舰长会精神崩溃。当然，这句话只是为了说明将承受的精神压力的强度。由于鱼雷艇舰队中的每一艘艇都很小，整支舰队的组织和活动也不复杂，所以海军志愿者最适合在这样的舰队中服务，他们能相对容易地学会从事所分配的工作。不过，需切记的是，这样的舰

炮火带、水雷带和鱼雷艇是海岸防御的主要构成。没有前两者，海岸城市就会处于轰击之下；后者不存在，这些城市就将被敌人随意地封锁，除非得到远洋舰队的救助。炮击和封锁这两种作战方式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前提是在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前，应适当地发出通知。

这种限制与其说是出于对规则的看重，不如讲是出了对人性和公平的照顾。由于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各种利益交织成了一个紧密、复杂的网络，所以，对于某个全国性中心的炮击和封锁所打击的不仅是事发地点，也包括有关国家的各个角落。

前面说到，在海上战争中，进攻是远洋海军的主要功能。这样的海军包括战列舰、大小和用途不尽相同的巡洋舰，还有能够对一支舰队起辅助作用的远洋鱼雷舰艇。其中的任何舰只必须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具备良好的适海性且能以适当的速度前进。

不过，海军的中坚或根本力量所在还应是那些攻守能力平衡、既能经受得起严重打击也能予敌以重创的舰只。因此，所有其他的舰艇只是它们的陪衬，只为它们而存在。要问这种舰只的强劲有力应表现在何处，答案是它必须强大得足以驾驭海洋，足以和它可能碰到的最强大的敌对力量作战并有相当的获胜机会。

因此，美国当前最需要进行的战争准备就是为海上防御力量和进攻力量的建设提供物质支持。美国需要火炮、水雷和鱼雷艇以保卫海岸，

还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使我们面对潜在的敌手，能将海洋掌握在自己手中。

迄今为止美国还缺乏这些，因而主动权还为在海军力量上强过美国的国家手中所把持。如果美国海军不能将敌人拒于海岸之外，至少敌方对美国的封锁是可能得逞的。倘若美国甚至连鱼雷艇也缺乏，封锁更是轻而易举之事了。此外，如果美国无力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对海岸的炮击就可能发生，甚至完全可行。一旦战火燃起，美国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物质上的准备通常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战备工作的最薄弱之处，因为这种准备只是一个主要涉及金钱和生产的问题。如果资金充裕可得，再加上认识对头，所需要的物资不久就会到手，而且此种情形会一直存在下去。

对于装备老损造成的损失、各项开支或新的扩充需要，可以预先作出合理的估计，并设置相应的安排。物质准备相对容易进行，因为装备一旦准备就绪，不会因不立即被投入实战而丧失对国家的用处，可以花费相对较少的成本来储存和维护它们。如果保养得当，它们到时能够像刚被生产出来时那样很好地满足使用需要，有稍许的老损也无碍大局。

装备能否很好地发挥其作用还取决于是否有着大批善于使用它们的人员。在当今时代。这些人员必须是经过特殊培训的。尽管通过一次培训所学到的东西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全被忘记，但时间越长，被遗漏的就会越多。因此，不断的实践必不可少。

另外，就刚刚服役的人员而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以使他们不仅熟悉某种武器的使用，而且熟悉他们所属于的军事组织的特点和日常运转。他们仅仅学会如何去干分配到各人头上的工作还不够，还必须了解其他方面的工作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各项工作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备这种知识对于一个人全面、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至关重要，更不用提在战斗



美国亚布拉罕·林肯号航母上船员们晨练

亚布拉罕·林肯号航母是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五号舰，由新港纽斯造船厂（Newport News Shipyard）承造，起造于1984年，1988年下水。林肯号是以带领美国走过南北战争的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为名，是美国海军第二艘使用这名字的船舰。第一艘林肯号是1960年时下水的林肯号（USS Abraham Lincoln SSBN-602）华盛顿级核动力弹道潜艇。

中一个人应随时做好准备以接手他人一时无法胜任的其他任务了。如果这些办不到，一艘舰只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一个人如要学会熟练地使用海军装备，懂得在舰船的行动中如何恰当地发挥其作用，这就需要大量时间。不仅需要时间来掌握技能，还需要时间来保持技能。如果你已经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员，你不能像储存火炮和弹药那样来储存他们，否则他们的素质就会以一般的物质磨损达不到的速度衰退。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众多的人都呆在军队中以维持他们的军事技能，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就会受损。这也是那些认为国家的生产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重要的人反对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和强制服役的主要理由。

对于欧洲国家中那些负责提高军事效能工作的人士来说，人员方面的问题最令他们伤脑筋，从而也成为了他们迫切关注的问题。准备军事物资要花费大量钱财，可是这项工作毕竟简单，而且其耗费还能为军事生产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所补偿。至于拥有大量所需要的军事人员，训练他们

并使他们足以马上被投入使用则是另外一码事了。

对此，所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让一些人从生产部门转向军事部门，同时尽力在这两个部门的各自需要间达成妥协。这种妥协不可避免地有其缺陷，有时稍稍倾向这边，有时则有利于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抱怨并反对生产者的减少，而军事当局则坚持认为国家的武装力量不足敷用。要最大限度地解决此难题并满足对立双方的要求，只好实行预备役制度，许多人服现役的时间长短依他们接受有关某种技能的教育的所需时间而定。在接受完了有关教育后，他们就转入预备役，脱离士兵或水兵的生涯而过起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但每年都需花费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来温习他们以前学到的知识技能。

几乎不用说，这种方法对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种行业来讲都永不会令人感到满意。一个只学习有关的基本知识却从不实践的人不会被认为适合某项工作，因为通过系统的教育得来的知识在价值上无法和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的实际知识相比。这个道理，军事行业和民用行业是一样的，或许前者尤甚，因为它是一个更加专业化和特殊化的人类活动领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才是一个有时不可避免的非自然状态，而对那些身为普通人的战斗人员的要求也特别苛刻。

所以，对于海上战备工作来说，相比于建造舰只和装备火炮，拥有足够的、能够立即开赴海上并熟练使用有关装备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更为重要。

这里的“能够”一词包含了一般被叫做“动员”的组织过程的全部细节。动员计划一旦制定，虽然尚可继续改进，但不会因为被搁置在文件架上而失去效用，正如火炮和弹药不会因为被贮藏在停放地或弹药库中而沦为废品一样。如果有着合格的人员，那么动员方案不过就是一张告诉每个人他该去哪儿的纸片罢了。

6

在和平时期使一支海军，尤其是一支大型海军保持全额满员并不可取，没有实际意义。如果它比一个可能的敌手强大许多，这样做自然毫无必要；即使近乎势均力敌，目标也只能是使己方可用的合格人员在数量上超过对方。对于预备役制度在战备安排中的地位应予以承认，因为这种制度是必不可少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是预备役力量相对于现役力量的规模和特点，这实际上涉及到了长期服役制和短期服役制的问题。

在长期服役制度下，预备役人数会相对较少，而且预备役人员在退役后的开始几年间更能够保持自己的素质，因为他们习得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习惯素养。在短期服役制度下，人们一开始只是被送到培训学校中去，然后就被很快地转入预备役。结果，因为他们并没有全面透彻地掌握所学的东西，他们的素质不仅较差，还会较快地退化。由他们组成的预备役在人数上也会多于长期服役制度下的由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对两者都表示忧虑的人则认为前者人员素质堪忧，后者人员数量不足。

长期服役在逻辑上必定是自愿兵役制的结果。如果入伍与否完全是由个人进行选择，那么，更可能出现把从军作为终身职业的情形，适当的激励机制还能促进这种倾向。倘若服役是强制性的，这件事实本身就会使服役为人所厌烦，而在服役期满后再自愿地延长服役期也只能是少有的事。

长期服役制和小规模的预备役所导致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常备力量较为庞大，这种情况也许与战争的需要、与“预备”一词的含义更为吻合。在战时，预备役力量指的是暂不直接参战，其使用视战局的难以预知的变

化而定的那部分力量。不过没有哪个将领愿意只将一小部分力量投入战斗而让大部分力量永远闲置一旁。抢在敌人完成力量集结之前迅速地集结力量是战略和战术的准则，也是当代动员科学的准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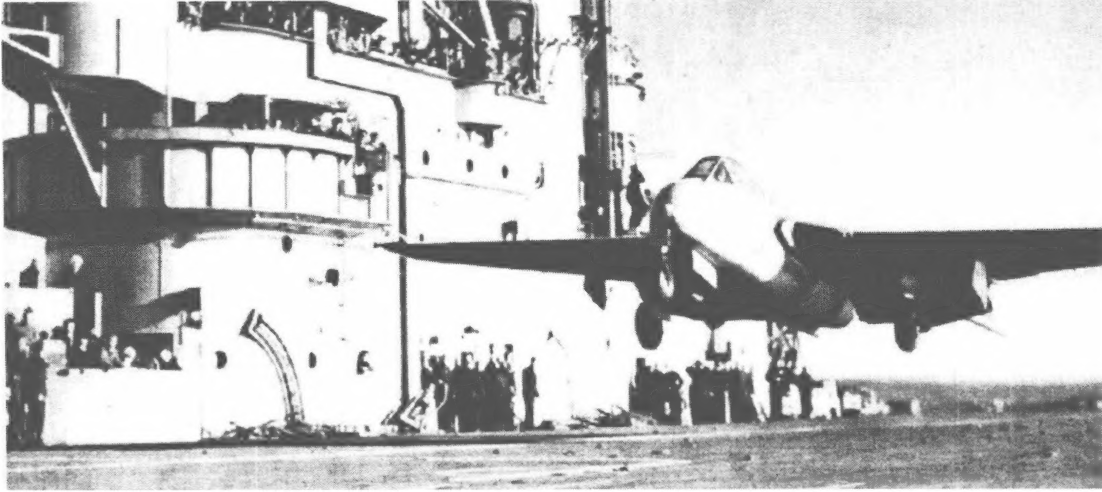
美国海军老兵徽标

美国的军队是世界上军徽标记最多的军队。比如武装力量总司令徽标、国防部徽标等等。每一个徽标都有不同的标志，以此作为军种或军衔的区分。此图徽标为二战中英勇作战的美国海军老兵徽标，也是这些拥有此徽标老兵的骄傲。

美国和英国实行的都是自愿兵役制。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更为看重的是服役的延续性而不是预备役建设。如果一个水兵服役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他的技能将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此时，若他选择继续服役，在一些年内他还将保持其高素质；若他离开军队，若干年之内他也完全适合作为一名预备役人员。显然，一支由这类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和由仅服现役三或五年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相比，在规模上会相对较小；但拿个人素质进行衡量，后者必定远不如前者。

实际上美国和英国一样，也是一个岛国。美国只和加拿大和墨西哥有着两条陆上边界。从军事力量的各个方面来看，墨西哥绝对逊于我们。

至于加拿大，其宗主国英国握有一支常备陆军。可是，这支军队的数量清楚地说明它不可能奉行主动进攻的方针，除非是在那些其他国家的强大陆军不可能与之为敌的遥远地区，或是这些军队要从英国手中夺走对海洋的控制。没有哪个现代国家曾同时在陆地和海洋占据支配地位，只是时



量处于较大规模，因为你既不可能在仓促间组建出这么一支力量，也不可能借助于强迫来保有它。一旦装备的数量确定了，就容易知道需用多少人来使用这些装备。

接下来可以根据某些既定的原则，将总的人员力量在常备海军与预备役之间分配。笔者相信预备役力量在整体力量中应占较小比重，如果海军规模较小更是必须如此。一支海军规模越小，它就越需要时刻保持迅捷行动的能力，当然维护费用也会越少。

实际上，如果数量上不占优势，那么质量上就应有更高的要求，而质量就整体而言更是人员的问题而不是装备的问题。人员的质量只可能通过使在军中服役的人具备高素质来保持，过于依赖人数不少但总体上素质不高的预备役力量只能导致消极的结果。他们只能发挥不尽完美的减轻压力作用，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可被有效地融入主体之中。真正适合预备役人员干的工作是使用鱼雷艇保护海岸以及破坏敌人的商业。在这两种情形中，任务和组织都相对简单。

对于美国面临的任何军事危险的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就是在海上。对海上战争做好准备，既准备好迎击来自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好发动海上攻势，就是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做到有备无患。